

目 录

1. 喀喇沁旗行政历史沿革……………王甫仁 (1)
2. 喀喇沁旗的出土文物选介……………旗文管所供稿 (20)
3. 喀喇沁旗王爷府(西府·小府)…乌秀清 吴紫云 (31)
4. 喀喇沁旗王府祭祀敖包的片断……………阎桂芳 (40)
5. 王府一代平民结婚仪式……………阎桂芳 (44)
6. 清公主陵……………郑瑞丰 (49)
7. 灵悦寺……………郑瑞丰 (52)
8. 福会寺……………阎桂芳 (55)
9.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东江
……………赵振德整理、史东江口述 (62)
10.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游击队的简介
……………赵振德调查整理 (69)
11. 日本侵略者在喀喇沁旗实行的暴行
……………吴紫云遗稿、赵振德整理 (75)
12. 解放前鸦片烟对我旗人民的毒害
……………赵振德整理 (85)
13. 伪满崇正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生活 ……玛 希 (92)
14. 河原操子其人 ……赵振德整理 (99)
15. 王爷府一带蒙古民族宗教信仰 ……阎桂芳 (109)
16. 辽耶律琮墓及其碑铭 ……郑瑞丰、赵振德整理 (112)
17. 喀喇沁旗鼠疫的流行与防治 ……马贵祥 (126)

18. 喀喇沁旗克山病的危害与防治 马贵祥(133)
19. 我的父亲吴尧忱 吴国辅供稿 阎桂芳整理(141)
20. 郭拔贡 王书平(146)
21. 通兴当 郑瑞丰(151)
22. 文史资料第一辑勘误表..... (155)

历史沿革

第一节 喀喇沁部族的来源

蒙古族远在唐代就活动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河一带，以后发展到阿尔泰山西支脉的广阔地区，北抵今苏联的贝加尔湖、叶尼塞河及额尔齐斯河；南至阴山（大青山）一带。当初，他们基本上分为二部：草原游牧部落和森林狩猎部落。至元太祖帖木真征服蒙古各部落以后，蒙古族才统一强盛起来，建立威震一世的大元蒙古汗国。

喀喇沁蒙古渊源于古老的乌梁海蒙古。喀喇沁原是蒙古族一个部落的名称，属于唐努乌梁海部，为迭列列斤蒙古的分支。《元史》苏布特传中称兀良哈氏，明代亦一般通称为兀良哈氏（兀良哈、乌梁海为同一语言的异译）。故喀喇沁部是以乌梁海为姓氏也。

据《蒙古秘史》记载：喀喇沁蒙古的远祖，在元初以前游牧于斡难河（今外蒙古鄂嫩河）不儿罕山（今肯特山）麓地方，以打牲捕貂为业，好居山林，不游牧于平野。所以古代乌梁海为“斡亦刺惕”（林木中的百姓）。喀喇沁部的领主是元太祖功臣之后，当元太祖初兴起时，有铁匠兀良哈歹人扎尔楚泰老翁，背着风箱，领着儿子，从不儿罕山来见帖木真，将子者勒篾（后称济拉玛）献给他作

从战助手，后为元太祖名将。于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收复蒙古各部落，大会于斡难河的上源头，建立九脚白鹿纛做大可汗，并大封功臣为千户那颜。济拉玛被封为第九位千户那颜。成吉思汗时代，乌梁海都是强悍的武士，被誉为蒙古“四杰”、“九将”的者勒蔑、速别额台等，均出于乌梁海部，他们为统一蒙古民族的形成立下汗马之功。成吉思汗之长子拙亦为乌梁海蒙古的第一位长官。以后，成吉思汗又封他弟弟哈赤温之子燕之台和幼子拖雷管辖乌梁海部，此时乌梁海蒙古为左翼三万户之一。从此乌梁海世代为成吉思汗氏族的“古列坚”，汉意为“女婿”，《蒙古秘史》总译则作“駙马”。明代以后，蒙古贵族的女婿专称“塔布囊”了。

据《蒙古秘史》和《史集》，仅知乌梁哈·扎儿赤兀歹生之子，长子者勒蔑，次子速别额台，三子察兀儿罕，均为成吉思汗九十五个千户。者勒蔑生二子，长子也孙不花太师，次子也孙不花塔儿吉，以下记载不详了。

成吉思汗死后，乌梁海蒙古成为成吉思汗陵寝的守卫者。喀喇沁一名由此而产生。喀喇沁即“守卫者”之意。据《史集》所载：“成吉思汗有一位出自林木中兀良哈的左手（翼）千户长，名兀达赤。成吉思汗时代以后，兀达赤的儿子们率领自己的军队在名为不儿罕合勒敦地方守护禁区的成吉思汗伟大遗骸”。《蒙古源流》亦记载：“乌梁罕亦系守主上金柩，受大命之国，……………”。

喀喇沁部的世系，据喀喇沁部蒙古人罗密《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和《罗·黄金史》所载，喀喇沁其名有三，其汗之子孙、台吉则为西拉努忒·喀喇沁（西拉努忒，蒙古语为黄眼睛），其故旧勋戚之裔则为博罗努忒·喀喇

沁（博罗努忒，蒙古语为灰色眼睛），其各处俘降则为哈拉努忒·喀喇沁（哈拉努忒，蒙古语为黑色眼睛）。由此看来，博罗努忒·喀喇沁即者勒篥后裔，为今喀喇沁的远祖。

乌梁海蒙古兴起于兴安岭，著称于蒙古草原，成为明代历史上独立存在的势力。元世祖至元年间，乌梁海蒙古迁徙于额客，多延温都儿（即朵颜山）为中心的地方。元设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管辖乌梁海蒙古，即明代朵颜卫的前身。元代乌梁海喀喇沁部，基本据地在朵颜山，元末明初延展到西刺木伦（潢水）以北，并逐渐南下，分布于热河全境，迫近明朝蓟、辽边，成为明朝最大的抗衡力量。明朝洪武年间承认了他们的势力，在此设置了泰宁、福余、朵颜三卫，即所谓兀良哈三卫。《明史》记载：“自大宁（今老哈河畔的大名城），前抵喜峰口近宣府（今宣化），曰朵颜。自锦（今锦州）、义（今义县），历广宁（今北镇）至辽河，曰泰宁。自黄泥洼（今辽阳西），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曰福余。”其中朵颜卫即兀良哈也。但对北元成吉思汗黄金家系来说，兴安岭以东，也是蒙古地区，从不承认明设兀良哈三卫之称。

明朝推翻元朝，蒙古贵族失去在中原的统治，他们退居故土——蒙古草原以后，仍以大元蒙古统辖蒙古本部，汉籍称“北元蒙古”。北元蒙古到巴图孟克太衍汗（达延汗）时，将七零八落的蒙古国又统一起来，使成吉思汗汗统复统辖蒙古。据《蒙古源流》所载：“达延汗次子巴尔斯·博罗特生七子，第四子巴雅斯哈勒庚午年生，占据永谢布之七鄂托克喀喇沁而居。”（鄂托克即村、区域的意思），此支即为喀喇沁部。

明朝弘治、正德(1488年——1506年)之际，兀良哈蒙古内部较稳定，明政府承认了朵颜卫脱儿豁察儿为正统。公元1509年，都督花当(即和通)嗣位。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蒙古游牧记》、《蒙古世系谱》等所载：“元时，有扎尔楚泰者，(扎尔赤兀歹)，生济拉玛(者勒篾)，佐元太祖(成吉思汗)有功，七传至和通，有众六千户，游牧额沁河(今英金河)；号所部曰：喀喇沁。”、“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界土默特及敖汉，西界察哈尔正兰旗牧场，南界盛京边墙，北界翁牛特。”

花当于嘉靖九年左右卒(1530年)子格呼博罗特继之，嘉靖十年格呼博罗特之长子革兰台(格呼勒泰罕桑)嗣位。革兰台于嘉靖二十七年卒(1548年)，其长子影克(即恩克)嗣位，次子鄂默克图，均居喀喇沁，三子莽古岱别隶土默特。影克子长昂(即专难)，长昂子摆洪大、次子赖洪大相继嗣位。至天启二年左右(1622年)，摆洪大长子苏布地(有说四子)、次子万丹伟微(有说六子)，均成为喀喇沁著名酋领。并且他们的驻地牧地稳定在今大凌河、锡伯河、老哈河流域，其军力亦很强大了。

明代，喀喇沁部曾驻牧于白彦高洛(今辽宁省建平县境内)，以后遂有小喀喇沁之地名，现为辽宁省建平县喀喇沁公社。喀喇沁部世系之历代扎萨克及其亲族病歿后，都埋葬在建平县王子坟。

清太宗天聪二年二月(1628年)恩克曾孙苏布地以察哈尔部林丹汗虐其部，偕弟万丹伟微等乞内附后金(清)。喀喇沁部与后金的联合，打败成吉思汗系统的察哈尔

部。天聰九年(1635年)正月，詔編所部佐領，以苏布地子固嚕思奇布授扎薩克，統領喀喇沁右翼旗，四十四佐領，駐錫伯河北；圖嚕巴圖爾之孫色梭授扎薩克統領喀喇沁左翼旗，四十佐領，駐大凌河巴顏珠爾克。

明代歸化城近郊(今呼和浩特)的喀喇沁部土默特部，是異姓同牧。喀喇沁部遷居呼和浩特，是在瓦剌也先稱霸時代(1439年—1454年)，也先以追討原阿魯台的余類為名，經略朵顏三衛之地，迫使三衛大眾，西遷呼和浩特。因而至今尚有許多喀喇沁人屯居土默特川，並留下他們的村落和文化遺址，如哈刺沁村、哈刺沁溝等。

第二節 立旗前的歷史沿革

我旗和昭盟其它地區一樣，有着悠久的歷史。早在二、三十萬年前，人類的祖先就在這裡居住、繁衍、生息。

據解放前後文物工作者的搜集、發現和考證，我旗也同樣經歷了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學上已命名的“紅山文化”、“夏家店文化”，我旗就居于這種新石器時代的類型。到了原始公社氏族社會，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從我旗牛營子麒麟山遺址和西山遺址中就可以看出當時处于母系氏族的繁榮階段。石制農業工具的初步形成，紡輪、骨針的出現，說明當時人們已開始脫離了狩獵生活，而過上了農業定居生活。至夏、商、周時代，原始公社逐漸解体，進入了奴隸社會，青銅器、陶器的制作和使用，標志着社會生產力和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我旗錫伯河沿岸的王府、錦山等處均有遺址。

下面根據歷史記載，分別記述我旗立旗前的歷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喀喇沁旗的原地，在春秋时期属山戎族，战国时代属燕国。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663年），北方山戎族侵犯燕地，燕告急于齐，当时齐桓公称霸，有管仲相齐，命其出兵征伐山戎。得胜回师，迷失归途，曾有过“老马识途”的故事（见《东周列国志》）。山戎族以后被东胡所灭。东胡是古代居住在现昭盟地区的一个民族，到了战国时代，从燕国北边迁移到燕国的东北，即现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在燕昭王时（公元前331年—前279年）东胡日益强盛，曾打败燕国，以后燕国又打败东胡，迫使东胡向后退却千余里，燕修筑长城以防东胡（据《史记·匈奴列传》）。战国的右北平郡、辽西郡辖境在今昭盟南部的老哈河上游一带。燕所筑长城遗址，由今河北省围场县伸入我旗境内，经头道营子明安山南，再经山前公社，伸延赤峰县美丽河，过老哈河入辽宁省建平县。从战国时代的燕长城故址，可以推断，战国中晚时期，即公元前四世纪以后，我旗属战国时代的燕国。

秦、西汉时代

(公元前221年—公元25年)

秦初，我旗属于东胡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北逐东胡，将战国时代的北部边境从我旗的楼子店和赤峰美丽河一带又向北推移到今英金河一带。从发现的一些秦代遗址遗物中足以证明，秦的领地达赤峰以南地区。当时我旗属于秦的领地之内。秦统一全国后，实行中央集权

制，在全国建三十六郡，在昭盟南部设有辽西、右北平郡。潢水（即今西拉木伦河）以北，仍为东胡族活动地域。

秦末汉初，中原爆发农民起义，又经楚汉相争，无力外顾，早在战国时代出现在今内蒙古西部的匈奴部落，乘机崛起。至匈奴冒顿单于时，组成了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进而东侵，大破东胡。东胡部落的一个强支逃入乌桓山，得名为乌桓部。另一强支逃入鲜卑山，得名为鲜卑部。自此东胡地成为匈奴的势力范围。于汉高祖六年，匈奴置左贤王以统驭东部各民族，进而南略。今昭盟西拉木伦河以南尽属匈奴领地。当时我旗属于匈奴地。

东 汉 时 代

（公元25年—公元220年）

东汉时，我旗初属乌桓、鲜卑，后尽属鲜卑地。汉武帝时，北伐匈奴，使匈奴的势力大大削弱，远遁漠北，塞外的乌桓部遂强盛起来。公元49年，原来居住在塞外的乌桓部，迁居到塞内，散布于当时的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等沿边诸郡。北起潢水（西拉木伦河），南到滦河、大凌河流域，都成了乌桓的属地。

乌桓部南下入塞后，东汉的北部边境也逐渐南移。原乌桓占据的地区，即五郡塞外地，被自动放弃。留在原居住地的乌桓全部归属了鲜卑。鲜卑族为东胡支族，公元166年，鲜卑酋长檀石槐，勇健有谋略，部落畏服，受推为大人。立庭于弹汗山（今张北县），北据丁零，东却夫余（包括饶乐各水），西击乌孙，南为北平边患，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余里，为鲜卑势力范围。从公元二世纪中叶至三世纪中叶百余年间，昭盟全境尽属于鲜卑部落。据《承

《德府志》记载：饶水即今英金河，为赤峰地，乐水即今老哈河，为喀喇沁地，属鲜卑东部之疆域。

魏、晋、南北朝时代

(公元220年—公元581年)

在魏、晋时代我旗初属鲜卑部，后属前燕地。公元三世纪中叶，鲜卑部落联盟，在连年征战中瓦解。西晋初，解体后的鲜卑部落形成很多支。其中，有三个强部，即慕容部、段部、宇文部，活动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和辽宁省、河北省北部的一带地域。公元四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慕容部逐渐强大，慕容部酋长慕容廆，受晋官爵，为晋的藩属国。廆死后，子慕容皝继位，公元337年建立前燕政权。当时我旗属于前燕地。

在南北朝时代，我旗属库莫奚地。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鲜卑人曾先后建立后燕、北燕政权，其活动地域多在昭盟南部。公元四世纪后，今西拉木伦河以北又兴起了库莫奚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汇流的一带地方兴起了契丹部落。关于库莫奚据《魏书》记载，原为宇文部的别种，被慕容廆所破后，遗部散匿于松漠之间，始改为库莫奚，以后又渐渐发展起来，到四世纪末叶，其势力扩展到西拉木伦河以南。五世纪末，库莫奚又渐而南来，到昭盟老哈河流域，我旗属其领地之内。

隋、唐时代

(公元581年—公元907年)

在隋、唐时代，我旗属契丹、奚活动地。公元六世纪末（隋开皇年间），契丹部落渐众，分为十部，其势力已

渐由原来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向南发展到老哈河流域，其中下游为契丹地，奚在契丹的西南部，正当老哈河上游。

公元618年，唐朝初期与中叶，我旗为契丹与奚对峙地。契丹与奚的分界，据《唐书·地理志》记载，以踞营州（今辽宁省朝阳）西北百里的松径岭为界，东为契丹，西属奚部。据此，今昭盟赤峰、喀喇沁旗的地域属奚部，西拉木伦河流域南至敖汉属契丹部。

唐太宗时，奚部内附，置饶乐都督府；契丹内附，置松漠都督府。唐末，契丹传至耶律阿保机时，日益强盛，侵并奚部。辽太祖五年，统一全境，建立契丹帝国，不再朝贡于唐，与唐成对立局势，为北部边患。

辽 代

（公元907年—公元1125年）

辽代我旗属中京大定府。唐朝末年，中原战乱，契丹部乘机崛起，乘唐无力外顾之际，大举向外扩张，先后征服了奚、室韦，吞并了渤海国。公元907年，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建立契丹国，即皇帝位。于潢水（西拉木伦河）之北，设辽京都于上京临潢府，公元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会同元年，建国号大辽；公元983年圣宗耶律隆绪即位，改国号为大契丹；公元1066年道宗耶律洪基咸雍二年，复改国号为大辽。

辽建国后，将其统辖的疆域分设五道：上京道（辽首都，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处），中京道（今宁城县大明良种场处），东京道（今辽宁省辽阳市处），南京道（今北京处），西京道（今山西大同处）。

公元936年，契丹从后晋石敬瑭手中取得燕云十六州

后，又在公元946年大举南犯，契丹攻陷后晋都城开封。北宋时，辽不仅占据北方幽州，而且威胁到北宋之汴京。宋真宗时，曾亲自征辽，南北连年战争，后来定下了澶渊之盟，从此出现了南北议和的局面。

辽代，旧乌桓地（原热河省境内）全为辽所占据。辽之中京大定府正是后来的喀喇沁左、中、右三旗全境。我旗当时属辽之中京大定府所辖的松山州。据宋代沈括《辽史图抄》所载：“自崇信馆（今楼子店）西北行，逾原坂数叠，北三十里至中顿，过顿又历行坂间十余里（三眼井），乃平陆，又十余里过阴凉河（锡伯河）至松山馆。”按方位松山州在赤峰县的城子公社一带。

金 代

（公元1115年—公元1234年）

金代我旗属北京路。

女真族原名黑水靺鞨，公元五、六世纪以来，居住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以及长白山麓。在八、九世纪内，它役属于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到十世纪辽灭渤海时，以女真族之名称之于世。

女真族原受契丹族的统治。公元1115年，太祖完颜阿骨打使女真族强盛起来，建立金国。金建国后不久，公元1125年与北宋联合灭辽。接着，金又对同盟者北宋大肆进行征伐，迫使北宋南迁临安（今杭州），形成南宋。金占领了宋的河北、山西、山东河南、苏北、皖北的大块土地，在华北建立起金朝的统治。

金代置五京：东京黄龙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

府（今山西大同），北京大定府（今宁城大明），中京大兴府（今之北京），南京汴梁府（今之河南开封）。我旗当时属今之北京路。

元 代

（公元1206年—公元1368年）

我旗在元代，东部属大宁路，西北部属松州。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在斡难河源头作了蒙古大可汗，被各部落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继位蒙古大可汗，由南北两路对金发动进攻。1233年，南宋应蒙古之约，出兵夹击金蔡州城，1234年金亡。

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元灭金后，又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攻，1279年南宋亡。

元建国后，在其统治区域内设立了十二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我旗在元代，东部老哈河沿岸属元之大宁路，大宁路原为金之北京大定府统领的北京路，公元1270年元改北京路为大宁路。我旗西北部一带，属元之松州。松州原为辽松山州，金松山县旧地，元初为县，公元1263年又改为州，后划归上都路。

明 代

（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

我旗明初属大宁卫，后为兀良哈三卫地。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率军进攻元大都（今北京），结束了元的统治，改元洪武，建立了明王朝。

明王朝为控制北方少数民族，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指挥使司于兀良哈之地。朱元璋死后，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燕王朱棣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得到了兀良哈三卫的支持，经过四年的战争，打败了建文帝，夺取了明朝政权，建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为了酬谢三卫，遂将大宁卫割让给朵颜卫。

大宁卫在老哈河西岸，为北京行都指挥使司所在地，自“靖难之役”以后，大宁城在不断的战乱中逐渐荒废，续被朵颜卫所据，一变而为游牧地。

兀良哈三卫占据大宁卫地后，其中朵颜卫居今昭盟南部，南抵喜峰口，西近河北宣化一带，我旗即在此境之内。公元十六世纪中叶蒙古察哈尔部征服了兀良哈三卫，自此，昭盟地区为蒙古察哈尔部所据。

第三节 立旗后的历史沿革

清 代

（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在清代我旗属卓索图盟。

女真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明代，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建州女真几经迁徙，最后在浑河流域一带定居下来。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即位立国，定国号为金（即后金），脱离了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并与之为敌。

公元1627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沈阳即位，改国号为清，改族名为满洲。征服了漠南蒙古，昭盟、卓盟地

区各部蒙古也先后归附清朝。

公元1644年（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占北京，明王朝覆亡。同年九月，清顺治帝从沈阳到北京，即皇帝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建立起来了。

清皇太极九年（1635年），喀喇沁部者勒箴系第十四代酋领苏布地附清，其子固噜思奇布授扎萨克，统领喀喇沁右翼旗。

清初，将昭乌达盟八部划分为十一旗。在昭盟南部和辽宁西部设置卓索图盟，将盟内喀喇沁、土默特两部，划分为四旗。喀喇沁即为喀喇沁左、右翼两旗，土默特部为土默特左、右翼两旗。喀喇沁左、右两旗和土默特左旗为者勒箴裔；土默特右旗为成吉思汗裔。康熙四十四年，因喀喇沁右旗地大事繁，清理藩院命在原右旗领地另辟喀喇沁中旗。今喀喇沁旗属喀喇沁右旗，宁城县属喀喇沁中旗。卓索图盟王旗会盟地点，在土默特右翼旗（朝阳）境内的卓索图河。

喀喇沁三旗：喀喇沁右翼旗俗称喀喇沁王旗，简称喀喇沁右旗；喀喇沁左翼旗，俗称吴公旗，简称喀喇沁左旗；喀喇沁中旗，俗称马公旗，喀喇沁贝子旗，简称喀喇沁中旗。

喀喇沁右旗总面积：一万二千五百方华里。户口：户数蒙古人四千户，其他七千户，计一万一千户；人口蒙古人三万人，其他四万人，计七万人（载于《满洲地名大辞典》、《热河省县旗事情》）。喀喇沁王府原建于锡伯河畔龙山，康熙九年迁到王府（大营子）。自天聪九年固噜思奇布授第一代扎萨克以后，传至贡桑诺尔布之子笃多博，

已延续了十五代，二百九十六年。详见“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世系表”。

清雍正初年设热河厅、八沟厅、喀喇河屯厅、塔子沟厅、乌兰哈达厅、三座塔厅、四旗厅。当时我旗属八沟厅（平泉）统辖，地处八沟厅之北部。乾隆四十三年，开热河厅为承德府，其余各厅改为一州五县，一州即平泉州，喀喇沁右旗属平泉州管辖。光绪三十年（1904年），辟喀喇沁右旗东半部、平泉县北半部、建昌县西半部，增设建平县。

民 国 时 代

（公元1912年—公元1932年）

民国时代我旗属于热河特别区。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自1912年民国成立后，设立热河特别区。北洋军阀为了阻止蒙古王公独立，在统治权力上效法清朝，逐步削弱蒙古王公上层势力，在昭盟、卓盟境内设立县治，废除旗治。民国二十年（1931年）将今喀喇沁旗全部和平泉县（喀喇沁中旗）北部设大宁设治局，后改为宁城县。所设县治和设治局均受热河都统管辖。

从1912年到1932年二十年间，军阀之间连年混战，热河特别区相继更换五任都统。我旗各族人民和其他地区人民一样尽遭战争和军阀的蹂躏，饱受腐败官僚政客剥削压迫。

伪 满 时 代

(公元1933年—公元1945年)

伪满洲国时期我旗属热河省。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1932年2月9日又扶植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州国。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了热河全境。自此，我旗人民沦陷于日伪统治之下，长达十三年之久。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以后，在热河地区承袭了民国的行治区划。伪康德四年（1937年），实施属人主义的旗县复合制，其地域为一旗一县之制度。在设建平县的同时又设喀喇沁右旗，县管汉人，旗管蒙人。县公署设在老建平，旗公署设在王爷府。康德七年（1940年），又废除旗县复合制，实行旗县合并取消县治名称。将民国二十年划归宁城县的喀喇沁右旗西半部和旧建平县统合为喀喇沁右旗。伪旗公署所在地迁至平庄。其区域范围，包括建平县的全部，喀喇沁旗的全部（除去解放后由赤峰县划过来的大沟、棺材沟、老爷庙等四村），隆化县的七家、承德县的五家，当时均属右旗。喀喇沁右旗东界土默特右旗（朝阳）、敖汉旗，西界围场、隆化、承德三县，南界喀喇沁中、左两旗，北界翁牛特右旗（赤峰）。总面积为四万一千二百二十七平方华里，户数为八万九千六百零七户，人口为五十三万六千四百三十九人。下辖三十二个行政村。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为了牵制日伪军对冀东解放区的围剿，在冀东分区的领导下，于1942年在长城以北，曾建立承平宁联合县，下辖八个区，当时我旗地区属第八区，即特八区。

喀喇沁右旗扎萨克世系表

代次	姓 名	爵 位	卓 索 图 正 付 盟 长	袭 扎 萨 克 年 号
一	固噜思奇布	多罗杜棱		天聪九年授扎萨克，崇德元年封固山贝子，赐多罗杜棱号，顺治七年晋多罗杜棱贝勒，诏世袭罔替十五年卒。
二	图巴色棱	同上		顺治十五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贝勒，康熙三年卒。
三	班达尔沙	多罗杜棱 郡王		康熙三年袭扎萨克多罗杜棱贝勒，七年晋多罗杜棱郡王，十年卒。
四	扎 什	同上		康熙十一年、四十三年卒。
五	噶 勒 藏	同上		康熙四十三年，五十年以罪削。
六	色 棱	同上		康熙五十年，五十六年卒。
七	伊达木扎布	同上		康熙五十六年，乾隆四年卒。
八	喇特纳锡弟	同上 加亲王	正 盟 长	乾隆四年，四十八年赐亲王品级，五十二年卒。

续表

代次	姓	名	爵	位	卓索图 正副盟长	袭扎萨克年号
九	端珠布色布腾	多罗杜梭 郡王	同上	盟务邦办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八月卒。	
十	满珠巴咱尔	同上	同上	同上	乾隆五十二年。	
十一	布厄雅巴喇	同上	同上	同上	道光八年。	
十二	色伯克多尔济	同上	同上	同上	道光十六年。	
十三	旺都特那木吉勒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治七年。	
十四	贡桑诺尔布	同上	同上	同上	光绪二十四年。	
十五	笃多博	为世子			民国封贝子，十八年授扎萨克。	

第四节 解放后至建国前的建置沿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喀喇沁旗人民摆脱了日伪统治，走向了新生。9月热河省先后成立热中专署、热北专署、热辽专署。我旗隶属于热中专署（第十九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相继建立，将伪喀喇沁右旗改为建平县（包括现在的建平县、喀喇喀旗等地），设建平县政府。县政府仍驻平庄。

1946年2月，划建平县为建平、喀喇沁右旗两个旗县，以马鞍山、毕家坝分界，东部属建平县，西部属喀喇沁右旗。1946年9月，热河省政府鉴于我旗蒙汉杂居的情况，实行了属人主义的蒙汉分治，在设旗的同时又在喀喇沁右旗地区范围内设置建西县，旗县政府所在地设在王爷府。建西县所辖王府、公爷府、旺业甸、罗营子（牛营子）、小牛群、克勒沟六个区。4月3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卓索图盟成立分会，我旗成立了支会。在蒙古族聚居地区的王府、公爷府、旺业甸、罗营子、小牛群五个区，成立了苏木支会。

1946年9月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将建平县的西部（老哈河以西，马鞍山、毕家坝以东建立建中县。建中县辖平庄、乃林、楼子店、西桥四个区。

1947年11月1日，热河省政府发出通令，建中县合并于建西县，旗县政府也合在一起，取消了属人主义的蒙古分治，实行旗县合并，改为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从此，我旗的行政区域基本稳定下来。48年秋，旗县政府从王府迁到公爷府（现锦山镇）。同年11月30日，热河省政

府宣布撤销昭乌达盟政府、热中专署、热辽专署。1949年3月，热河省委将昭乌达盟南部地区的联合政府和合署办公的形式加以调整，将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改为喀喇沁旗政府，同年5月1日又称喀喇沁旗人民政府。

喀喇沁旗出土文物选介

文物管理所

考古资料表明，西拉木伦河以南至燕山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域，远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先人在这里活动。进入新石器时代，定居生活的先民更显著增多，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集中代表了这一时期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其后，具有明显中原商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里得到充分发展，构成了这一地区早期青铜文明的基本内容。春秋之际，以北方山戎、东胡民族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在燕北地区繁荣起来。战国时期，燕文化占居主导地位。从秦汉开始，这里日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北方文明。

我旗位于老哈河上游、燕山北麓，正处在中原与北方的交接地带，因而这里的古代文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这不仅反映在文化种类的多样性上，还体现在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上：既有辽西地区古代文化的一般特点，又富于燕北山地古代文化的特色。迄今为止，我旗共发现古代文化遗址三百处，收藏历史文物两千件，其中不乏国家珍品。这些文物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而且，在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借此，将我旗出土的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向大家做一简要介绍。

原始社会早期的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只能对石头进行简单的加工，打制成粗陋的石器，与木棒配合使用，采集植物的根茎果实，捕捉一些小动物。随着生产经济的积累，人们不断改进着生产工具。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在继续使用打制石器的同时，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由此进入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不久，陶器也相继诞生了。生产工具的不断发明、改革，进一步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推动人类生产活动向新的领域迈进。此时，人类已经临近阶级社会的大门了。

石器是人类遗留下来的最早的生产工具。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是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则以大量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为其标志。磨制石器形体规整，表面光滑，具有准确合用的类型和锋利的刀口，因而劳动效率较高。磨制石耜（音寺）、石斧、石铲、石刀等是新石器时代以至青铜时代的常见器物。

石耜，掘土工具，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柳叶形、鞋底形和凹底形等多种形式。有打制的，也有打制后再经磨制的。所见最长的达三四十厘米。长柄石耜可以直接使用，短柄和凹底石耜和其后部绑上木柄即可成为复合工具耒耜。（耒音垒），后来的耨和犁很可能就是由古代的耒耜逐渐演变而来的。（图1）

宽肩石铲，为红山文化特有的器型，主要有平肩弧刃和斜肩平刃两种形式，形体较大，选料不严，制做较粗，适于大强度的掘土劳动。

石磨盘、石磨棒，为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型之一，用来破碎谷物。一般选用粗糙石料，以加大摩擦力。牛营子镇仓窖出土的一付，磨盘长47、宽33厘米，磨棒为扁

柱状。以两手握住磨棒的两端，来回碾压磨盘上的谷物。
(图2)

石斧。石铲，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较多。石斧多为扁圆柱状，石铲多为长方形。有一般石料的，也有玉、玛瑙、燧石等特殊石料的；有打制的，也有磨制的；有的可以单一使用，有的则须复合使用。所见大型的石铲长达五十厘米。这些石器不仅用于生产，而且还用来随葬。在成年男性的墓葬中常有选料讲究，制做精致的石斧石铲等出土，而且大多都未经使用过。(图3)

石刀，在早期的三种文化中均有发现，但各具特色。红山文化的石刀多为桂叶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刀多为长条形，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石刀多为半月形。三种石刀往往钻有穿孔，或磨出凹缺，用以着绳缚柄。这些石刀主要用于刈割。

穿孔锤斧，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特征性器物。石料坚硬，形态别致。缚柄后，既可用于生产，又可用做武器(图4左)

细石器，古代人们用燧石、玛瑙等硬质石料打制成的细小石器，广泛存在于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它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在铁器时代仍有其踪迹可见。它一般是采用直接或间接法从经过修整的石核上打制下来的，最初做为复合工具的锋刃部分镶嵌于骨角的沟槽上。而后，器形不断发展变化，种类逐渐增多，用途也愈加广泛。常见的细石器有镞石、石刃、石锥和刮削器等。

石磬(音庆)，出土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中。磬身大体呈三角形，上有悬孔。选用细腻坚硬的青灰色石料磨制而成。一件长55、高22.5、厚3厘米。另一件长37、

高19、厚2.5厘米。两磬表面均留有明显的敲击痕迹。用木槌击之，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石磬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用石、玉或金属制成，悬挂在架上，击之而鸣，主要用来娱乐。有人根据古代音乐传说推断，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发明了石磬。但目前尚未发现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磬实物，所见最早的石磬属于中原夏商时期。如豫西晋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型打制石磬和磨制石磬，豫北安阳出土的大型虎纹石磬和龙纹石磬。而在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石磬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并且，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夏商文化内涵相近，年代相当。因此，石磬的发现不仅为早期音乐史的研究增添了重要资料，而且更为探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社会状况及其与夏商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图4右）

陶器是人类征服大自然的一项伟大的发明创造。原始农业为人类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但谷物必须煮熟方能食用。这就向人类提出了制造耐火容器的要求。而定居生活和对火与粘土性能的认识为陶器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至此，原始陶器便应运而生了。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伴随人类社会的脚步走过了近万年的历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早期的陶器采用直接手捏或泥条盘筑法和泥条圈筑法制坯，修整加工后烧制而成。后来，由慢轮修整发展到快轮制坯，由露天堆烧发展到窑室高温烧制，大大提高了陶器的质量。红山文化陶器主要器型是

瓮钵盆钵，多为红色，部分器物表面施以黑彩或压印“乙”形纹饰。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常见器型为瓮罐尊盆碗豆鼎鬲甗（音演）等。灰褐陶居多，绳纹为主，部分陶器饰以红白黄色彩绘图案。夏家店上层文化陶器种类较少，纹饰罕见。

双耳红陶罐，小口圆腹，器表磨光。富于特色的是腹上部附有一对鸡冠状器耳，仅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

尊，状如深盆，其中有的腹下部向里折收，有的弧形内收。也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常见器型。（图五左）

鬲（音力），炊器，圆口三空心足。（实心足的则为鼎；甗〔音增，底穿孔的盆〕与鬲的合体原为甗）有的较肥大，有的较瘦长。粗陶大型物多饰以纹饰，细陶小型器物往往通体磨光。夏家店下层文化最常见。（图五中）

豆，食器，形似高足盘，即上部呈碗状或盘状，下部呈喇叭状。主要见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图五右）

陶纺轮，为纺锤上的圆形小轮。有算珠状、圆台状、球缺状等多种型式，分别见于三种文化中。

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认识了铜。最早冶炼的铜成份较纯，呈现红紫色，硬度较低，可以直接锻造，在便于成型，易于改制方面优于石器。后来，人们又在红铜中加入适当比例的锡和少量的铅，炼出了硬度较高的青铜。铜器大量制造和使用是在奴隶社会的繁盛时期——商周时代。由于金属较为贵重，而被统治者所占有。铜器的种类也仅限于礼器、兵器、手工业工具和一般生活用具。

夏家店下层文化已有少量的红铜器存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大量使用青铜器。

青铜长剑，现发现一件，长61厘米，圆鍔(音旁)，棱脊、直刃，叶薄而锋利，具有明显的中原同类器物风格。
(图六(1))

青铜短剑，共发现三件，长约二三十厘米，剑首或作动物状，或为扁球状；剑柄铸有几何纹饰，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图六(2)(3)(4))

其它种类的铜器有戈(图六(5))、镞、刀、铍、凿、带钩、铜扣、马衔、各种纹样的牌饰等。主要是北方匈奴、东胡等民族的遗物。(图七、八)

战国时期，铁器普遍使用，尤其是铁农具的大量出现，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此时，北方的燕文化逐渐取代了夏家店上层文化。及至秦汉，基本上形成了与中原相统一的局面。

铁镞，发现一种类型，呈长方形，方鍔，用合范浇铸而成。

铁剑，一件，长98.5厘米。剑身窄长，有韧性，锋刃锐利。(图九)

刀币，形如马刀，其上多铸有“明”形字，人称“明刀”，为燕国货币。(图十)

布币，形如小铲，上面多铸有不同的地名。一般以三晋货币为多。据考证，燕北亦铸造布币(图十)“一化”币，圆形方孔，上面铸有“一化”二字，为燕国晚期货币。

“一化”币铅模，(图十)阳文正书，是专用来翻铸“一化”币钱范的“母范”，发现于上瓦房乡大西沟门。战国时期，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河北北部，而燕山以北相当广大的地区仍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一化”币

铅模的出土，充分表明这里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是占有着重要地位的。

“半两”币。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起第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半两”钱就是秦始皇至汉武帝时期的法定标准货币。（图十）

“五铢”币。汉武帝时期开始铸行的法定标准货币，一直延用到隋唐时代。（图十）

“货泉”币。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改变货币形式，常见有。“货布”、“货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大布黄千”等。（图十）

战国以后，陶器的使用更加广泛。不仅有一般生活用具，而且用于房屋建筑。制陶工艺相当成熟，普遍采用轮制法，器形规整，质地坚硬。常见陶器有陶罐、陶豆、绳纹板瓦、筒瓦、山云纹瓦当等（图十一）

隋唐时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其中，金银器手工业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唐朝皇室贵族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金银器皿，朝廷赏赐、臣下贡奉以及唐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等，也往往以金银及其制品作为主要物品。金银器在当时上层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七六年，锦山镇东北约七公里、锡伯河南岸的哈达沟门，出土了六件唐代鎏金银器，形制纹饰十分精美，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这六件银器中，盘四件，壶缸各一件。

四件银盘，形制风格基本相同，均为圆形六葵瓣式，直径46.6—47.8厘米，高2—2.4厘米。沿微卷，用以镶嵌

流苏等饰物，盘底部存有三个等距的向上凸起的圆痕，为当时安装足撑的遗迹。沿面和沿下各有大小花卉六簇，内容、样式变化有秩。盘中心的主体纹饰分别为双鱼、狮子和梅鹿三种动物图案。双鱼体肥鳞密，龙首圆睛，利牙卷舌，唇拱火焰珍珠相向回泳，动感强烈，栩栩如生。狮子回首蹲坐，蹙眉突睛，张牙提爪，卷鬣扬尾，神态威猛而驯服。梅鹿抬首俯卧于花团中，头长肉芝，肩生短翼，身布梅花，敛尾屈足，竖耳展眉，神态恬静而警觉。（图十二）

银壶，形状为腹部衔接的两条大鱼，以尾着地，嘴含壶口。腮、鳍、鳞、睛镌刻精细逼真。通高25.5厘米。

圆罐，高约27厘米，大体呈圆球形。器身满布纹饰，繁缛细密。主体图案为三组梅鹿花环。梅鹿体态丰满，正昂首行走，肩翼飘舞，短尾后掀。姿态生动，神气活现。

在鹿纹银盘的底部有阴刻楷书铭文五十五字：“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刘赞，新旧《唐书》均有其传，说他任“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十余年，死于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传称“宣为天下沃饶，赞久为廉察，厚敛殖货，务贡奉以希恩”，这说明他是一个残酷剥削劳动人民，把聚敛来的民脂民膏大量吞入私囊，并取其一部分进贡给皇帝及上层统治者以邀恩固宠的封建官僚。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表明，在唐玄宗统治时期（712—756年）进奉之风就相当盛行，而德宗时期（780—805年）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门》贞元十二年条注：“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

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琦浙西皆竟为进奉，以固恩泽……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敛不息。”李赞终因进奉有功，于死前四个月升兼御史大夫。

这批银器形体之大、数量之多，造型之精美、做工之精细、纹饰之繁富形象、色彩之金光明丽，在国内迄今发现的同类器物中名列前茅的。它不仅显示了唐代劳动人民高度的工艺水平，也反映了唐朝上层统治集团穷奢极欲，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劳动人民困苦不堪的社会现实。同时，宫廷之物落于塞外荒山僻野，并且器身遭致折损，埋藏又无规律，这更明显地隐含着混乱动荡的时代背景和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

唐代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又日益强大起来。其中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曾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与中原对峙、抗衡。西拉木伦河流域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和主要活动地区，他们留下的大量文物，构成了赤峰地区中世纪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灭辽后，势力南移，与南宋对峙达一个多世纪。蒙古族驰骋大漠南北，相继灭金灭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这些北方民族在同中原汉族的不断交往中，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也给汉族文化以强烈影响，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书写了珍贵的一页。

鸡冠壶，又称马蹬壶，是契丹民族特有的盛酒器。早期的鸡冠壶大多模仿皮囊造型，古朴浑厚，器身粗矮，皮绳、花纹装饰仿制逼真。后来逐渐发展器身变得细高，皮绳等装饰消失，表面光滑而规整。原来上边用以串绳的细

小穿孔变成宽而圆的提梁，并捏出凸凹装饰、状如鸡冠。整个器物趋于实用和精巧。这种器物在契丹族的各类墓葬中常有出土。（图十三）

在契丹族的瓷器遗物中，长颈瓶、鸡腿瓶、剔花罐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图十四）

一九七三年春，永丰乡当铺地出土了一块八角形契丹小字铜镜。（图十五）据专家考证，四字铭文是一句吉祥语，大意是“寿长福德”。这种类型的铜镜过去在朝鲜曾出土过，收录于《古镜图录》等书中。我旗出土的这一块在国内还是仅有的，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契丹族本无自己的文字，后来模仿汉字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随着辽政权的覆灭和契丹族的被同化，契丹文也即不再使用。同时，由于没有留下与之相对应的字书、韵书，可资对照的资料又十分有限，因而释读契丹文如读天书。这面铜镜的出土，为解开契丹文字之谜又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金代，实行军事、生产、行政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制度。我旗出土的“副统之印”、“都提控所之印”、“万户之印”等就是金代不同级别将官所配的官印。都统是一军之主帅，副统则为其副帅，统领万户、千户等下级将官。提控则为提辖控制，总领之义。（图十六）

双鱼铜镜，造型浑厚，是女真族常用的器物。（图十七）

“家常富贵”镜、带柄镜和凤纹镜等则是金元时期常见的铜镜类型。瑞兽葡萄镜始铸于唐代，宋代仍制造使用。（图十七中）

玉壶春瓶，圆腹，细长颈，喇叭口，器表饰以各种纹饰，这是元代很有特色的瓷器器型。莲花高足杯，是元代

瓷器品类中的上乘之作。（图十八左）

铁斧、铁锄、铁犁形制古朴，标志着辽金元时期冶铸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在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葬中，随葬有一组宋代景德镇影青瓷器。其中注壶上缚有一串金链，黄白相映，异常精美。这批瓷器也可谓“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古代瓷器制造业所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而且也说明了契丹族吸收汉族先进文化的历史真实。（图十九）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我旗地下埋藏的大量古代文物，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保护、利用这些文化遗产，正是我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九八五年九月

喀喇沁旗公爷府（西府、小府）

乌秀清、吴紫云

喀喇沁旗公爷府（现在锦山镇）是喀喇沁旗旗治所在地。是本旗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东距赤峰五十一公里，西距承德一百六十八公里，是赤承公路的中转站。它位于锡伯河中游，河水穿镇而过，有两座钢筋水泥桥把镇南镇北连在一起。镇内马路宽阔，楼房林立。镇中心有清代建成的灵悦寺，殿堂巍峨，肃穆庄严。镇西北还有元代延祐年间修建的龙泉寺和天然生成的狮子崖，吸引着远近游客。这里山青水秀，镇容整洁。每当集日，熙熙攘攘，各种摊贩五光十色，农副产品琳琅满目，使得这座山村小镇呈现出一派富饶、兴旺的景象。

这里就是清代康熙年间和硕端静公主的驸马府。和硕端静公主，贵人兆佳氏所生，清圣祖玄烨（康熙皇帝）的第五女儿（有传说是第三女儿这是讹传）。公元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下嫁给喀喇沁旗第三代郡王噶勒藏，时年一十八岁。公爷府就是为了迎娶她而修建的一所豪华的府第。公元一七一〇年（康熙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她三十七岁时死去。她的后人敏珠尔拉布坦，清廷封为镇国公加固山贝子衔，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爷。承袭到第三代丹津达尔扎时，降袭镇国公为辅国公（乾隆二十五年

公元一七六〇年）到第五代降辅国公为一等塔布囊（《承德府志》记载）。

据说，敏珠尔拉布坦在蒙古民族中很有名气，在蒙古王公中影响也大，他图谋蒙古独立，想自己为王，就在府第里修银奩殿一座，工程还没完就被人告发给清廷。皇帝派钦差大臣来查验，敏珠尔拉布坦害怕案发负罪，即令人放火把工程烧毁。等钦差大臣到达时，已无物可凭。他便向钦差大臣谎报说修的是佛殿，因工人失慎着火。他又以重贿收买钦差大臣。这位钦差据报回奏朝廷，此案才销。皇帝为了鼓励蒙古王公修庙，又拨帑银若干给这位公爷，恩准其将庙修好，另外，每年还供给他五百名喇嘛俸银。公爷就用这笔钱修了现在镇内这座灵悦寺。

公爷原来的府第，在现在锦山镇西约三华里后来人们称之为“西府”的地方。这才是驸马（满语称“额駙”）噶勒藏的府第。府门前有左、中、右三通红色影壁，中间一通长十丈，左、右两通稍短些呈“八”字形。影壁以里不准外人通过，否则打死无论。影壁外面立有高大牌坊，牌坊外东西两边还立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字样的石碑。府第分东西两院，东院为驸马院，西院是公主宫，完全是宫廷式建筑，丹青斗彩，极其华丽。府第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显得格外古雅、庄严。府的正门有一副楹联是：“金枝玉叶府，朝郎驸马门”。东西两第各有房屋二、三百间，内分大厅、正堂、寝宫、祀堂、梳妆宫、书房等等。东院大厅正门下方，悬有御赐浮雕九龙匾额，题曰“宜家昌后”四个大字。在封建社会里，皇亲国戚，尊严无比，占有大量土地，驱使着数以千计的奴隶。仅从他的牧地和差役户口这两点上就可见一斑。

当时公爷的牧地范围很广，在围场东跨老哈河至鄂尔噶图接敖汉；南到霍洛苏台接喀喇沁中旗；西至察汗鄂博兰旗王屯；北至霍尔哈岭接翁牛特。西南到气拏瓦河接热河。康熙后期招民垦种，乾隆四十三年改八沟厅为平泉州，理讼治刑，但“凡有疆土，悉归王公”，改收蒙租。仅两府就有一万二千多顷土地（每顷一百亩）。分钱租、粮租、地基、房号银等类。另外，河北的遵化、蓟州还有皇粮庄头每年向公主交纳的胭脂银五百两。在康熙、乾隆时代，每到年终，由庄头亲身送到公爷府，以后派人催收，至民国才止。

专为公爷充当差役的蒙民有二百余户，满族十户（是公主下嫁时带来的，到光绪年间满族差民发展到一百多户）。这些差民都是公爷的奴隶，根本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他们人生权利完全被封建贵族所占有。此外，西府还修大庙一处，名曰：“吉庆寺”庙的规模宏大，有喇嘛一百多人。这些人都是专为公主和驸马求寿、拜福、祈祷、祭祀用的。拨给租地数百顷，作为供养喇嘛和购置香火之用。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驸马噶勒藏虽然因罪被削去王爵降为二等塔布囊，由他的弟弟色棱袭了王位，但他仍然食禄万千，安富尊荣，过着养尊处优的封建主贵族生活。他的后人依然蒙受荫麻被封为镇国公加固山贝子衔。到乾隆二十五年，噶勒藏的孙子丹津达尔扎（敏珠尔拉布坦的长子）又降镇国公为辅国公，虽然爵位低了一等，但仍不失皇亲国戚的地位。随着人丁繁衍，支系增多，家道起落和兴衰的不断变化，到光绪年间仅西府一处又分成三支：额们达赖居正府，人称前衙门；僧格苏达纳木居后院，人称后衙门；色格图居西院，称为西衙门。

色格图人称色火爷，生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任过本旗协理，拥有大量土地，除吃租外，还有把头伙房为他种地。仅围场一处伙房（起名叫“万福柜”）就有土地二十多顷。另外，在公爷府还有商号一处，叫“万福成”（他自己的堂号叫“万福堂”）。他的财势很大，钱库除存有金银外，还有铜钱一垛，穿钱的绳子日久天长就要霉烂，每更换一次，光买绳子就得花铜钱二百多吊。他们昆仲二人，弟弟人称马二爷（名字不详）娶关东郭尔罗斯旗一个蒙族姑娘为妻，他在岳父家因玩火药被炸死。无子女。他的遗孀依色格图生活。

色格图虽身为协理，但对民族、对旗政都没有什么建树，每日除吸食鸦片便是吃喝玩乐。虽有万贯家私，但无子嗣承继，后来过继小府林贝爷的次子巴汉章为子。（蒙名巴彦胡图克）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死去，时年五十三岁。

色格图死去不久，其妻也相继去世，只有他的弟妇二太太。第二年她把被炸死的丈夫的尸骨运回来，耗费巨金大办丧事。这时住西府后院的僧格苏达纳木见色格图门中只剩寡妇和幼子，想乘机攫取其家私。一面兴词起讼，分夺财产，一面聚其家奴争着为马二爷摔丧盆（封建礼法为死者摔丧盆和扛招魂幡都是嫡系子孙干的，不是嫡系子孙的就得分得一部分家产）。正在争执不休时，丧盆被继子巴汉章一方的曹文瑞突然抢到手摔碎了。僧格苏达纳木便鸣枪示警，意在要打群架。当时形成三角对殴的局面（僧格苏达纳木、巴汉章的父亲林贝爷、马二太太），各不相让。幸亏本旗扎萨克派扎兰汪玉成和管旗章京李德旺前往调解，把家财分给僧格苏达纳木一份，马二太太一份，巴汉章一份。事情才算了解。

那时巴汉章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根本管不了家政，差役、奴仆任意盗窃、侵吞，不数年家财耗费殆尽，只剩下一座空房院落，也已荒芜不堪。后来巴汉章成了于捷三的女婿。（于捷三的续房之女于慕贞）于捷三给贡王当总管，家私百万，北京还有街宅。于就把巴汉章和女儿接到北京。家里只托给一个叫黄玉明的差民看管。民国六年黄玉明在一个墙脚下挖到银元宝十八个（每个重五十两），据为己有。给不争气的儿子拿到赤峰去吃喝玩乐，挥霍浪费。不久，被人看破事发。巴汉章知道这一消息后，便派他的管家于占全的父亲于××到公爷府巡警局控告黄玉明。黄被捕，严刑逼索。银两已被耗尽，仅剩元宝四个。于又勒索黄玉明的哥哥黄喇嘛（黄喇嘛很有钱，啃骨头肉少的都不要），说他是黄玉明的窝主，逼他赔出银洋八百元。黄喇嘛破产抵债，存款不足又卖了五十亩地。黄玉明经不起刑讯，吊死在衙门里。巴汉章把逼出的钱送给巡官段品三两个元宝，余下的又被于××留了一部分，自己所得无几。

于捷三死后，巴汉章夫妇又回到西府坐吃山空，但蒙租无人交纳，生活来源涸竭，只得折卖房屋维持生活。给女儿陪嫁就卖掉六间大厅。自己顾全面子，不好出卖，只能托人变卖，这样，免不了被人渔利，而自己所得不多。他的妻子出身于富有家庭，每天以打牌赌钱为业，根本不懂得理家，更谈不上劳动了。巴汉章四十五岁死去。他死时家中只剩下几间空房。不久他的妻子也死了。只有一个儿子名乌鹏寿，衣、食无路，携家去了林东。西府的西衙门到此就全部告终了。

西府后衙门的僧格苏达纳木，娶本旗乌梁乌苏鲍三之

女为妻。鲍三是本旗扎萨克亲王贡桑诺尔布的亲娘舅。在从色格图那里分得一份家产之后，又继续到处勒索。十家是他吃租的地方，那里出黄金，民国初年那里的满民就私挖黄金赚钱，僧格苏达纳木便率领他的差役稽查私矿，勒索矿民，每次都罚以重金。以后索性和他岳父合伙自己开矿，以期全部垄断。但因基金不足，工人怠工所以获利不大。后来他又想出一个办法：“吃山份子”，每年向采金者征收定额现金，定额由他出，这样，他既不用投资，又坐享许多成果。

民国建成之后，王公势力也随之衰亡。抗租、抗税、抗差、抗役之争彼伏此起。这些人随着政治上的失势，经济也日益窘迫，僧格苏达纳木一家，也不得不靠着变卖房屋、古董、衣服、绸缎、首饰等物来维持生活。那时有三个人是僧格苏达纳木家的掮客：肖培兰专卖房屋，元喜卖古董、首饰，钱福卖衣服绸缎。三个人在衙门院内出出进进，走房串屋，言听计从。贵族老爷靠他们出卖家私维持生计，他们靠贵族老爷以饱私囊，真是相得益彰。

僧格苏达纳木生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死于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死时五十三岁。后衙门从此已属他人之手。

前衙门的额门达赖，人称额大爷。因为他到了民国时代还留着一条长辫子，人们又叫他“辫子大爷”。他的妻子是翁牛特台吉鲍大爷的女儿。据说，他是西府三支中最忠厚的一个。对待差役、平民也比较温和。他酷爱戏剧，每当唱野台戏时，他总是跟着戏班看，家里一切竟不过问。有一次他叫差民拆房六间，说完便去看戏，等他回来时却多拆了好几间，差民没告诉，他也不知道。

额们达赖也和其他封建贵族一样，生活腐化，挥金如土。每到一地去收租，直到耗费完了才回家。到他的晚年，也只能靠拆卖房屋维持生活。终生无子，于1946年五十一岁死去。

以上是西府驸马公爷后裔的衰败情况。下面再简述一下小府的变化：

小府是辅国公罗卜藏车布登的后裔，到清末又分成七支。原来的府第已住不下，于是就各自修建宅院，在公爷府镇内外出现了贵族宅第相连的局面。第一支喜大爷（名字不详）此人没有子女，他死之后已绝支。第二支是诺恒山，人称诺大爷，他也没有子女。第三支苏达诺睦，曾任本旗度支局长，后因事被撤职，又到哈尔滨一家报馆任主任。辛亥革命后回乡休老。他有六子，长子乌古廷（名臻泰，“古廷”是他的字），德穆楚克栋鲁普投降日本组织伪蒙疆政府时，他曾当过蒙古军总参谋长。第四支金三爷（名字不详）原住河南围场子，清末卖给八大家，修成围子。解放初又改建成粮库。第五支温大爷（名字不详）他也没有子女是绝支。第六是扎二爷，生二子，长子名乌克昌，次子乌启昌，第七支金大爷，原住通兴当的前边，后来也卖给别人了。生有一子，名乌云庆。以上是小府的变化情况。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和硕端静公主下嫁给噶勒藏，相继几代，倍受恩宠，封爵受禄，修府建第，荣极一时。特别是公元1698年（康熙37年）康熙帝奉皇太后一同去盛京（沈阳）谒陵祭祖，巡幸边疆，到过此地，就驻蹕在和硕端静公主的驸马府，并在这里接受北方蒙古王公的拜谒。这在封建

社会里，简直是无尚荣耀的盛事。和硕端静公主和驸马这次接驾，曾蒙受过皇帝的丰厚赏赐，仅金币一项就有若干。康熙皇帝还有兴游览了龙泉寺。把自己的御用金鞍赠给龙泉寺留作纪念。这些在整个清代都被传为佳话。“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几何时，这些却都变成了历史的陈迹。“世袭王公业，累代社稷臣”的驸马、国公，也成了时代的匆匆过客。当年连看一眼都被视为触犯刑律的森严府第，现在已变成了繁荣的人民市镇。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附：西府和小府国公世袭表

西府国公世袭表（1）

敏珠尔喇布坦 喀喇沁部第三代扎萨克郡王、驸马噶勒藏的次子 乾隆八年封辅国公，二十四年晋固山贝子，二十五卒。

丹津达尔扎 敏珠尔喇布坦的长子 乾隆二十五年袭镇国公，五十八年卒。

永库尔忠 丹津达尔扎的长子 乾隆五十八年降袭为辅国公。道光五年卒。

拉旺立克森 永库尔忠子 道光五年袭辅国公。此后，即免袭。

小府国公世袭表 (2)

罗卜藏车布登 喀喇沁部第四代扎萨克郡王色棱的长子 雍正九年封辅国公，乾隆九年卒。

阿拉布坦 罗卜藏车布登长子 乾隆九年袭辅国公，二十年卒。

拉扎布 阿拉布坦的长子 乾隆二十年袭辅国公，四十九年诏世袭罔替，嘉庆二年卒。

玛哈达尔玛 拉扎布的长子 嘉庆二年袭辅国公，嘉庆十八年卒。

布呢雅什哩 玛哈达尔玛子 嘉庆十八年袭辅国公，二十年卒。

班咱什哩 布呢雅什哩的胞弟 嘉庆二十年袭辅国公，咸丰三年卒。

维噜普仲奈 班咱什哩子 咸丰三年袭辅国公，光绪八年卒。

林沁多尔济 维噜普仲奈子 光绪八年袭辅国公。

札木逊朗扎布 林沁多尔济子 宣统元年袭辅国公。

喀喇沁旗王府祭祀敖包的片断

阎桂芳

喀旗封建王公祭祀敖包是属于原始宗教活动，实际上保留了“萨满教”的祭山、水、火的某些传说仪式，这种活动延续到一九四四年。祭祀敖包先于黄帽派喇嘛教之前，是蒙古民族固有的祭祀活动之一。凡是蒙古民族集聚地区，普遍有祭祀敖包的活动，只是规模大小，形式繁简不同而已。对敖包的信仰高于其它宗教。

王府的祭祀敖包礼仪繁杂，规模盛大，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提高军队素质。赛马射箭，藉的训练军队，使之常备不懈，防止军队战斗力的消弱；尽管历史上政权更替，但它古老的传统形式从不间断，只是活动内容上有所变化。由于举行盛大的祭祀和文体比赛活动，参加祭祀者和观众竟达几千人。一些小商小贩纷纷来此搭棚设摊，经销各种商品，客观上形成一次富有民族特色的交易会。

历年七月初一到初三，举行的三天活动。从一九二三年由三天改为一天。

全旗范围内的参领（扎兰）、佐领都要参加祭祀，有时邀请邻旗的王公贵族参加，以显示喀旗王公的尊严和权威，对其他王公热情款待，以表友好。当然对参领、佐领也要进行适当的照顾。所以提前做好充分地准备工作。王

府院内打扫房屋、准备伙食，委实要操劳一番。

祭祀敖包的天体程序：

一、准备工作

搭帐房：(帐幕)从六月十五日開始，由帐房处头头，名集担负搭帐房的专差人员，将所有的帐房运到敖包广场上晾晒、修补后，即动手按一定格局、等级、顺序一一搭毕。旺王时代搭三十几座帐房；一九〇〇年以后减少到十几座帐房。

敖包的装饰：敖包前的广场，碧草如茵，环境幽雅，陪衬着三围粗的几棵榆树。有大小敖包十三座，中间大型的高为九尺九寸，圆围为九尺九寸；两侧小型敖包大约高五尺左右。先将敖包的石头摆放整齐，插上杨柳树枝，按五行方位插上彩旗，并做些乌鸦、喜鹊的木制模型插在敖包上，挂上藏文写的经文旗幡。把敖包点缀得五彩缤纷，使人觉得庄严肃穆。

供品的摆放：敖包前先摆放好四个兵器架，列在两侧。前两架上只摆放两张虎皮、两张黑熊皮；后两架上插上刀、枪、剑、戟、金瓜、钺斧、朝天蹬，俗称“执事”。平时王爷府院内供奉的执事。(銮驾的来源，当地群众其说不一，有的传说，是王府岗子杨家封“引路侯”时御赐的；有的则说康熙皇帝在“木兰秋狝”^①时御赐喀喇沁王的。)当中摆放约九尺长的供桌三张，前桌只摆放酒具、香盘、腊烛、铜钱等。后两张供桌摆放十个大木盘，内盛些干鲜果品。还有宰杀的五头猪、五只羊、两头牛等三牲品。

比赛场地：当时锡伯河两岸是牧场。王府门前没有任何建筑物和耕地，便于赛马和射箭。但必须划分场地，立

上标牌以示区别。

另外，将封建王公在敖包上举行野餐、晚餐的炊具、生、熟食品备好。

二、祭祀仪式：

祭祀：七月初一日早六点左右，喇嘛们在敖包前大人字型帐房内就开始念“祭祀经《甘珠尔经》吹起了大型铜号，于是锣鼓齐鸣，认真的祈祷奉佛诵经念。待十点钟左右，封建王公祭祀开始，由喇嘛们站立两侧诵经奏乐，放九声火炮（俗称大王炮）先由梅林念祭文，后由王爷或协理斟盏敬酒、烧香、燃表、向敖包上撒些铜钱。这时，凡参加祭祀的成员都要行跪拜礼之后，转敖包三周，王公贵族都按衔着官服，士兵、学生都穿上操衣，运动员背上弓箭、按程序：喇嘛乐队，封建王公、梅林、章京、参领、佐领、王府的骑兵、赛马队、射箭队、摔跤队、教员、学生和地方绅士等”排列游转队伍因王爷或协理参加，所以步调整齐，每个人都很注意自己的动作。

祭祀完毕，王爷举办一次野宴，别有一番情趣。王爷邀请梅林、参领美餐一顿，以示关怀慰劳。仿照清廷的风味，进行烧整猪。由王府的烧整猪厨师，先抬到王爷或协理桌前过目，然后由厨师将其肢解，送到每个桌上。凡是参加游转的成员中午都有野餐，但饭菜等级有些区别。

文体活动：初二是整天的文体活动。第一项赛马，跑到上瓦房一带，参加的骑手有一百多人（分骑兵队、农民队）。蒙古健儿大显身手，争夺名次，这叫快马战；第二项摔跤队大约有三十多人参加。摔跤是蒙古民族传统运动形式，健儿们披肩上衣，下穿五彩裙子，足蹬快靴，体格

都是魁梧刚健，劲力饱满，双方的斗力是很激烈的；围观的人齐高声唱助战歌。第三项射箭人数较多，封建王公贵族一般都参加射箭比赛。箭头(矢)都是牛角和骨头做的，有五个空眼，所以射出后带有响声，中与不中的声音有明显的差异，裁判也比较容易。

贡桑诺尔布办学后，崇正文学堂、毓正女学堂的学生，也在这天参加竞赛，竞赛的项目有体操表演、长短赛跑等。

检阅部队：初三主要检阅部队的素质。检阅的科目有队列表演（分为集体和单兵）马术、实弹射击、如一马三枪等。

凡是在比赛中争得一、二、三名的都由王爷或协理赏三杯酒、哈达一条及其它奖品、金钱等。以资鼓励。

晚会活动：在旺王时期在敖包会上组织晚会活动。据老人说：晚上有两处说《蒙古书》的，两处说《好来宝》，一处唱名歌的。

祭敖包，原属纯粹的宗教活动，但到后来却成了政治、军事、体育、文艺和商品交易等综合性活动。

①：木兰是满语：“哨鹿”的意思，“秋猕”古代指秋天打猎。猎人顶着制作的鹿头，吹起木制的长哨，模仿雄鹿的鸣声以吸引诱猎鹿，这种诱猎方式称：“哨鹿”摘自金涛著《承德史话》

王府一带蒙古民族平民 结婚仪式

阎桂芳

蒙古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形成了贵族（那颜）即清朝统一蒙古后，分别授与蒙古封建贵族以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台吉和塔布囊）都属于贵族范畴内。平民（哈斯除），在清代除去贵族外，把蒙古民族都编入丁册，统称为箭丁，即是平民阶级。奴隶（孛斡勒），是指在封建主之家为奴的，即男仆、使女等。他们地位最低，不立户，世代为奴。

由于阶级地位不平等，所以结婚仪式有明显的差别。地位高低，财产多少都是婚姻结缔的先决条件，所以仪式就不可能采取统一形式。

蒙古民族结婚仪式比较复杂，既保持蒙古民族固有的传统仪式，又接受了写满族、汉族某些外容，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

本文所撰的是六十年以前的平民结婚仪式的轮廓。

一、求亲（定亲）

蒙古民族男婚女嫁同样由双方父母做主，根本没有个人婚姻自由，也就是执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看姑娘相媳妇都是男方父母利用机会偷偷的先看一下女方

身材和面貌，认为合适再邀请媒人带领儿子去求亲。女方同意后，要设宴招待，在筵席上双方商讨定亲日期。定亲时男方给女方的定亲四合礼，给女方带坠子、带镯子，给一身衣服。（这是接受了汉族的习惯）向翁姑敬酒赏给一点钱。

二、迎亲（娶亲）

娶亲头三天必须把大四合礼送至姑娘家。女方陪嫁一对柜、一对春凳、茶坛、掸瓶、帽盒、匣子等奩礼品。大四合礼和陪送的嫁妆是互相交换的条件，只要要四合礼就必须陪送这些礼品。从不要身价钱（彩礼）。

娶亲必须套两辆车，一辆是小车子接新媳妇的；一辆是大车拉嫁妆的。共去七个人，一名押车的小姑娘，二名老板（车夫）、一名是新郎、一名倍员，两名“忽答”（“忽答”就是亲家）一名为首席“忽答”（代表直系亲家）另一名为二“忽答”是邀请来的，须有丰富的语言知识，善于雄辩，又能唱歌曲，还能念蒙古经文的，才能充当二“忽答”。

迎亲的仪式：

1. 献礼和唱赞歌：娶亲车必须日落前赶到。女方一瞭望到男方的迎亲车，即通知女方“忽答”，把大门关上，“忽答”在里边答话，娶亲的二“忽答”高声大喊：“开门看狗，对方答：“狗没在家，出门打猎去了”。男方“忽答说：“唉！什么？狗打猎去了，被我们打猎的给收拾了”。（实际是讽刺对方）。女方“忽答”说：“我们就是不开门，你们怎样呢！”。男方答：“我们查了好日子，选择好时辰，是来娶亲的”。女方答：“娶亲为什么不提前

通知，来的这么急速？什么好日子？好时辰？上五台山从南道上走，去北京从房西路上走，车到门口上不献礼，嚷嚷什么？”男方答：“我们的礼物在车上呢？”接着男方娶亲的在大门口放上桌子，摆上两坛酒，一个煮熟了的绵羊头，羊头上贴上一块红纸，后边摆上带有后腿的羊尾巴，两边放上用红绳串起来的二十——三十个铜钱。摆放好后，即由男方二“忽答”，躬身施礼，便唱着说：“盛满了两坛子上等的醇香酒，一百多斤啊！一个完整的又胖又肥的大绵羊哟！两边放着两大串铜钱哪，是感谢帮助新娘做针线活的酬谢钱哟！”女方“忽答”说：“只有礼品不行，还得唱吉祥的赞歌来。你必须唱“驼金山”、“金马”两个歌曲，男方“忽答”唱完歌曲后，才开大门迎接进去。

2.下马饭：把娶亲的迎接到屋内后，摆上糖果，只喝一杯茶的时间。即开始吃下马饭，上般是八碟菜、两壶酒，有的少量吃一些，有的根本不吃看一看就撤下去。是礼节性的，但不准备不行。

3.敬天、敬地、敬岳翁姑：（俗称抢羊五叉）“把羊五叉放在木盘上，并邀请岳父母上座，娶亲的陪伴。由新郎用刀子割下第一片肉敬天地、第二片肉敬神佛、第三片敬岳父母，在第四片肉献给新娘时双方争夺羊五叉，热闹一场，一般的要由女方“忽答”抢走。

4.开席吃饭：吃席前双方“忽答”说些客套话，有的唱宴歌。一般是丰盛的二八席。席间新娘给娶亲的每人赠送一双鞋和敬献哈达一条。

5.求名、求岁数：这是一个热闹场面，也是考验和戏笑男方二“忽答”的一个机会。开始几名姑娘围在中间，

坐在炕上，女方“忽答”陪同在场。由男方“忽达”躬身施礼边唱着歌边做着动作说：“你家姑娘名子叫什么？”。女方：“忽答”不直接告诉姑娘的乳名。只点出蒙古民间流行的名歌《老姑娘》。男方“忽答”就唱《老姑娘》歌曲之后，女方又提出很多名歌，例如《万里》、《四海》、《二十四孝》等。歌曲唱完几首。女方再提出一些歌曲有意地把男方“忽答”难倒。不能唱时，即由女方“忽答”说：“你不会唱了，认老师吧？先请个安，敬三杯酒”。男方“忽答”按着要求一一做完，即算完毕。

6. 打扮新郎：在地中央放上一条毡子，用胡麻或小米在毡子上撒写个“寿”字。让新郎站在中央，从帽子到鞋袜，全部换新。穿戴完后，在腰带上挂上两条“哈达”（或白布各三尺）园型的荷包等。同时款待新郎一次，有奶茶、炒米、奶油的饭。由女方嫂子喂三口奶食。

7. 上马饭：各种仪式结束后，吃完上马饭，即套车而行（此时新娘向供奉的神佛叩首表示辞别）。

三、结 婚

1. 拜天地：是接受汉族的习惯。依据查好的时辰、吉时已到，不论在家或在途中，就开始举行拜天地。先放鞭炮，烧香、燃表，夫妇双方跪下叩首。二“忽答”诵蒙语的《祭天地经》，另有分头发妈妈（俗称嬷嬷）把双方头发梳一梳，以表结发，并说些吉祥的祝福词。

2. 祭祀火：到婆家，就举行祭祀火的仪式，这是蒙古民族固有的“萨满教”的传统形式。在铁（铜）火盆上架上干柴，点上海灯，向火中放五色布条、干鲜果品。红枣是必备之物，烧一个红枣，就等于敬献一只大绵羊，这种

仪式大部份由喇嘛主持。随之诵《祭火经》后，再给夫妇双方净面净手，表示去秽降福。

3. 新娘的装饰：是接受满族的习惯。新娘所穿的衣服，俗称“衬衣”和“长衣”两种。衬衣是绿色的，带有绣花，的衣服。长衣是红色的没有袖子的外套衣服。鞋是木底的头带垫子（蒙古语叫“商”）。这些妆饰品都是从北京买的，每个自然营子准备一套，以备各家结婚时借用一天。新娘第二天穿男方做的红色长衣服，头戴羊甲头。（形状象宫廷中妃子戴的头饰）八十年以前蒙古青、壮年妇女结婚或每逢佳节和参加别人的结婚仪式时，都戴羊假头。

（实际原是满族妇女的妆饰）

4. 拜翁姑、认亲友：男方将直系亲属，邀请在炕上，新娘向公婆跪下叩首，并双手呈献布鞋两双、哥嫂同样接受两双布鞋。其它人员呈献哈达一条，随后敬酒敬烟、送茶等。每人都要给新娘礼品和金钱。新娘重新跪下谢赏。

5. 招待送亲宾客：蒙古民族送亲有四十人以上。有的竟达八十人以上。不论翁童、媪姑男方翁姑和新郎都要敬酒。同样按礼节热情款待果品名茶、下马饭、宴席、上马饭。

6. 闹洞房：闹房是文明的，让其夫妇单唱、对唱蒙古民族中流行的歌曲。闹洞房只说些吉祥的话，决不说污秽的词句，最后大家一齐唱歌，如“好来宝”等。完了，由新娘给每人斟一杯酒，给一些糖果，大家散去。由分头妈妈铺好被褥，让夫妇二人面对面躺下，把门帘放下。

上述是蒙古民族平民结婚仪式，但各地风俗习惯有异，而举行的仪式也不同，这只是搜集王府一带蒙古平民的结婚仪式。

清 公 主 陵

郑 瑞 峰

公主陵位于我旗十家乡十家村东约二华里的东山根平地上。该陵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之五女端静公主的陵墓。

康熙中期清圣祖曾招喀喇沁第二代蒙古郡王扎什次子噶勒藏为清朝和硕额驸马。于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十月端静公主下嫁到喀喇沁，时年一十八岁，额驸噶勒藏一十七岁。

端静公主死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时，当时三十七岁，其灵柩先厝于大西沟乡之陵沟门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时安葬于此地，群众称此墓为公主陵。清康熙五十?年又奉恩旨合葬将公主尸体移于现四十家子乡柳条沟、驸马陵与和硕额驸噶勒藏合葬(见奉旨合葬碑文)。

按清制公主和驸马是不能合葬的，况噶勒藏曾以罪削爵，而死后不蒙此隆恩，可见康熙对北方之重视。端静公主即已合葬，留此处者当为衣冠冢。

此墓建筑宏伟壮观，前有高大的石雕牌坊，两侧立有花岗石华表，中有碑亭，内置御赐碑一统，其碑文共一百六十五字，由蒙、汉、满三种文字镌刻而成。叙述“端静公主秀淑深宫……丰而处约，勤俭克敦，亦贵而能谦……摧折早令，更念公主之贤，特表丰碑长垂留芳”。碑后建有

庭院占地十余亩，四周砌有石围墙高有丈余共分前后两层院，前院门房三间，里面有东西配房各七间，正殿三间两侧建有通往后院的小门楼，后院正面有大厅七间，均为磨砖对缝，筒瓦盖顶虚殿式建筑。松、榆、杏、杨等树有次序的布满全院。

大厅之后有砖石结构的园形墓顶，高约二米左右，建于高约一米方台中心。方台边缘建有汉白玉的石勾栏，前、左、右三面留有上台的通口，并各有石条台阶五级。正中台级西侧曾留有进入墓穴之隧道，内有方形地下室并石棹石供据传内里曾设两口细瓷缸，内贮清油，系燃万年灯之所在，墓前阶下置一长方形石供桌，边缘的装饰花纹雕刻精细。桌上有石刻供果供饭。

但这座清代公主陵墓在一九四九年春遭到人为的破坏、拆除建筑，挖毁灵堂，扒掉围墙将整个墓地辟为耕地。现只存一石牌坊，一对华表和那统御赐碑。为了保护这些清代历史文物。于一九七六年由旗人民政府对此陵已列为旗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敕 建

和硕端静公主碑文

国家谊笃懿亲没存罔间恩隆淑德典礼频加尔和硕端静公主秀毓深宫祥徵天汉徽音夙著静一禀於性成宝训亲承端庄孚乎内则既履丰而处约勤俭克敦亦在贵而能谦孝慈兼尽方期茂膺乎遐福何遽摧折早龄深切悼怀弥崇优锡更念公主之贤淑俯俞哀子之吁求特表丰碑用彰异数呜呼懿行长垂留芳声於简册褒纶戴焕被宠贲於泉台昭示来兹不亦休欤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立

以上碑文是御赐碑中的汉文，由蒙、汉、满三种文字所铸。原置于碑亭之内。

喀喇沁噶尔藏所尚和硕端静公主圹志文

制曰和硕端静公主朕之女也生於康熙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巳时死於康熙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时年三十有七卜以康熙五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丁酉未时究於白勒图之□呜呼惟尔秉素质温醇居衷淑慎谨之义无违娴习闲仪柔嘉之德懋俭约常守而夙著休风礼法自持而动符懿德异克膺多祚何其不享遐龄悯悼良深怀曷已爰稽古制奄岁有文勒诸贞珉用志生死之年月惟灵其永妥於是焉

此碑文发现于墓室、副室中。

灵悦寺

郑瑞峰

灵悦寺位于喀喇沁旗锦山镇街中路北，始建于清康熙年间，距今二百余年。原寺占地四十余亩，建有经堂佛殿一百余间。兴盛时期有常住喇嘛五百多名，是我旗大型寺院之一。

一、建筑结构：

本寺的佛殿，经堂建筑为歇山、硬山、楼阁三种。这种雕梁画栋、砖瓦齐砌、盘龙庙脊，伸张四厦的结构为中国内地式建筑。寺内建有山门、钟鼓楼、前殿、一配殿、嘛尼亭、中殿、二配殿、大殿、经库等七层建筑，均为磨砖对缝，复合瓦盖顶的砖木结构。

二、原来寺内的布局：

门殿三间，又谓之山门。中有通道两侧立有木栏，栏内置有大型泥塑佛像四尊，名曰“增长广目，持国多闻，四大天王”佛身高大，面目狰狞，身披铠甲，手持兵器，脚踏八怪，端坐两傍。此山门仅庙会时开放，两侧小门供平日出入。

钟鼓楼：山门内左有钟楼，右有鼓楼，喇嘛教俗虽不讲晨钟暮鼓，但作为庙宇此种建筑是不能少的。

前殿三间。为二层天王殿，两例仍有四大天王塑像，其布局与山门同，只是佛象稍小一些。据说这是从公爷的家庙后请来的。有穿堂通往后院。

嘛尼亭：建于中殿前院中心处，内有七尺左右的筒状木轮，称“嘛呢轮”。（人们也叫它转经）在轮壁上雕有：唵、嘛、呢、叭、哒、咪、吽梵文箴言。筒心装有铁制转轴，稍加推动则旋转不已。喇嘛和善男信女进入寺院均转动此轮，口诵箴言以示信仰虔诚之意。

前配殿排列两傍每面三间。内有十八罗汉塑像，高约一米左右，每殿九尊。情态各异、形象逼真，端坐台上栩栩如生。

中殿三间，是寺内中心佛殿。殿内正中，系释迦牟尼立像，背后立有木制隔扇，后有倒坐观音塑像下坐莲台，获法韦陀侍立于后，左红孩。右龙女侍立于两傍，置于悬山之中。

后配殿每边三间。东殿供有燃灯、弥勒，宗喀巴等塑像。西殿为药师、如来诸佛每殿九尊。

大殿：系楼阁式建筑，殿身广阔，雕刻精细，宏伟壮观，素有九九、八十一间之称。内有大小佛像百余尊。前为经堂，每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六月初一至六月十五全寺的大小喇嘛集聚此殿香烟袅袅，灯火熠熠，诵经奏乐，热闹异常。

后殿三间。是贮存经卷之库，内有大型经卷二百余部。经库两侧还修有跨屋每侧两间。

西跨屋：为关羽庙，中间有关羽坐像，两侧为周仓、关平站像。

东跨屋：为喇嘛经塾，是小喇嘛学经之所。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利用佛教来麻醉和束缚人民的思想，他们营造佛殿，塑造偶像、大量吮吸和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灵悦寺的一砖一瓦无一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凝结而成。结构之严谨，建造之精巧，规模之宏伟、壮观，也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能，是我旗古代建筑史上的一项巨大成就。

解放后，灵悦寺院内设过建西县政府小学校、广播站、文化馆等单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破四旧为名，砸毁殿顶的宝刹、螭吻、脊兽；涂抹了房梁屋栋上的彩绘；推倒了大殿的佛像；烧毁了寺内的各种经文。将一座幽静而整洁的寺院破坏得破烂不堪。

三中全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每年都拨款维修基本恢复了原貌，现在成为全旗各族人民的文物宝库和游览场所。

福会寺（藏名叫盖草灵）

阎桂芳

福会寺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是我旗最大的喇嘛召庙。在全盛时期，（乾隆年间）喇嘛人数曾达四百五十人以上。

福会寺从建筑上分为两座院落：①外院周围用红砖砌成花墙，故称为花墙院，大约占地六亩多。南门、东西门，每个门旁设有两个“麻尼轮”轮上镌刻着梵文“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箴言，内盛印一万个六字箴言经文。每逢正月、四月庙会时，年老的善男信女转庙祈祷。手持“嘛呢珠”（也叫素珠或念珠），口念六字箴言，转到“嘛呢轮”前要虔诚叩首，并旋转“麻尼轮”转一次等于念一万个箴言。靠近北面，立有旗杆两座。建有东西厢房各五间，东厢房是喇嘛大型活动做饭的伙房，内接装五个铸有六字箴言的大铁锅，其中有最大的可容一石二斗米饭（大约一千另八十斤）西五间是庙仓。②主庙分为五层殿。三层天王殿建在月台上，内塑四座天王像，造型生动、神态各异，各持蛇、宝幢、琵琶、宝剑，脚踏八大怪，形象威严。两侧有门，平时只开西门；二层殿（新庙）五间，供奉无量长寿佛和各种形态的菩萨二十一座。东西陪房各三间，西三间住“高日尼”喇嘛两名（高日尼是供佛看庙人的名称），

东三间为“格斯贵”“德木其”办公场所。院内有钟鼓楼，西鼓，东钟。奉佛点香、燃海灯后，由“高日尼”值班喇嘛，在日没后，先敲鼓，后打钟，（次序是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三层殿（都根）上下两层，为七七四十九间。建筑和陈设，宏伟、壮丽、精巧、玲珑，飞檐翘角，昂首凌空，前后檐用双层斗拱、装饰。上层正中为大悲金刚（千手观音），两旁为十八罗汉。下层为经堂，主要供奉的是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也是念大经的大殿，东西陪殿各三间。东三间供奉“道什德”是各业凶恶面目的武神，即伽兰神。手持各种法器的二十六座佛。两侧立有兵器架，上插些刀、枪、剑、戟、斧和黄色幡旗。供桌下摆放着木制的神犬、神虎、神豹、神狼、神雀模型，形态逼真，栩栩如生。这些禽兽都是武神的随从和法宝。此殿的塑像给人们一种恐怖感。西三间是保存《甘珠尔》经，一百零八部（梵文四科全书）《丹珠尔》经，二百一十六部（是甘珠尔经的注解）；四层殿（召庙）楼式三间，供奉“释迦牟尼”（如来佛）雕塑精美，陈设华丽。并供奉“曼陀罗”一座，释为宇宙世界，东西南北分为四大部洲和四小部洲；五层殿（满达林庙）上下两层，主殿三间，供奉六米高的“满达林”塑像，（弥勒佛，也称为未来佛）左右十八罗汉，雕塑细致。东西耳房各三间，西三间供奉第一世班禅“克朱节”、第一世达赖“根敦朱巴”（他们是宗喀巴的主要弟子）以及有声望的“葛根”（转世灵童）十三座。东三间供奉七座佛（名子不详）。从四层殿到五层殿内，东西厢房各八间，西八间为喇嘛学校。东八间的南两间供奉“阿弥陀佛”其余五间住“高日尼”喇嘛，他们主要责任是供佛，看守庙宇。东西建立七米高

两座藏式白塔。有的说“舍利”塔。（已拆毁）

主要法会活动：福会寺是属于喀喇沁王的召庙。主持喇嘛（也叫当家喇嘛）都是历代喀喇沁王的直系亲属。到贡王时代，俗称八爷喇嘛（官其扎布）是十二代王贡桑诺尔布的叔父，曾在西藏学习经文六年，被“达赖”晋爵为“堪布”封号。所以，该庙从客观上形成了权势大，经济足、戒律严。所以宗教活动频繁。法定有两项：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刮风下雨，值班喇嘛早四点即吹起海螺，集中所有喇嘛上殿（都根）奉佛诵经，主要对黄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进行赞扬、歌颂的经文。大约三十分即完毕，散时发给一张纸条（一张纸条付给一斤左右小米）五天到庙仓领一次小米；②全年整日大型法会累计就有九十六天（包括“伊日爱”经四十五天，主要念“格斯勒”二十五条“格楞”二百五十三条清规戒律经，凡参加念经的喇嘛，服装都要按戒律穿戴）。仅在一九三二年集中念经喇嘛有一百五十多人。因整日奉佛诵经，由庙仓负担伙食，（吃什么饭，都要按档案规定执行，一般不得随意更改）。由“尚斯达”（掌管经济）喇嘛委派“德木其”去筹划伙食。并接受善男信女的施舍。

在一九〇〇年以前，清规戒律较严。喇嘛各户必须做好三件事（卫生、供佛、诵经）。“格斯贵”（掌管戒律）喇嘛，带领四名青年喇嘛，手持戒棍，按片巡视或抽查，发现喇嘛不法行为越规行动，就要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惩罚，只要传到东厢房就要挨板子。晚上听到钟声后，喇嘛们就开始奉佛诵经，已成常规习惯。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喇嘛人数减少，清规戒律已逐渐开始松弛下来。

一、跳“查玛”是主要宗教活动：（原意是戴假面具

的午蹈)

福会寺“查玛”是属于镇妖除邪的。主要镇压喇嘛的仇敌“朗道日玛”而举行的，历年正月、四月十四、十五日举行。参加表演的九十四人（其中戴假面具五十九人）出场顺序：

1、四大天王：戴假面具、身着铠甲，各持蛇、宝幢、琵琶、宝剑。四人；

2、胡得嘎勤：（男丑）头戴骷髅假面具，手持红色带有骷髅的木棒。六人；

3、蝴蝶：（女丑）头戴骷髅假面具上按着五个小骷髅，手持红棒，身穿五色裙子。四人；

4、阿斯楞：头戴海螺式面具，身穿黑紫色绣花衣服，手持虎尾鞭子。四人；

5、对司：头戴狰狞面孔假面具，身着各种颜色的蟒袍，实际是“道什德”出场。八人；

6、小查麻：戴各种不同形象凶恶的假面具，身着彩缎三角袖子衣服，前两名手持法绳。二十一人；

7、大查麻：头戴大型黑色圆型帽子，身着各种颜色的三角袖子蟒袍，手持降魔杆，铜铃。三十五人；

8、弥勒佛和娃娃：身着兰色锦衣，头戴假面具。弥勒佛手持只有十八个珠的大念珠（代表十八罗汉）表演一番即坐在西旗杆座上。八人；

9、地方神和娃娃：身着黄色衣服，坐在东旗杆座上三人；

10、鹿神：身着黄色衣服，头戴马鹿面具。一人。

格鲁派所举行跳“查玛”活动。使人看了毛骨悚然，把你引向恐怖世界，以此表现出神的威力，给人们一种神

的信念。实际是难看得很，狰狞面孔手午足蹈，加之鼓、号齐鸣，使人无法陈述清楚。

喇嘛教跳“查玛”实际上是以宗教形式反映西藏的一次政教斗争。在公元九十世纪，藏王朗达马灭佛毁法，使用暴力废除佛教，史称“毁法时期”。从此佛教一蹶不振。藏王朗达马与宗教结下了怨仇。经过两个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佛教又在西藏兴起。从此“格鲁派”举行跳“查玛”活动，以表示宗教与反宗教的斗争。

各类型“查玛”表演动作有异，跳完“查玛”后，喇嘛们吹起大型铜号，击发各种法器，用华丽的锦轿，抬着“弥勒佛”，游转大庙三周。善男信女开始手持“嘛呢珠”口念六字箴言转庙祈祷。

福会寺西庙“生乐寺”举行的“查玛”为迎神、请神时跳的。历年五月十五日举行。（一九三〇年该庙被烧毁而停止了活动），参加表演的三十二人。出场顺序：

- 1、必日那：头戴铁盔，身穿铠甲，手持弓箭。二人；
- 2、胡达嘎勤：（装饰与福会寺扮演者同样）。六人；
- 3、阿斯楞：手持扫帚，表示打扫卫生来迎神。四人；
- 4、藤牌：穿黄色士兵衣服，手持盾和单刀。四人；
- 5、都督目：长发，持截肢的手足模型，一手持人手、一手持人足，加之狰狞面孔，甚是恐怖。四人；
- 6、格楞：受戒喇嘛，手持木碗、禅杖。四人；
- 7、大查玛：头戴黑色圆型大帽子，右手持人颅骨的钵，左手持降魔杵。八人。

意思是把大神由西藏请来，消灾降福，镇压邪魔而举行的活动。这种“查玛”一年只举行一次。

二、请天神：

请天神活动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寺庙本身举行的（即生乐寺的请天神活动）。集中多数喇嘛诵经后，由身体魁梧的受戒喇嘛为神的替身，身穿铠甲，头戴重铁盔，手持宝剑，大闹一通，不知说些什么，只有主持喇嘛做翻译，以此扩大宗教影响，欺骗善男信女进香、施舍，另一种是信徒“请天神”，要求念什么消灾降福的经文。仪式开始先由八——十二人念一阵请天神的经，然后由替身喇嘛手足足蹈，全身抖搂一阵后，由替身传话的神使写出经文（念经的名称）或由替身喇嘛用箭（矢）指向经文。大意是应当念什么经，请多少喇嘛，念几天经文，可以消灾降福。当然神使根据请天神信徒的身份、财产、信仰程度而下达旨意。不论请哪一种天神，都必须头一天吹起大铜号，先向天神下个请贴，要求光临。

三、海灯会：

海灯会是历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祭祀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举行的法会活动。黄教普遍认为宗喀巴是十月二十五日降生的，又是园寂的日子，所以，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大型法会活动三天（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在二十五日晚八点左右点燃起海灯三千个（其中铜的一千个、泥的一千个，面的一千个）。手提油瓶、香烛的善男信女达几百人，加上闲逛寺庙的竟达二千人左右。凡是到寺庙的信徒除添油进香外，还要施舍些金钱。这一活动影响了群众，模仿寺庙海灯会，蒙古民族在家庭中普遍有点燃海灯的习惯。（都是用荞麦面做的）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巩固和管理，采取了联姻、赏赐、加封等措施，笼罗了蒙古上层分子。同时还利用宗教作为手段。为此鼓励和支持黄教，大兴土木，不惜耗费重资修建庙宇。在宗教气氛的掩盖下，包含着浓烈的政治色彩。宗教都是灌输给人们的精神鸦片，是腐蚀灵魂的麻醉剂。而放弃了斗志，麻痹了强悍、尚武的精神，信仰喇嘛教给蒙古族带来了无穷的毒害，人口减少，妨碍了生产的发展，使民蒙地社会经济停滞。最终，只好老老实实听命于清朝的统治。

抗日战争时期的史东江

史东江忆述 赵振德整理

史东江已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现在住锦山镇小府，原籍是大牛群乡嘎巴沟的，伪满时曾当过二年大金家地甲甲长。经过四十家子柳条沟他叔伯哥史东坡的介绍，从一九四三年以来就和抗日游击队保持联系，为我们党做过好些工作。当时的抗日领导干部杨雨民同志也了解他，直到土改后还有书信问询。那时他们兄弟四人同居，大弟史东碧就是为了探询因掩护八路军而被捕入狱的，弟弟史东江，而惨遭敌人杀害的。这次我们怀着钦敬的心情访问了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下面就是他对被捕入狱和长兄惨遭杀害一段情景的回忆：

“我叫史东江，今年八十二岁了。我们亲哥四个，大哥史东碧，二哥史东元，老三就是我，四弟史东海。大哥因为到监狱探问我，被敌人施用各种毒刑之后，装在皮口袋里摔死了。我因为掩护八路军被捕入狱，受尽各种刑罚，当了一年囚徒，直到一九四五年农历腊月才几经曲折回到家里。”

老人说到这里，眼睛有些湿润了，看得出往事引起他无限伤感。过了一会儿，他慢慢抬起头来，目光也亮了起来。四十年前的苦难经历，依稀发生在昨天。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随着他滔滔的语言，表述出来。

“那是一九四三年农历正月间，我们一家人吃完早饭坐在屋里闲谈，这时大门外来了一个人。他站在门口，没有进院，也没招呼人，只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地来回踱着。于是我叫家里人出去看看问他是找人还是有事。家人回来告诉我，是个过路的说要找口饭吃。我走到门外一看，只见他穿一身青棉袄棉裤，肩上背着一个马褡子，戴着一顶黑狗皮帽子，一看他的衣着就知道不是靠乞讨为生的乞丐，交谈几句，听出他是河北口音。当时我想：现在是新正大月，远路来此，找口饭吃，如果不是迫于路途上的穷困，谁能这样做呢？一股同情心理产生了，于是就把他让到屋里摆出饭菜招待他。吃饭时我问他：

您从哪儿来？

“我从四十家子柳条沟来。”

“听您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我是河北蓟县的。”

“柳条沟有亲戚？”

“是朋友家。”

“姓什么？谁家？”

“史东坡。”

啊！史东坡！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前不久东坡哥曾到我家来过，他私下告诉我，他家里来过几次八路军了，日本鬼子长不了啦。这位找饭吃的人是不是就是八路军？于是我热情地对他说：

“史东坡是我哥哥，既然他是你的朋友，就更没有外人了，您到我家也要象在他家一样不要客气，实实在在的才好。”

“我听东坡哥介绍过你，今天才特意来你家串个门，今后有事还请您多帮忙。”

通过简短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我已经知道他就是八路军了。他告诉我，他叫刘延民，随之又询问了一些风土人情、地理环境、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事情。天近傍晚，他才告辞走了。

几个月过去了。转眼到了农历四月间，正是田垄青青快要下锄耨地的时候，他又来了。这次已是故人相见，彼此都很亲热。据他说，此次是专来了解从公爷府到赤峰有几个警察署和分驻所，有哪些地方派了宪兵队，公路两旁驻有多少军队，营地在哪儿，地方上有哪些坏人，老乡对敌人的情绪怎样等等。他又和我谈了许多抗日战场上的胜利消息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我听了之后，受到极大鼓舞，第一次感到做中国人的尊严。

从此之后他还来过几次，都是为了弄些胶鞋。袜子、鸦片等物资。

一九四四年农历二月的一个晚上，刘延民带着十二个人来到我家，他们的行动很神秘，白天呆在屋里，谁也不出去，外人根本看不见。直到第二天晚上夜静更深了，他们集合要走。我问他们往哪里去，刘延民悄悄对我说，要去小庙子抓吴树林。吴树林是汉奸特务，他的住处小庙子离我家十里地。临走时我提醒刘延民说：“吴树林可有枪呀，你们要多加小心。”他点点头说：

“我们这次不想要他死，是去教育教育他。”说着他们就出发了。

他们走后，我们也没敢睡觉，静听着小庙子方向的动静，想象着可能出现的情况。忽听传来一阵不太急促的枪

声，我的心情更紧张了。约莫有两个小时左右，他们又返回来了，背着一个腿上挂花的伤员，血流如注，这个人有时还发出低微的呻吟。我看到此种情况，吃惊不小。刘延民告诉我：在他们到了吴树林家之后，把人散开就去叫门。这时门没有开，就听见屋里有开柜的声音，接着吴就向外开枪了，于是他们也朝屋里还击。吴在黑夜中边打边向外冲。在拦截他的时候，有一个同志被打伤了。吴树林很狡猾，在夜幕的掩护下，终于跑掉了。等他们冲进屋里一看，吴的老婆被打死了。他们返回来是要我帮助把这个伤员给安置起来。交代完了，他们连夜就走了。

这时，午夜已过，不久，天就要亮了。我想，吴树林跑掉必然带着敌特回来报复。我离他这么近，怎么能藏得住这个伤员呢？我焦急万分。事迫眉睫，万全之策必须把伤员掩藏到别处去，即使敌人搜查，也不会被他们拿到实证。于是我连夜找来几个贴己人有边老四、卜延龄、陈树本和陈秀本又加上我两个哥哥，抬着伤员从杨树沟过梁，到桥头湾子，从那里过河又奔柳条沟，送到我叔伯哥史东坡家。这整夜的折腾，恐怕伤员受不住，临走前我给他抽点鸦片烟。后来，史东坡又把他护送到柳条沟脑小玉皇顶李万良家，直到伤愈才归队。这个人的名字叫管振祥。

吴树林逃跑之后，连夜到公爷府警察署作了报告。第二天高警尉补（名字记不起来了）就来到我家了解八路军袭击吴树林的情况。因我当甲长和他们都相识，他没隐瞒把来意向我直说了。我很热情地用茶饭和鸦片烟来招待他，他也没有深究吃完饭就走了。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我和八路军的关系被吴树林知道了。他知道我和地方官署比较熟，怕告不倒我，就直接到

喀喇沁右旗旗公署警务科告我私通八路。这一下告成了，我被当做要犯由日本人警察讨伐队长板平带着十多个警察把我抓到警务科。这是四四年农历五月间发生的事情。

进了警务科就象进了魔窟一样，先是“劝”我自首，要我说出怎样通的八路军，这股八路军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我和他们的关系，都给我布置了什么任务，还有谁和我联系。我只承认八路军到我家来过一次，他们人多又有枪，我也没有办法。此外，没有任何联系，别的情况一概无知。敌人哪里相信，接着便施以各种毒刑，把我吊在屋梁上，三个人用皮鞭轮番抽打。又把我顺着一条长凳绑上，然后头朝下把凳子竖起来往鼻孔和嘴里灌凉水、火油和辣椒面，还有轧滚杠坐老虎凳，警务科所有的刑具几乎都尝遍了。入狱一个月，就死过去五次，每次又用凉水激过来。虽然关在铁窗之内，仍然镣铐加身，防范森严，因为把我当成是重要的“国事犯”。

说来也怪，尽管酷刑把我磨折得血肉模糊，伤痕累累，但那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招供。一旦承认了，就会被处死。只要不招，不管敌人怎样狠毒，也不至于无凭无据就处以死刑。因此，横下一条心，就是不承认。

农历十一月间，我已入狱五个多月了，和家里关山望断，音信隔绝，心里着实悬挂着。虽然身锁铁窗之内，但心里却象万涛波顷一时也不平静。怕那个伤员被搜查出来，事情的真相就会全部暴露出来。又怕家里人经不起敌人的威胁说了实话。还怕吴树林这个特务来我家寻衅报复。整天忧心忡忡，如坐针毡，至于我自己的死活几乎无暇考虑了。

一天，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已经搁置了一个多月没有

提审我，这天忽然提审了。敌人个个凶相毕露，面目狰狞。又是一番毒刑，又是一番逼供。我一如既往，咬紧牙关和敌人周旋。最后从敌人嘴里透露出我大哥也被捕了。我一听吃惊不小。当时我想：刘延民几次来我家，他都知道，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付敌人他既无经验，也缺乏胆略，敌人是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完了再治罪于我。一旦他经不住酷刑折磨说了真话，我们这一家就要遭殃。我越想越怕，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但是只提审了两次就又搁下了。我又想可能是敌人在耍花招，我大哥未必遭捕，于是我也稍微平静了。可是，有谁知道事实比我想得更坏。原来在我被捕之后，家里人忧心如焚，想不出搭救的措施。也曾托过几个人，人们都说案情重大又是日本人直接插手无能为力。

刘延民很快就知道我的遭遇了。他派我大哥去平庄（旗公署所在地）探询我的情况，看是否我承认和八路军的关系，只要我没承认，党就设法营救我。不料我大哥刚到平庄，就被吴树林发现了。他向警务科特务股作了密告。敌人正从我身上得不到什么，就想在我大哥身上打主意。为了一举打开缺口，把他抓起来之后，没容喘息就用毒刑摧残，狠毒至极。最残忍的是把他的上下颌骨都打碎了。

（这是后来起坟时才发现的）。仅仅十天时间便把他活活折磨死了。听说最后是装进皮口袋里摔死的。

我大哥死了，口供仍然没有取到，对我的审讯又暂时缓和下来。到了四四年的腊月，警务科从赤峰地方法院找来法官和书记员，就地审判我，说我是反满抗日的思想犯，完了，就把我送到锦州高等法院的监狱里。在那里坐牢坐到一九四五年的九月，直到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监狱没

人管了，我和其他难友才跑出来。当时不知家里是什么情况，没敢回家，跑到沈阳一个朋友家住了几天以后，又跑到长春。颠沛流离直到这年的腊月，才辗转回到家里。

解放后，我给杨雨民同志写过信，向他述说过我一家的遭遇。来我旗工作的辛丁部长和杨金鳌区长，都多次来过我家。也曾在我家存放过东西，后来杨区长被李奎武给杀害了，辛丁同志去参加隆化战役后再也没有回来。临走时还骑走我一匹白马。我大哥史东碧后来被追认为烈士，遗属都享受烈士家属的待遇，但不能按地主分子对待我，以后生活上有了困难，他还可以帮助我。以后听说他给村里来过信，打听我的生活情况，不知是谁替我回绝了。他给我的信，我一直保留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抄走丢失了。

听完老人的叙述，我心中不胜感慨。胜利会使人陶醉，使人昏昏，但又有多少人认真计算过它的代价呢？史老的遭遇仅是一家，在夺取革命胜利的斗争中，象他这样做出牺牲、献出亲人的何止几千万人。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和牺牲总是成正比，牺牲就是衡量胜利的砝码。象我们这些幸存者和后来人，对为胜利而做出牺牲的烈士和前辈们不应该给予关怀和钦敬吗？

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游击 队在我旗活动简介

赵振德调查整理

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热河省的土地，汤玉麟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指导下，从地道里逃出承德离宫他的都统署衙跑到关里去了。从此，热河人民从军阀统治又走进侵略者制造的人间地狱。从此，真是腥风血雨，黑夜沉沉，

但是中国共产党总是与中国人民患难与共，息息相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全国人民，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和侵略者进行英勇斗争。

一九三三年，日寇占领热河后，中国共产党即派冀热特委李子光同志领导热河人民的抗日斗争。

同年十月，李运昌同志在迁安、遵化、青龙之间组织了一千五百人的武装抗日。

一九三四年兴隆黄花川抗日志士孙永勤组织数千人起义，转战于承德、兴隆、青龙、遵化之间，党派冀东特委的王平陆同志前往指导。

一九三八年元旦，王平陆同志又组织游击第一支队抗日，活动在遵化、迁安、兴隆、青龙之间。王平陆牺牲后，党又派彭夫、高振东二同志率部队进行斗争。同年又有邓

华、宋时轮领导的邓宋纵队由平西挺进冀东、热河，在兴隆组织八百人起义，建立丰滦兴联合县。任杨春甫为县长。邓宋纵队返回平西后，留下包森，赵立叶两个支队坚持热河地区的游击战。

一九四〇年三月至五月，肖克同志指挥八路军的七团，十团进入热河，建立丰滦密联合县。八月七团进入丰宁和围场西部。

同年秋天，日本从通化、吉林、锦州调集重兵围剿。我主力一部撤回平西，十团和游击队仍坚持当地斗争。敌伪集中六千人的兵力自北向南压缩我丰滦密地区达七十六天之久。在马家峪我军和日军铃木大队的两个中队激战一昼夜，歼敌一个中队，击退敌人的进攻。九月，周沼向领导的青年工作团深入平泉一带活动。刘汉臣等人在青龙的都山一带进行秘密的抗日斗争，发展抗日救国会会员一千多人。周治国、葛春生领导的青平工作团（这些工作团既管政治、党务又管军事）深入宁城、喀喇沁一带活动。冬季周治国同志又派李秀（中队长）、李长和、李长江、李怀义等十余人深入宁城、喀喇沁、围场等地开展抗日战争。

一九四一年春周治国又派青平工作团领导下的青年游击队五十多人并有二十多名红枪会、黄枪会众由付大队长刘元存、付指导员刘增孝（此人后来因要叛变投敌被处决）、中队长李秀、纪洪恩等人率领游击队深入平泉北部、宁城、喀喇沁、承德北部、围场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就在这一年东局子西南沟的郝瑞廷同志，金家店洼子的刘彬同志参加了高桥同志领导下的游击队。

四一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裴文和（队长）李青山（付队长）苏百熙、苏吉恒等人率领游击队五十多人从宁城黑里

河大营子过新开坝袭击了旺业甸警察分驻所。所长朱文青（福合元正沟朱家湾人）不在，打死警长李福荣（因李名声不好，多次截烟贩子）。

同年六月，敌人的扫荡失败后，冀东区党委及军分区决定全力开发热河，向热河派遣大批干部和两个主力团，为了不叫敌人发觉，化整为零，以排为单位进行活动。就在这以后我旗旺业甸村大店、骆驼山子北沟、罗圈铺的四道沟、新店的小美林沟、东局子的西南沟、五家的屯土沟、王爷府村的白石台沟、哈气沟、公爷府村的柳条沟、樱桃沟、林家营子、郎家营子、永丰太的铁沟门、西桥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八路军的游击队。领导游击队的负责人有马龙彪、（何子桥）、纪洪恩、赵洪武，刘延民、叶××……。

一九四一年冬天的一夜晚，游击队十余人到东局子伪甲长李彦家去捕捉李彦。（家住在台子）。李彦钻进粮秸垛里没抓到，带走了他的弟弟李庆。后来要李彦用三百两大烟，一百双鞋袜才赎回他弟弟。

另外，八路军游击队在东局子西南沟先后处决了死心踏地为敌伪效劳的汉奸、特务何三及其妻子、于占荣（金家店甲长）的一个亲信（专为于刺探八路军情报的）、宁城的两个伪甲长等十余人。

一九四二年五月，冀东军区以四千兵力发动热河战役，在一个月內攻占敌伪据点十三处，并越过锦热路北建立了承平宁联合县。派杨雨民（黄云）为县委书记，周治国为县长，高桥（苏然、徐文良）为联合县区队长，负责领导武装斗争，番号为三区队。此外，还有张立文（民政科长）李正平（宋兴邦秘书科长）陈平（组织科长兼武装科

长)等人。联合县建八个区,喀喇沁当时属第八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是杨防(从二区调来的)。

三区队直属冀东军区领导。八个区的游击队都属三区队领导。所以联合县杨雨民等三位领导人,经常往来于平泉、宁城、喀喇沁、承德、围场等地宣传教育群众,组织民主政权,指挥游击战争,开辟革命根据地。据目前了解到的杨雨民同志就曾在旺业甸东局子西南沟的谭荣家、四道沟的隋家、公爷府樱桃沟朱长虹家、永丰铁沟门偏坡营子李洪儒家、侯家营子张孝德家住宿过,并且杨雨民同志的爱人还在张孝德家生过小孩。

高桥同志也在旺业甸西南沟里于泉龙家、王爷府哈气沟里刘牌长家住过,并且他还和当时在王爷府驻防的伪满洲军×团(团长李甲辰)八连连长张××关系极为密切,很可能张是高桥同志的内线。

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游击队袭击了茅荆坝警察分驻所,拿走了全部枪支。

一九四二年以后,是敌人集家并村,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最严酷的阶段。在热河地区制造了大片的无人区,企图隔绝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于一九四三年二月,高桥同志率领三区队全体战士,一举攻下了宁城敌人的据点,袭击了平泉北黄土梁子附近的敌伪军,抢了敌人的警察署、银行、鸦片组合、兴农合作社,缴获了许多枪支、子弹、货币、大烟、布匹、鞋袜等军需物资,对敌人的震慑很大。

同年七月的一个下午,我游击队公然进入旺业甸村美林沟河北大营子伪宪兵队队部(队长张荣先),适值宪兵

队于本日上午刚撤回赤峰，其家属还没有走，游击队没找到宪兵，又去找为宪兵当特务腿子的王荣。把宪兵的家属吓得喊爹哭娘，当天就逃之夭夭。王荣从此再也没敢回家。

一九四四年二月游击队夜间到公爷府村小庙子捉拿特务吴树林，吴逃走了，他的妻子被乱枪打死。

一九四三年春至一九四四年春，敌人乘我主力撤至冀东恢复被“蚕食”的地区之机，以数万兵力围剿我锦热路北地带。常以优势兵力向我军进攻。我三区队化为小股迂回在朝阳——围场这六百里的空间。有时两三天吃不上一顿饭，一天之内也许和敌人几次遭遇。人民群众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热河四百万人口中，有一百零五万被赶进“人圈”，敌人奸淫掠抢，横加摧残。在这期间，我军干部战士伤亡五百多人。优秀的年轻的指挥员高桥同志牺牲了，三区队的许多中坚干部牺牲了。部队暂时撤出承平宁地区。

尽管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十分疯狂，但抗日救国的各项工作更加活跃了。大批干部以贩卖丝线、木梳篦子、做苦工、打行炉等等形式为掩护，潜入敌后各地，从事秘密工作，准备大反攻。

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中央“扩大解放区”的号召下，六月，解放热河的战役开始了。我军由冀东出发分三路出击：十六分区部队，由东路打到朝阳、绥中；十五分区部队由中路攻到青龙、宁城；十四分区部队由西路攻打隆化、围场。中、西两路合围喀喇沁。八月，战役还没有结束，苏联红军对日宣战了。日寇很快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投降。

八年抗日战争中，我旗各族人民和抗日游击队，与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经历了千难万险，克服了重重困难，为保卫祖国、拯救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日本侵略者在喀喇沁 实行的暴政

吴紫云遗稿 赵振德整理

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举行投降签字四十周年纪念日，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这一胜利来之非常不易，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来说，死亡了一亿多人，从中国的抗日战争来说八年的浴血奋战，牺牲了一千多万人，至于被掠夺和毁于战火的财产就更无法统计了。当然中日两国人民是朋友，中日两国的经济建设也都需要有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友谊，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更应当永远记住受侵略和受压迫的一段历史，把它世代传下去，叫我们的后人永远憎恶法西斯分子，从而振作我们的民族精神，树立中国人是伟大的，永远不屈服，压不垮、打不倒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此，我们介绍出日本侵略者对喀喇沁人民实行的十二条暴政以醒读者：

一、借收缴武器害人。一九三三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热河，不久也进入了我旗。他为了防止人民的武装反抗，第一件事就是收缴民间武器。他们开着汽车按村按甲逐户搜查。大枪、小枪、火枪、弹药、大刀、长矛都在收缴之列。开始派地方保安队到各家明搜，后来又转入暗查。

明搜时除了枪支武器之外，遇有较贵重的金银、衣物、古玩也一并拿走，名为收缴武器，实则公开掠夺。暗查是利用地痞流氓充当特务爪牙，这些人密告谁有枪，谁就被逮捕，刑讯、追缴，为了不遭陷害，只好花钱运动。这样一来，弊窦大开，这些爪牙要想敲诈谁，就诬谁有枪，你就只好贿赂他，不行贿者，轻则花钱买枪，重则坐牢。因此受害者，大有其人。

二、缉私队的扰害。日本侵略者初来时，在赤峰设有特务机关，在我旗设有专卖署。署长和属员多为日本人。他们又招收一批地痞流氓成立个缉私队。他们以收买鸦片、专卖烟酒为名，实际上缉查私藏的鸦片、枪支、金银等物。既是特务组织，又是经济组织。缉私队到处招摇撞骗，恃官诈财，任意闯入民宅，翻箱倒篋，以搜查违禁物品为名，行公开抢劫之实。受害人财物、衣服被拿走，还得忍气吞声，以求性命安全。如果被抓到专卖署，就要遭受严刑折磨，轻则破产，重则丧生。如当时王爷府村哈气沟的王成良，被缉私队抓到专卖署，硬说他有枪有大烟，关押起来吊打刑讯。后特破产买枪买大烟交上，才保住了性命。

三、抓国事犯、思想犯。这是日本占领时期最残酷的暴政之一。国事犯是指具有民族气节、反对日本侵略者或支持八路军、游击队的中国人。思想犯是指不愿为日本侵略者效劳或同情抗日的社会名流、知识分子、有号召力、有影响的乡绅等人。国事犯、思想犯都是政治犯。日本侵略者做贼心虚，唯恐中国人组织起来反抗他们，除了极力收买汉奸、扶植洋奴推行以华治华政策之外，对那些被他们认为不可靠、不可信的人都冠以国事犯、思想犯的罪名

加以监禁迫害。尤其到后期他明知自己的统治难以持久，对八路军怕得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为了苟延残喘他们一面调集重兵围剿抗日根据地，一面派遣特务四处活动，秘密监视被他们怀疑的人。如我旗旺业甸村罗圈铺的高子祥、按丹沟的张武卿（张得到消息，夜间逃走了，敌人没有捕到）、煤窑五家的赵豹臣（赵被定为思想犯后，走漏了消息，赵逃走在外，一直没有回来）公爷府村嘎叭沟的史东江、史东璧、王爷府村哈气沟的刘牌长……都是以这种罪名惨遭迫害的。

四、派劳工、抓劳工。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在占领时期对中国人民实行一条军事上占领、经济上掠夺、政治上压迫的侵略政策。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强迫中国人为他服劳役。当时的旗公署设有动员科，科下设有两个股：一个是劳务股，一个是国兵民籍股。各村都设有劳务系。这些机构就是专为日本帝国主义征调劳工的机构。一年四季征了这次征那次，劳役永无休止，劳工也永征不完。劳工的去向主要是采矿，其次是军事设施。采矿如煤矿、铁矿、铜矿、萤石矿等等。军事设施有机场、挖山洞、修路、筑桥、建仓库等等。少数是工厂、农场。劳工的生活非常苦。穿的是更生布，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工棚。劳动时根本谈不上安全措施。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四、五个小时，有的达十八个小时。略侵者把中国人当做牛马，工头个个如虎狼，榔头棍经常打在身上。繁重的劳动，痛苦的折磨，当劳工的十去九不归。更残酷的是敌人为了保密，有些军事设施竣工后就把劳工集体杀害了。东北地方有许多白骨山、万人坑就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证。

当劳工的全是穷人。劳务股把派征数字分到各村，村再分到各甲。有钱有势的人家，根本不去征，有钱无势的人家，可以花钱行贿免征。只有无钱无势的穷苦人家，才去服劳役。所以灾难总是落在穷人头上。

另外，劳务股和各村劳务系，有的上下勾结，狼狈为奸，故意多派劳工以便接受贿赂卖放，从中鱼肉人民。

那时的劳工除了派征的以外，还有的是抓来的。每次敌人扫荡或在“无人区”抓来的人（敌人在八路军、游击队经常来往的地方，实行集家并村，把那里的居民强行赶进人圈，就把这些地方划为无人区，在无人区再发现有人，不是开枪打死就被抓去当劳工），都被视为八路军或私通共产党，不杀死也得强迫去当劳工。对待这种劳工，更为残酷，多数都被折磨死。

即使这样，仍不能满足日本侵略者的掠夺需要。尤其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就更需要大量物资来支持他的侵略战争。于是又以“勤劳奉仕”的名义把检查国兵不合格的壮丁、中等学校的学生，统统赶去服劳役。

五、集家并村。集家并村是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进行疯狂地反共防共的毒辣手段之一。一九四〇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敌后的抗日工作，不断向东北敌后派遣大批优秀干部，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打击侵略者。而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八路军、游击队，就是以山区为活动据点，紧紧地团结山区人民、依靠山区人民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敌人为了割断山区人民同八路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为了不给八路军、游击队留有立足之地，他把山区人民强迫赶到公路两侧平川地区的人圈

里。四周筑起高墙和碉堡，设立哨卡，委派了部落长和部落警，组织起保乡团和挺身队并发给武器，用来对付八路军和游击队。此外，还实行“连坐法”，如果一家私通八路军，知情不举几家都受惩罚。当时属喀喇沁右旗管辖的五家、七家、旺业甸（包括现在的美林乡）三个村都进行了集家并村。

集家时，限期搬迁，到期不搬者，就派强迁队把房屋推倒或放火烧掉。山区人民本来就缺吃少穿，根本盖不起房子，更何况当时也不允许百姓先盖房，必须先去筑围墙。有亲友的，暂住在亲友的畜棚、碾房内，无亲友的就只有露宿风餐了。原来的房屋毁掉了，山区的土地不敢再去种了，山区的人民生活来源枯竭了，饥寒交迫，贫病相加，由此而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

六、缴纳鸦片勒索罚金。日本略侵者迫使被占领地区的人民按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种植鸦片（具体到某一地区即达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向各地各村分派种烟任务，强迫种大烟，反过来又向种烟人要罚金。罚金每亩地多达六元。另外，他也效法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方法，操纵鸦片烟的全部生产。春耕前把种植鸦片烟的数字分派给各村，村又分给甲，甲又分给各户。春耕之后烟苗锄过头遍时，烟政科便派人到各村逐户逐地进行清查和丈量。把烟苗等级、烟地亩数核定之后，登名造册并确定应纳烟干的重量。到鸦片收获季节，便有鸦片纳入组合（人称“大满号”）到各村收缴。无论丰歉只要把烟干数字一定就必须按数完成。完不成者就要遭到吊、打、灌凉水、坐老虎凳等非刑折磨。有的受刑不过变产买鸦片缴，无产可变者，只好去坐班房。

强迫中国人种鸦片，是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罪恶政策之一。日本人知道鸦片是毒品，开始服用时有镇痛安神作用，连用几天之后，便中毒成瘾，长期服用，会使人肌体消瘦，意志衰退，生活堕落，早亡、不育。既然种植鸦片，染上鸦片嗜好者必然日益增多，所以在日本占领时期，死于鸦片烟毒者，远远超过战场牺牲者。这是不用战争的战争。只要长期推行鸦片政策，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

另外，在他一系列鸦片政策中，都充满着污秽和黑暗。如在丈量烟地时，有钱人家可以花钱贿赂勘查人员以多报少；穷苦人家无钱行贿就寸土不让甚至以少报多。收缴烟干时，有钱人家早把鉴定人员买好（负责质量检查的人），卖烟干时可以以假当真，以次当好。等级上评优；无钱无势的穷人缴烟干时就被压等压价，真货说成假货，好烟说成坏烟。有钱人家和官署总是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七、交纳出荷粮。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行战争强迫农民缴纳粮谷。这种出荷粮分两种：一种是按土地数字、等级（上、中、下、碱）摊派，一种是按农民打粮和存粮情况特派。摊派的粮谷虽属掠夺，但多少还算有点依据，唯有特派的粮谷纯属强盗劫夺。特派权放给地方官吏，他想派谁多少就是多少。有财势者虽然田连阡陌、谷积万仓他也不派或少派，无钱无势的自耕农，本来自给不足，但却负担着沉重的粮谷任务。农民忍饥挨饿，宵衣肝食，终岁辛劳种得的一点粮食，都被逼送进“兴农合作社”（专门收缴出荷粮的机构），那里粮堆如山，而农民却囊橐空空，当时老百姓都说“这才叫死逼粮山。”

农民把自己种得的粮食交了公，一家老小生活无着，只好再掏五分利（借一斗还斗半）、一米三谷（借一斗米还三斗谷子）、大加一（借一斗米还二斗米）等高利，向有钱人家借粮。所以旧社会穷人越穷，富人越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八、警察横行。日本军国主义者豢养了大批警察为他充当爪牙。省级设有警务厅，旗县设有警务科，地方设有警察署和分驻所。警务科分四个股：警务股、保安股、司法股、特务股。警务科长、股长、特务股长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充当，保安股维持地方治安，司法股管理诉讼，警务和特务两股专搞侦缉和特务活动。

警察是日本人相信的奴才，在任官上、待遇上都是从优的。所以这些人多数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尤其搞警务和特务活动的警察，多数都丧失了民族立场，死心踏地为日本人效劳。他们随意打骂老百姓，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无所不为。尤其是到抗日战争的后半期，这些人更是狐假虎威，动不动就给人扣上“私通八路”、“共党嫌疑分子”的帽子。不花重金贿赂，就被关进监狱横加迫害。

无论地方警察还是铁路警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其中有些人仗势欺人，为虎作伥，对人民作威作福，对日本人摇尾乞怜，所以当时人们痛恶地称他们是警察狗子。

九、宪兵凶狠。日本侵略者镇压中国人民的另一个工具就是宪兵队。宪兵队有满洲宪兵队和日本宪兵队两种，虽然都是特务机构，但日本宪兵队的权力是最大的。它简直是太上皇。两种宪兵队都是日本侵略者的忠实走狗。日

本人给他们丰厚的物质待遇，授予他们特殊的权力。无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也无论士农工商兵，他们都有权干涉、传讯、拘捕、治罪。宪兵队又豢养着许多特务和特务腿子。他们人数上虽然不多，但他们的势力是大的，对人民的残害是深重的。他们把黑手伸向各个角落。敲诈勒索，调戏妇女、罗织罪名、残害良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宪兵队是人间地狱，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进了宪兵队，就很少有生还的希望。到抗日战争的后期，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搜捕八路军和游击队以及爱国的中国人。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

十、地籍整理。伪满时设有地籍整理局，是专门解决蒙旗地方土地权的归属问题的。蒙旗地方自清朝定制以来，向来是汉民耕种蒙地，向蒙旗或蒙民缴纳地租。地租有粮租和钱租两种，粮租谓之“白茬地”，也就是在汉人初开垦时没有向蒙人交地价。钱租叫“红茬地”就是汉人初开垦时已经向蒙人交了地价并有蒙旗出的卖地红契或蒙民个人出的卖地白契。地籍整理就是甄别白茬地和红茬地确定土地产权。白茬地产权归蒙人所有，汉人只有耕种权，需要向蒙人交租子。红茬地已出过一次地价，只剩少量钱租，由地整局调解叫汉人再向蒙人一次交出二十五年钱租就永远取得土地所有权，永远结束租佃关系。

热河省当时有七个旗的蒙古王公把土地权奉上了（1939年伪满康德六年）。因此，伪满中央发给这七个旗恩济金三百万元作为蒙民裕生事业费。由热河省蒙旗成立蒙民裕生会为财团法人。省里成立蒙民裕生理事会，伪满中央成立蒙民裕生总理事会。各旗的蒙民裕生会派代表协同地籍整理局解决蒙汉民土地所有权。蒙民裕生会负责向

汉民征二十五年补偿金。

地籍整理完全是根据航空测绘来确定土地的座落和面积。这本来是很科学的。但那些地籍整理人员，为了敲诈勒索，他们就徇私舞弊，对航空摄取的天然地界任意伸缩。对行贿者以短伸长，放宽地界，对不行贿者以长缩短，压缩地界，甚至有的把耕种权变成所有权，把所有权改为耕种权。故意给蒙汉人民制隔阂。

十一、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巩固殖民统治，积极培养忠实奴仆。在各级各类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在教材内容上大肆宣扬大和民族至高无上、宣扬武士道精神，鼓吹“大东亚共存共荣”的帝国主义理论。宣扬天照大神和日本万世一系之皇统。把日语课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主要课程。在数学方式上，不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完全是填鸭式和注入式。在教学方法上，全是打骂教育，要求学生绝对服从。在中等学校里还设有军事课，派遣军事教官加以专门训练。准备用学生充当战争炮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师生每天早晨都要举行朝会，都要向东方遥拜，祈祷“天照大神”，祝皇军“武运长久”。总之整个教育目的都是为他的殖民政策服务的。

十二、经济管制。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以后，便把整个经济纳入他的战争体制。对中国人民一面进行疯狂掠夺，一面进行经济管制。把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纳入经济违禁之列，不许中国人经营。违犯者便以经济犯为名进行惩办。开始时由官方给予少量“配给”，到后来连少量的配给也没有了。人们几个月吃不到咸盐，几年穿不上一身衣服。粮食上开始还给一点高粱米，后来连高粱米也没有了，只给一点豆饼和甜菜渣滓（糖渣）。最困难时期连火

柴也成了违禁品。沦陷区的经济完全崩溃了，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

以上种种，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情景，就是日本侵略者建造的“王道乐土”。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我国东北十四年，东北三千万同胞就是这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边缘上。我们更不能只见和平不见刀兵。人人都应该努力工作，建设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增强我们的国防力量，谁敢再来侵犯我们，就坚决、彻底消灭他！

解放前鸦片烟对我旗 人民的毒害

赵振德整理

鸦片烟对中国人民的毒害实在太深了。鸦片流入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掠夺中国人民财富、摧残中国人民健康的罪证。

鸦片原产于孟加拉和印度，公元1757年，英帝国占领孟加拉，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便独占鸦片的专卖权。公元1773年（清乾隆三十八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当时英国为了顾全东印度公司的“名誉”耍着两面手法：表面上禁止公司船只贩运鸦片，但给予私人商船执照中却列有一项条文，注明这些商船除运输东印度公司自己生产的鸦片以外，不得运输其他鸦片，违则罚款。从此向中国输入的鸦片量逐年增加。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到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公布的数字为每年输入约四千至五千箱，据当时东印度公司航务长的记录说：“1786年中至少已有二千箱鸦片运入中国，较六年前每年所输入者已超过五六百箱”。由此可见，实际输入量比公司发表的数字大得多。当时的清朝政府，也感到鸦片的压力越来越重，于1796年（嘉庆元年），1814年（嘉庆十九年），1815年（嘉庆二十五年）三次严令禁

止，但东印度公司把鸦片的种植和向中国的私卖，作为自己财政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放松对鸦片贸易的鼓励。

公元1816年，东印度公司又允许鸦片自由贸易，这给了英国私贩们的营业以新的强大的推动，向中国的输入更多了。到1834年（道光十四年）达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五箱。这一时期英国的工商业发展很快，不仅需要中国的大量茶叶供给本国及欧洲各国，更需要中国的大量生丝供给本国的丝织工业。中英贸易的支付方法就是英国在印度经营鸦片，然后再用鸦片转向中国，换取中国的生丝和白银。清政府感到鸦片的威胁日益严重，于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执行禁烟法令，要求搜查英国商船，並令其立下“不售鸦片”的字据。此东印度公司通令公司船和私人商船坚决拒绝。胡说什么为保持英国之尊严及公司之利益，凡悬挂英国国旗之船只，必须拒绝搜查。又说，若公司应允签写此种字据，将来对于欧洲与中国之贸易恐发生恶果。不仅如此，还通知所有英国私人商船，如果有立此字据者，航务委员会便取消其贸易特许权。英国政府除了要强盗和无赖的野蛮手段之外，还派遣一艘军舰到广州海面上示威。

1830年以来，英国工业空前发展。1832年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选举中获得胜利，不久，东印度公司便由垄断贸易的商务机构改组为政府的行政机构。因此，对华贸易就变成了英国私人企业所完全能够执行的事务。这种私人企业的对华自由贸易，当时发展得非常迅速，不管清政府如何抵抗，他们在1837年将价值二千五百万元的三万九千箱鸦片运入中国。1838年又运入四万零二百箱。中国国内发生了银元枯竭的现象，财政上出现了非常危险的局面。可是

英国政府大力强迫印度农民种鸦片，它用政府垫支的办法去鼓励更多的农民种大烟。还用严格的垄断办法操纵大烟的全部生产。在政府监督下，由国家官吏把大烟拍卖给商人，由商人再运往中国销售。每箱大烟英国政府所花的费用（包括垫支）约为二百五十印洋，而在加尔各答拍卖时每箱却高达一千二百一十印洋到一千六百印洋。印度的英国政府十分之一的收入都是靠出卖鸦片给中国而获得的暴利。资产阶级所谓“文明”、“自由”的实质，就是“强权即公理”、“掠夺即博爱”。

鸦片之流入中国，也是清朝政府的腐败使中国人民遭受耻辱的证据。清朝自嘉庆末道光初开始走了下坡路。在这之前支撑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政者认为中国是万事不求人，所以自吹是“天朝大国”，和外夷不相往来。闭着眼睛也不看外国的发展，世世代代因袭着“祖宗家法”。到十八世纪初叶，英法等国已先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发展阶段，金融资本需要不断扩大，产品需要有市场倾销，原料需要有人大量供应。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不能不在经济上进行垄断，政治上实行强权，军事上进行扩张。在世界范围内到处找市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掠夺别国领土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在西方美国主义势力形成之后，中国这块沉睡的土地就再也不会安宁了。关闭的大门被汹涌的资本主义势力冲垮了。鸦片象洪水一样滚滚涌入，而白银也泄洪般地源源不断地向外流出。清政府虽然多次查禁，但始终未能奏效的根本原因就是清政府从上到下的贪污腐败、贿赂成风。如1811年东印度公司航务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据观察，总督关于禁烟之语，不过官样文章而已，毫无积极禁止贸易之意，因政

府久以纵容私运为发财之机会”。据《圣武纪》记载：“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获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鸦片）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而鸦片烟遂至四、五万箱矣”。外商收买贪官，下级贿赂上级。反过来讲，皇帝勒索海关监督，监督勒索洋行、洋行勒索外商，外商榨取中国人民。更何况有些官商公开贩卖大烟，有的官吏和贩毒者合伙经营。这就是说，清英双方都玩弄两面手法，来推进鸦片烟的贸易，英国是明禁暗运，清政府是明拒暗受，受害最深还是中国人民。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烟毒的泛滥和危害，日甚一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百姓，吸食鸦片者不计其数。随着鸦片烟的输入，鸦片的种子和种植方法也传入中国。开始先在广东广西两省种植（所以人称“广土”），后来延及福建、江苏、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后又传入内地，遍及全国。在调查中据八十二岁的老人回忆说，热河地方在清末民初就已种植大烟。根据他的记忆，还是在光绪年间从平泉下来一个朱官（此人姓朱，人们称为朱官）到旺业甸地区查禁过一次大烟，此外，再没有过查禁活动，直到解放前。民国年间热河的历届都统只征烟捐，不禁止种植和吸扎鸦片。那时种植鸦片已成为人们发财的门路。有些外地人都到此地来租种大烟，等到秋后晒成烟干之后再带走去贩卖。有些本地人也把自产的烟干拿到外地去卖。还有些人专靠贩毒为业，怕路上遭到土匪抢劫竟雇用武装护送。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依然鼓励种植鸦片。它也采取垄断方法，各级行政设有烟政管理机构，配备专职人员

春季烟苗锄过头遍时，便派官吏到各地清查丈量烟地亩数，造册登记，核定缴纳烟干数量。一到大烟收获季节，各地便由鸦片纳入组合（人们称为“大满号”）按质论价统一收购（当然价格很低）。有完不成应交任务者，便动用宪兵、警察等机构催逼。当时的政策，虽然也不允许私藏私卖和私用，但也都是官样文章，既然允许民间种植，怎能禁得住私人买卖和吸扎呢。

鸦片之为害中国，不仅在于它换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使国内储备空乏，更在于它统治了中国人的精神。不分贵贱，不分阶层，不分老幼，不分民族，只要染上鸦片这种嗜好，便乖乖地拜倒在它的脚下，甘当它的牺牲品。即使卖妻子，鬻儿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鸦片是一种高效麻醉剂，所以在医疗上它有镇痛安神作用。无论什么疾病只要用上大烟立即减少疼痛，即使无病，用上点鸦片之后，也觉得身体轻舒异于往常，但等药效一过，疾病更甚于从前。连用次数一多，便形成烟瘾。瘾发之后，使人痛苦万端，难以忍受，只好继续用烟，就象绞索一样，只要钻进索套，就很难逃脱。久而久之，形成鸦片中毒，使人面黄肌瘦，全身无力，意志衰弱，各种功能迅速减退，健壮者变成弱鬼，精明者变得昏聩，勤备者变为懒惰，上进者变成堕落，随之就是破产、早亡、不育、伤风败俗，社会混乱等情形一一发生。下面仅以两个村庄为例来说明鸦片在解放前对我旗人民的毒害：

（一）旺业甸镇金家店村（当时是一个部落），这个自然村在当时来说，是受毒害最轻的一个村落（因为这个村每年都有一次戒烟酒的理善会活动。）全村总户数为九十九户共四百二十一口人，用大烟的有九十六人，占全村

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八。没人用大烟的户为三十四户，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三四。由于吸扎毒品破产、不育、早亡最后绝支的有二十二户，占全村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三。当时这个村子每年种鸦片约为三百亩左右，其中地主牛焕章一家就有一百亩左右，占全村烟地总数的三分之一。

受害最轻的村子尚且如此。再看下面这个典型：

(二) 东局子村西南沟里(原八队——从龙爪子沟门往里算的)，这是鸦片烟毒的重灾区之一。在调查中了解到，这里虽是偏僻的山沟，但全都是腐植质土壤，山地上也照样能种植鸦片。这里所有土地有三分之二都用来种大烟。为了逃脱官府丈量，多数都种晚大烟。在勘查烟地时，烟苗很小，都隐藏在蒿草之中，等过清查之后，再开始拔苗锄草。另外，多数种在山上，地块非常零散(一亩地可能有几十块)即使勘查也很难查清。为了少交烟干，又采取集体贿赂的方法，给勘查人员许点小项，他就以多报少，应付了事。这样，鸦片生产便成了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产，秋粮生产反不被人重视了。每到鸦片的收获季节，家家都肥吃肥喝。卖粮卖布的，卖酒卖肉的，卖瓜果、点心的，驴驮肩挑，络绎不绝；说书的、耍猴的，玩魔术的，唱皮影的，也经常往来。交换方式自然都是以鸦片代货币。等到大烟的收获季节一过，把换来的货物用完之后，这里的人们便蜷居在小马架屋里坐守困难，勉强生活，尤其到了冬季，身无遮体之衣，口无饱腹之食。虽然如此，但绝大多数都吸扎鸦片，尽管衣食无着也要想法医治烟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年辛劳，不足丰年敷用，再加上烟毒贻害，自然灾荒、敌人蹂躏、剥削压榨等等，所以这里的

人口逐年减少。调查结果表明，伪满初期，这里住有四十一户人家，共二百二十六口人到解放前，夕仅仅剩了六户，共有八口人（剩二人的二户，剩一人的四户）。绝支的就有三十四户，逃荒到外地的一户。如崔荣、曹振江、朱占元三家，原来每家都有十二、三口人，最后一人未剩成为绝支。赵山全家十三口，最后只剩一人。田江兄弟五人都没留下子嗣而成为绝户。在访问中发现，原来西南沟里的老地户，现在仅剩有于泉龙一家。其他人家都是解放后才迁移来的。无怪乎在访问时于泉龙老人感叹着说：“如果鸦片种到现在的话，就用不着计划生育了。”确实是这样，摧残人的身心健康，破坏生殖能力，促使人们早亡，荒废生产事业，败坏社会道德，有什么更比鸦片厉害的呢！在解放前遭受鸦片毒害的重灾区，又何止是一个西南沟。不用说全国、全省，就是我们旗内，情况类似的村庄也不下一百几十个，受害的人数更需要以万计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从1948年禁烟到现在已经三十七年了，据说仍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还在贩毒、吸扎、种植鸦片，这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伪满崇正国民高等学校的 学 生 生 活

玛 希

建校的时代背景

解放后由于重视教育事业，建立一所中学是轻而易举的；但在解放前日伪统治时代，不重视教育的情况下，在一个交通不便，山乡僻境里兴建一所中等学校，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这是为什么？为何在校名前冠以“崇正”二字？“国民高等”的含义是什么？我是这个学校的第二期学生，后来又留校工作了几个月，知道一些该校的情况，其他校友和老师，多数远离他乡，虽然赤峰市内各机关大有人在，有的因身体健康情况欠佳，不愿执笔，有的公务繁忙，无暇撰文。我也是应邀写了这篇稿子假如有的情况有出入时，希望老同学不吝指教同时，个人孤陋寡闻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望知情者给以补充。

伪满的崇正国民高等学校设在喀喇沁右旗王府，这里距赤峰一百四十华里，西、北、南三个方向全是崇山峻岭，属于七老图山脉，当时村落稀疏，学校寥寥无几，学校南北的平甸相距不过二华里，在这样一个山野之地设立学校，就是因为清代末期喀喇沁右旗最后一代王爷贡桑诺尔布曾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设立过崇正文学堂、守

正武学堂、毓正女学堂，而在三十七年之后的一九四〇年，借前一年蒙地地权奉上给伪满洲国皇帝之际，日本人搜刮了大量地租款，以省立名义新建了这所学校，崇正之校名也是继承了以前清代的学校名称。原崇正学堂遗址，今喀喇沁旗王爷府中心医院处，保留了崇正国民优级学校，是初、高两级小学。“国民”二字是日本对公民的习惯叫法，“高等”是与小学相对而言有高出一格的含义，即今日的中学，是典型的日汉两种语言的混合语，按当时习惯说法则称作日满协和语。

学校建立经过

蒙古地权奉上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份，学校的经费来源，是在日本人导演了土地奉上闹剧之后，由蒙民裕生会拨款，先施工盖了两栋校舍，又征用了苗圃的一部房舍，即现在的王爷府林场处，一九四〇年校舍竣工，一九四二年五月又在原地新建校舍七栋，由热河省承德市协进建筑公司施工，于同年十二月竣工，校舍占地总面积为二百三十亩。于一九四〇年开始招收了第一期学生，学生大部来源于喀喇沁右、中、左三旗的蒙古族青年学生之中，校长是原赤峰国高教日语的日本人名叫竹田孝雄，他是日本广岛人，荐任官。因为是初期创办，经费充足，发的衣物质地良好，如呢子制服、毛毯等，伙食标准也较高，超出当地中等农民生活水平，细粮较多。学制规定为四年，学习重点除基本程课外是农科，学习有实习的农田。

学生入学不经考试而录取，带有保送的性质，每一学期学生在五十名左右。到第二学期招生时，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崇正国民优级学校和公爷府的学生报名入学者是经喀喇

沁右旗旗长乌勒巴图亲自口试，但淘汰者没有，全部录取。

每况愈下的学生生活

学生一经入学，便在学校食宿。前一、二年，伙食没有定量。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后，确切点说，从一九四二年开始，学生的伙食标准便每况愈下了。大概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交战，经费被抽走。细粮数量明显减少，后来到日本失败前几乎绝迹，粗粮数量也被缩小而且有一部份用代食品顶替了。例如用冻土豆代替粮食。文革期间我蹲过监狱，就和囚犯的生活标准已经相差无几了。学生吃不饱，家中富有的学生居多数，自己在外边买食品还限制外出，无钱者只能终日饥肠碌碌，苟延残喘而已。记得有一年在学生中选拔运动员去凌源参加运动会，因学生平时食不果腹，在参加运动会时，吃饭不限量，便不知节制食量。一天跑长跑，给学生吃尖饼。这种干燥食品，因为水分少，到胃肠里便大大膨涨，一运动员长跑起来，造成小肠迸裂而死亡，这就是给学生造成的恶果。为推行奴化教育，授课时数减少了，劳动时间增多了，到了夏季几乎停止上课，只有在冬春季节才给上课。发给学生的生活用品也减少了，有的衣服是用豆秸所织，比麻袋片略胜一筹。

日本人管理学校，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稍不如意非打即骂，冬季在野地洗脸，冰碴水冰凉刺骨，寒风凛冽。有时冬初河岸结了冰，日籍体育教员还逼学生脱光衣服进入河水里进行冷水浴。夏季烈日炎炎，不是叫学生抬土建操场，便去农田里间苗，往返十余里，一天劳动下来筋疲力尽。农田干旱，又叫担水浇地，水井深，路途远，挑

完一天水，两肩红肿；春季则遣使学生到北山造林，动辄七、八天，春季气候干旱，风沙大，在野外连续奔波几天，口干舌燥，嘴唇破裂。四年下来，备尝了人间之苦。

学 校 概 况

学校名义上是中国人的学校，却由日本人担任校长，开始是竹田孝雄，财务也由日本人竹内馨把持，还有一名教日语和体育的日本教师，名叫服部俊雄。此人有胃病，有耳在课堂沉沉大睡，学生也去效法。中国教师，先有方溢和王松龄二人，都是吉林师道高等学校毕业，方溢教数学和英语、物理，王教历史和地理，竹田孝雄教动、植物和化学，蒙语课先是无人教，由历史课占用，讲蒙古史。后来分配来一名从王爷庙兴安学院毕业的学生叫额尔敦特古斯，此人来崇正之后担任学监，把兴安学院推行的上下级服从制度在崇正照搬过来，帮助日本人治校，实则助纣为虐，使和睦的同学关系成为森严的等级关系。竹内馨教簿记(即会计)。方溢调走，又来一名叫王树勃的教师，教物理化学，教数学(几何、代数)者由在日本留学的耀勒少卜担任。学生的劳动相当多，有园田、农田、以后又开辟了稻田，学生每日有两名下厨帮助，去两名放牧良种羊美利奴和良种猪巴克夏。一匹良种马由车夫饲养放牧。耕种作物都是实验性质，如鸦片、花生、蔬菜等，后来在庙沟又耕种了大壘农田，大约一顷多地，谷子居多数，产粮完全用来做口粮，此外的劳动则是撒土丘垫操场，全校学生劳动二、三年，这项工程才竣工，终日拾土劳动，乏味极了，即使是监工的中国籍教师也不胜厌烦。除正式课程和体育课外，还有军事课。配有军事教官，学生每人发木枪一

支，背兜一个，线腰带一条，来校的第一名教官叫杨学成，少校衔。他在九一八前是奉军军官，投降日本关东军，任命为营长，在辽东围剿抗日义勇军时，一营的武器全被义勇军缴械。一九四一年他便被流放到崇正国高担任军事教官。有三个老婆，有时外出得机会还贩卖鸦片，被日本人发觉后，承德军管区来一名日籍少校军官把他训斥得不敢抬头，后来又不知发配到何方。此人对学生倍加体贴，上军事课时先在日本教师附近敷衍一下，便领着学生找僻静地方去聊天，他直言不讳，供职日本人，只是为了贪图安逸享受，得到一个高官厚禄，如果挂冠而去，还要受警察的欺凌，他的处世哲学还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感。接任他担任军事教官的仍然是一名少校，蒙古人，名叫扎木彦扎布，据说吸食鸦片，但对学生并不严厉，唯日本人之命是听，日本倒台前还晋级为中校，好景不长，便席卷而去。

耀勒少卜一来学校，似乎对学校前途很关心，诸如扩大实习田，与讨伐队合作看管王府前山的校有林，没收农民在山上割的柴禾，结果柴禾全被讨伐队扣留。可能他看出看山有利可图，遂由学生自己看山，并且叫学生自己到山里割枝柴，见到农民割柴禾，便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的学生见到农民可欺，便要法西斯作风，动手打割柴的农民，从此就形成了学生与当地农民的对立。

一九四四年秋季，在学校里突然发生伤寒病，学生患病者达四、五十人，死亡两三名。日本人称这种病叫肠室扶斯，病愈者头发脱尽，症状是腹泻、发高烧，长期不愈，病情蔓延时，对患者实行隔离。入冬后病人逐渐减少。

几点可取之处

日本人推行的奴化教育是有其险恶用心的。但是毕竟或多或少地把日本国内的一些好的教育制度也引进了我国。如理科教学极为注意课堂实验，特别是化学课，这对学生理解各种化学元素的形成有极大的好处，理解的快而且印象也深。在这方面花费点钱为了培养人材是值得的。生物课日本教师也注意在课堂上进行动物解剖或者生物组织构造观察。此外还提倡春季野游，使学生有机会观察大自然给人类提供的自然美，这也是最好的直观学习。毕业前中学学生可在国内旅行，游览名胜古迹，车费减半，而且包给条件好的车厢，有一次从奉天（今沈阳）至白城子，拨给一节软车厢，车费仍按硬席的半价计算。大学毕业前可以出国到日本去旅游，这无疑将能开扩学生的视野，对学生认识社会是有帮助的。

在中学阶段，学生毕业后不可能都升入大学，所以在国高阶段设有商科、农科、畜产科，中学毕业后可以有广泛的就业门路。

在太平洋战争前，对外国语的学习上还没有什么偏见，除学习日本语外，还开设英语课，这对将来升大学者打下一个外语基础。

日本人建设一所中学即国民高等，不是盲目冒进，首先在教师来源上给以充足保证，不是中学毕业生教中学生。如崇正国高的教师，教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等主要课程的教师全是相当于大学本科毕业生，这无形中就保证了教学质量。其次是各种课程的教学设备齐全，既有实验仪器，也有实物的观察，有的还有各种模

型，使学生对课程内容加深理解，开扩思路非常有益处。再者，中学生实行住宿学习，有充足的复习时间。另一种长处是各种房舍齐备，如大礼堂、教室、宿舍、食堂、体操场地，体育用具等应有尽有，每日每时活动井井有条。教室的桌椅讲究，光线充足，室内宽敞、隔音好。

日本人非常重视对教师的培养、扶助，在中学阶段一旦了解到有志于将来担任教师工作的学生，生活上即给以必要的照顾，每人每月给补助相当于二百斤小米的钞票。毕业后任教的教师，凡以本国大学毕业者，政治待遇上称谓委任官，在日本留学毕业回国执教的教师，职务上称谓荐任官，年终发双薪，各种津贴的数额也相当可观。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那一天我们已经列队到祭敖包的地方参加运动会，但迟迟没有开幕，学生等候得烦躁不安，后来又下命令返校。事后才听说，苏军已经突破国境线，接踵而来的日籍校长家属变卖生活用品，要回国去。这一下我们意识到日本人完蛋了。在这之前几个月，日籍教师凡年令在五十以上的老年人也应征入伍了，意味着日本的兵员已竟枯竭了。后来学生也逐渐结帮成伙纷纷返回家园，一所学校便成了空壳。只剩了几名教职员工在学校以访亲会友，谈今论古，下棋习字来消磨时光。

解放后，这所学校的学生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分布在全国各个省份，尤其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者居多数。有的从政，有的从事文化工作，有的曾担负过自治区一级的厅局长工作。也有默默无闻地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有的已经离休，正在安度晚年。他们为革命事业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河原操子其人

赵振德整理

河原操子的名字在我们中国可能知道她的人不多，知其详情者更不多，但在日本，她却是名盛一时的女英雄。在日本近代史上特别是日俄战争史上更少不了她的一席之地。因为她在中国的活动地点主要是喀喇沁旗，我旗乃至我国的第一所女学堂是她帮助建立起来的，第一批留日女学生也是她推荐陪送的。无论就其帮助创办第一所女学堂还是她来中国负有的特殊使命，都有一书的必要，下面仅依目前见到的一些资料，加以整理作一简单介绍。

一

河原操子来中国的前夕，正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剑拔弩张，怒目相持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情知两国间的战争势在必行，因此，积极做着战争的准备工作。一面在战略上进行战时的体制变革，一面加紧人力、物力的总动员，以备战争的需要。为了战败强大的沙俄帝国，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为掩护，向沙俄边境地区不断地派遣军事间谍、刺探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气象等多方面的机密材料。如明治时代曾任日本军参谋总长的福岛安正大将在他还是个少佐时就和他的一个同伙，以单骑旅行的名义，从我国的东北潜入俄国境内，

横断西伯利亚进行军事间谍活动。日本人副岛三郎，化装成中国人，只身潜入我国西北的兰州、伊犁等地，后来又潜入阿富汗尼斯坦（现在的阿富汗）和中亚细亚进行间谍活动。这两个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日本近代史上搞国际间谍的鼻祖，把他们的间谍活动称为“壮举”。

二

河原操子生于日本信州松本藩的一个士族家庭（日本国民分华族、士族、平民三个阶级，士族即古代的士人，明治维新后改称士族）。她的父亲叫河原忠，在明治时代是福岛安正西伯利亚单骑旅行的唯一伙伴，从此闻名全日本。他和福岛安正从童年时代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两个人在旅行之后，经常一起研究中国的哲学和中日关系问题。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和福岛又成了全国知名的了解中国、熟悉中国的“支那通”，从此两个人成了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明治维新日本强盛起来之后，就开始制定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福岛安正和河原忠，都是这一政策的衷心拥护者和执行者。后来，福岛安正当上了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部长晋升为陆军大将时，就不断地，一批又一批地向中国派遣特务间谍。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矿产资源等各方面的机密，绘制中国的地理山川等地形图。他们还对付蒙王公进行威胁、利诱、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做着全面的准备工作。

河原操子毕业于长野县师范学校女子部，后又考入东京女子高等学校。学习二年因患肋膜炎退学，后又进入长野县立高等女学校当教师，公元1900年（日本明治三十三

年九月到了横滨任清朝政府在日本设立的大同学校（专为中国留日学生补习日语的学校）当教师。

河原忠为了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为了表示对福岛的友谊，把自己的独生女儿河原操子交给福岛任其派遣。这时河原操子还不满二十岁，就在日俄战云密布的前夕一九〇三年作为日本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年轻的一个女使者被派到中国。河原操子自幼在父亲的大民族精神的薰陶、教育下，怀着为祖国，为家族建功立业、光耀门楣的思想，在出国之前，就注意学习中文和其他科学知识，学习作为一个国际间谍应有的韬光养晦精神、坚韧不拔精神和遁形藏真的各种方式与手段。河原操子初到中国时，经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春大佐的派遣去上海创立务本女学堂，她担任教员。到一九〇三年贡桑诺尔布背着清朝政府和御前大臣喀尔喀亲王那彦图的长子祺承武、肃亲王善耆的长子宪章等人由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的介绍，私搭日本邮船去神户参观内国劝业博览会，并利用这次机会日本的朝野名流频繁接触，（正是在这次和福岛安正建立了联系）其中也有日本女教师东京实践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贡王向她谈了要振兴本旗女子教育，请她帮助推荐女教师，下田歌子一口答应。后经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便选定了河原操子。河原操子从上海秘密来到北京，从青木宣春大佐那里接受了新的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特殊使命，她又通过北京日本使馆的翻译川岛浪速（日本黑龙会分子，辛亥革命后，勾结肃亲王善耆组织宗社党，曾充当善耆的顾问）与肃亲王善耆拉关系，请善耆也为她来喀喇沁王府帮忙（因为日本方面早已掌握善耆的妹妹下嫁贡桑诺尔布这种亲戚关系）。当即得到善耆的同意，并答应护送

她。为了熟悉王府的生活习惯和礼仪制度，河原操子来喀喇沁王府之前，又到肃亲王府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学习了应酬王公的礼节和官话，并练习穿满洲妇女的服装。当时使她感到最大的困难是穿满洲族高底女鞋。因为日本妇女穿惯牛蹄袜和光脚穿的“ゲダ”（木板鞋），所以脚板又宽又大，特别是大姆指和二姆指之间空隙很大，几乎成“八”字形，而中国妇女的脚又细又长，这种满族高底女鞋，高跟放在鞋的中央，所以她穿起来难受极了，几乎无法走路，后来只好穿特制的满洲女鞋。

日本军方为什么这样重视来喀喇沁王府的人选呢？原因有三：

第一、前文讲过当时正是日俄战争的准备阶段，喀喇沁旗南距北京三百五十八公里，这里不仅是中国首都的北门，又东连东北各地，北接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是日本和俄国两个帝国主义的触角都能伸到的地方。如果在这里建立一个间谍联络站，既不会引起人注意，又便于与各地联络。

第二、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就想鲸吞中国，他们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扶植中国的亲日势力。贡王访日时，他们就极力讨好贡王，想把他拉入自己的一边，充当日本在华的代理人。为了作好争取贡王的工作，就不能不在人选上格外斟酌。

第三、日本侵略者知道，日俄两国虽然都是中国的邻邦，但俄国人多地广，势力雄厚，对中国的影响比日本大。同时俄国也在中国培植亲俄势力。如贡王的父亲旺都特那木济勒在位时，每次进京朝见清皇都接受俄国使馆的宴请和馈赠，要想争取贡王背俄向日或至少是严守中立，也不

能不在人选上苦心推敲。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原因，河原操子成为应选的一个重要人物。

河原操子暗带父亲赠给的一把短刀和公使送给的一支手枪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到塞外这山峦起伏，草长鹰飞的喀喇沁王府，住在王府福晋的侧室之内，以贡王聘请来的教育顾问为掩护，明则教书做老师，暗则进行军事间谍活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通过它的驻华使馆武官室以喀喇沁王府为据点，把一批批间谍人员，通过这里送往东北和内蒙各地。据现在查到的资料看，仅在日俄战争期间，先后派进来的间谍人员就有：伊藤柳太郎大尉、吉田四郎中尉、冲贞介、横川省三、胁光三、中岛比多吉、边见勇彦、大岛与吉、松冈胜彦、镰田弥助、吉田忠三郎、花田少佐等等。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帝俄手里夺走了东清铁路的南端和关东洲租界地，于是更加猖狂，准备进一步侵略全东北，公开以“满铁”名义，建立了特务大本营。

三

一九〇三年冬，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在王府西大西沟门利用他三叔父官成老爷的宅第创办了一所以培养下级军官为宗旨的守正武学堂。又由福岛安正大将的介绍，把伊藤柳太郎陆军大尉聘为该校的总教官，另外，还有吉田四郎中尉和其他二、三名日本人做伊藤的助手。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正式爆发了。伊藤等人另有派遣，相继离开喀喇沁王府。从此，这个地区的秘密军事间谍任务就都落到河原操子的身上。那时候站在俄国方面的北部蒙古人、俄国的军事谍报人员，也伪装成

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充当牧师、神甫、道胜银行职员、皮毛商等等出入喀喇沁及其邻近各旗，利用各种手段，搞间谍活动。这时的河原操子深入浅出但不失掉任何机会了解俄国人的动态和各地蒙古人对日俄战争的反应。她经常写成情报，极其秘密地请求贡王派“健脚”（专送密信的人）送往北京日本公使馆，以利于由日本使馆武官室指挥的军事间谍的活动。邢复礼先生一九三六年留学日本二次见到他当年的老师河原操子时，河原把他著成的《蒙古土产》一书赠给邢先生，内中记载着她在喀喇沁王府从事军事间谍的活动情况和写给日本驻华使馆的情报现节录如下：

“喀喇沁右旗的一般旗民，不知道日俄战争为何事，对于大炮、地雷、水雷等近代战争武器，更是闻所未闻，即使勉强加以说明，他们也很难理解。对于这一次战争的态度，与其说冷淡，莫如说漠不关心。他们把战争看成‘春风吹来，柳絮乱飞’那样简单。至于王府的官吏们，则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很了解战争的意义，清楚俄国的现状，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强之国，蕞尔日本，非其所敌，可能俄国在战争中操必胜之券。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对俄国表示好感，对日本则怀有敌意。这一事实说明，俄国人对这些化外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取得相当成功，而日本人则瞠乎其后矣。

据说，先王（注：指贡王之父旺都特那木济勒）在晋京参观的时候，俄国驻京公使，必飨以盛宴，殷勤款待，在回旗时，还要馈赠程仪四千两，以壮行色。此项飨宴和馈赠虽公使更迭，亦明例如此，从不间断。因此旗官的大部分有亲俄排日的倾向。喀喇沁王和福晋，固极贤达，然

俄国多年来的怀柔与笼络，已经给他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在此日俄衅端已开的紧要关头，舍彼就此，立即转变为日本的同情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我以日本与朝鲜的关系为例，反复说明以后，喀喇沁王和福晋不顾官僚的反对和阻挠，已首肯背俄支日，我们的初步工作已获得成功。我们日本朝野，对于喀喇沁王的善意殷勤，应该表示十二分感谢。

在表面战场上，有很多爱国勇士壮烈牺牲了！在背面的战场上，也有不少的志士纵横活跃。现在这些人所组成的特别任务班第一组，已于二月十二日到达喀喇沁王府；第二组已由热河出发，正向东方挺进；第三组于三月十二日第四组在二十日先后均到达喀喇沁王府，并已作出最后部署，整装待发。此次深入虎穴，今后所履的艰险，绝非笔墨所能表达。”

河原操子在情报中所谈的挺进队，就是特别任务班，是日俄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军部指令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室秘密组织起来的。它的任务就是以爆炸东清铁路大桥，切断俄国运输线为目的。队员总数为四十名，分成四个组。其中的三个组都是经过喀喇沁王府再向东北各目的地进发的。河原操子除了由热河出发向东北挺进的第二组外，和其他三个组都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她首先把贡王争取到日本方面来，这就大大地便利了日本间谍的活动。在整个日俄战争过程中，贡王一直是日本的支持者，这是河原操子最大的成功。

特别任务班第一组从北京出发以后，途中又分成东西两个小组，东组由横川省三、冲贞介、胁光三等六人，这个组的任务是炸掉东清铁路的嫩江大铁桥。结果横川省三、

冲贞介二人在哈尔滨附近，被俄国护路队抓住枪杀了。为此伪满洲时期日本在喀喇沁王府北山和哈尔滨两地分别建立“志士纪念碑”所纪念的就是这两个人。

第一组的西组则由在守正武学堂任总教官的伊藤柳太郎和吉田四郎负责，另外还有组员四人。他们从北京出发时，有的即改换成蒙古喇嘛的服装。一九〇四年三月二十日夜间坐骡驮轿出发。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到达喀喇沁王府。二十九日两个组十二个人晋谒贡王，贡王在毓正女子学堂汪良辅教习的宿舍里设宴款待他们。饭后，贡王单独和伊藤、吉田、横川、冲等四人密谈很久。在这里边休息，边等候日本公使馆的密使。几天之后，贡王又答应给他们代买乘用的马车，并派遣亲信辛占住等二人作向导把他们送往巴林王府（巴林王是贡王的妹夫），从那里再转往东北。河原操子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三月二十八日，喀喇沁王府来了很多喇嘛装束的‘不速之观’，其中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拿出一包东西并附信一封，托王府内侍，送到河原教习的住所。信的内容是这样：

‘河原姊：我们特别任务班先遣队一行，现已抵达喀喇沁王府，把晤在即，何胜欢忭。兹送去什物一包，是度预光准备好送给蒙古孩子们的礼物，请代分致贵校的学生。我们都变装为蒙古喇嘛，如无其他意外时，明日即可以畅叙一切。盼光三上。’

三月三十日下午，河原操子在自己的卧室里接待了伊藤、吉田、横川、冲、盼光三等人的来访，并进行了一次绝密的会谈，他们对战争的形势发展作了详尽的估计和分析，决定了特别任务班的行动方针。河原操子在《蒙古土

产》一书中记叙当时的情景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虽是一个弱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特别任务班的前进道路上，谋求了不少的方便，这也算是报国的一端。在沙漠积雪、四顾茫茫的征途上，非有一名熟悉道路的向导不可。跋涉千里的旅程，也非有马匹代步不可。马乎，人乎，若在平时，并非难事，在今日求之，均不简单。因为喀喇沁王严守中立，王府官吏又多亲俄，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在这种处境里，虽细微小节也要慎重从事，终由于喀喇沁王对我的信任，满足了我们的所有的要求，这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特别任务班出发之后，河原操子的间谍工作更进入了最繁忙、最紧张的阶段。各地寄来的军事情报，都要由她接转。她把一封封情报，区分类别，有的发往热河日本特务机构，有的则需要直接送给日本驻华使馆。她用中国人的名字，不断和各地间谍通信。事后河原操子自豪地说：我都随机应变，办得很巧妙，几乎以生命作赌注，完成了这些任务。

由于她的活动频繁，也曾引起俄国人的注意，但因表面上她有喀喇沁王教育顾问的合法身分，又有贡王和福晋的暗中庇护，她的活动一直是顺利的。直到一九〇六年底，她把任务完成之后曾一度回国，后因贡王的福晋致函下田歌子要求她转告河原操子，延长对河原的聘用时间。河原出于情面和礼貌关系才又回到喀喇沁王府任教了两年，到一九〇七年底她偕同三名蒙古女学生（于宝贞、金淑贞、何惠贞）回到日本休养。回国后和一个华族人结婚，后来称“一之宫夫人”。日本政府和军事总部为了表彰她出色完成任务，授予她勋六位的荣誉。

（河原操子回国之后，又有日本帝国大学讲师、考古学博士鸟居龙藏夫妇偕他们的女儿“绿”应贡王聘任到喀喇沁王府，担任崇正和毓正两校的总教习。）

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王府，先后任教四年，表面上是一位温文尔雅、颇有文化教养的女教师。学生们亲切地称呼她“河原老师”，附近居民和王府的内侍们亦称她为，“河原先生”、“河原女士”，但又有谁能识破她的真面目呢？，下田歌子为她的《蒙古土产》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到：

“关于战时的一些事情，因大半属于军事秘密，不得不进行削减，遂使本文徒具皮毛。而无骨肉之感。”河原操子自序也说：

“旧版《蒙古土产》一书的写出，由于我从事清国女子教育，被喀喇沁王聘为教育顾问，表面上充当女学堂教师，暗中则根据军部之内命，在喀喇沁王和福晋的掩护下，在日俄斗争中得能完成秘密使命的一段事实。”由此可见，《蒙古土产》一书虽不能概括其在华的全貌，但也能窥见她在华活动的一斑。

（本材料是根据北京图书馆藏日文《满蒙》杂志和邢复礼的回忆录整理）

王爷府一带蒙古民族宗教信仰

闻桂芳

蒙古民族最早信仰中国原始教“萨满教”。“萨满”为通古斯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从一五七八年改为信仰喇嘛教。因当时威震蒙古和青海广大地区的阿拉坦汗派遣使臣赴西藏邀请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来蒙古传教。万历六年五月十五日在青海湖畔“察卜齐雅勒庙”举行的法会上，阿拉坦汗正式宣布，禁止信仰萨满教，取缔萨满的巫师的活动。从而陆续建筑寺庙，发展喇嘛教徒，从此喇嘛教便在蒙古地区传播开来，蒙古族便开始信仰格鲁派喇嘛教。流行在王爷府一带蒙古族的宗教活动，有以下几种：

1. 奉佛诵经：在家的佛龛中供奉“释迦牟尼”和“宗喀巴”为主尊佛；把关羽列为伽蓝神之一供奉，作为保卫神，以壮威仪（伽蓝神佛教寺院的守护神）；把土地老列为社稷神信仰，主要供奉这三尊神佛。有的家庭也供奉“度母”（亦称“救度母”“多罗母”等）。藏传佛教女神名，传说为观音化身的救苦救难本尊，以颜色区分，现为二十一相，以白度母，缘度母最为常见。对这些神佛虔诚供奉，常年香烟不断，初一、十五燃海灯。并请喇嘛到家中做法会。此外，凡是亡人、周年都要念“往生经”；给

活人念“长寿经”“太平经”；闹病念“驱魔祛病”经。总之念一次经化费很多的钱财。

2. 念嘛呢：念嘛呢是蒙古民族主要信仰活动之一。历年正月初六日开始，集中十五—三十人左右，由世俗嘛呢老师念蒙文的“阿弥陀佛”经文。年者的善男信女手持一百零八粒佛珠，坐在老师周围，高声念“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汉语：阿弥陀佛、南无量佛）。佛教认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主宰是“阿弥陀佛”密宗称“甘露王”这是净土宗的主要信仰对象。称他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也叫弥勒净土”。描绘此处非常景象美妙，並说世人持戒修行和称念弥勒名号，死后就可往生弥勒净土。

3. 祭祀火：蒙古民族特别崇敬火，遇事首先祭火。认为火的威力是无穷的，火又是美丽的。它给人带来无限光明，能把黑暗驱散。人们在生活中，一时也离不开它。过去祭祀时由萨满念祷词，后来喇嘛也利用萨满的祷词祭火，遂加进了颂佛的词句，这些祷词以蒙古文记录成书《祭火经》蒙古民族结婚时祭火，腊月二十三日也祭祀火。

4. 祭敖包：祭祀敖包是蒙古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活动。认为敖包是神灵所居和享祭之地。敖包神被视作氏族（地区）保护神，是第一位的神。祭祀敖包每年夏历七月举行。多数是整羊，酒、奶酪或备三牲、五供等。原由萨满教祭祀，喇嘛教传入后，一般改由喇嘛念经祭祀。（请六、七个喇嘛念经祭祀，有的地方把羊头扔在敖包上。）

5. 祭唐神：（唐神树）凡是蒙古民族聚居地区，都有一至两棵老榆树认定为唐神树，树下立有一石佛，认为是唐神，（来意不清）大多数在五月十三日祭祀。所有供

品的费用，由群众共同负担。在唐神树下按锅灶，宰杀一只羊，上五品供。凡参加祭祀的都要跪下叩头，由自然村头面人物燃香、发表、酌酒，並说些祈祷词句。祭毕。由主持人开始传达王爷的旨意，大家认真听取。讲话大意有三条：（1）从现在开始把牲畜都要管理好，严禁散牲畜，进地祸害庄稼。对进地牲畜打死无论；（2）从现在开始不准在地里行走，以免踩坏禾苗，否则要受处罚；（3）不准许打私架，要以理服人等等。实际是建立了护秋公约。会毕。大家在唐神树下，划拳行令美餐一顿。

（6）海灯会：主要祭祀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认为十月二十五日是宗喀巴的生日，又是他圆寂的日子。模仿寺庙在家庭中也举行海灯会，多数是用荞面做一百零八个海灯，天黑后家庭成员都要点燃，以此祈求保佑平安。

宗教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相信在现实社会之外，还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主宰着自然社会，因而对之敬畏和崇拜。宗教本身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科学技术发展，揭示自然界的种种神秘现象后，人们能动的放弃宗教信仰。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和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多数人从宗教教条和偶像崇拜中解放出来了。蒙古民族的宗教信仰走向消亡的阶段。只有个别的老年人保持着信仰，但不举行什么仪式了，宗教活动大大减少了，甚至已停止了活动。现只保留请喇嘛念经的活动，几个老喇嘛死亡后，王府一带蒙古民族宗教信仰亦将逐渐消亡。

辽耶律琮墓及其碑铭

郑瑞峰、赵挥德整理

耶律琮墓在喀喇沁旗官营子乡（原属西桥公社）官营子村铁匠营子屯西南约一公里鸽子洞沟西阳坡的一块台地上。左右有小山环抱，背靠陡峭的山峰。墓地选在倾斜度略小的椅形山坡的正中央。想当初这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小山沟，隐藏在万山丛壑之中，两侧峰岭峻峭，漫山青松挺拔，奇花异草，争红斗艳，蜂飞蝶舞，鸟语花香，清风唤起万顷松涛，溪水漂来十里芳香，是个幽静深邃的好地方。

墓前，整齐地摆列着石碑、石羊、石虎、石翁仲等花岗岩石刻，至今仍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据考古学家说，这是至今保留较完整的一组辽墓石刻。墓的最前边正中树立一通石碑，龟趺、碑身、螭首都较完整。碑首前额正中阴刻楷书《观音经碑》四字，正、背两面都是汉字译写的梵文。正面有些尚可辨认，背面因受多年西北风的剥蚀，字迹已全部剥落无法辨识了。《观音经碑》后面置有石羊两对，石羊后面置石虎一对，再后面置武吏石像一对，再后置文官石像一对，文官石像后面，是一长阔各约二十米的平台，平台后面就是墓址。墓已在民国初年被盗，现仅存墓穴可见。

墓地右侧，有一个高出墓地约三十米的小山顶，距离

墓地亦有三十米左右有一通石碑，就是耶律琮的墓志铭石碑。现在碑已无存，龟趺尚屹立在小山顶上。本文所附的碑文是旗文物管理所在五十年代时抄录存留下来的，尽管有些字迹已被浸漉剥落，但基本上还能看出全文的意义所在，碑铭不仅记叙了耶律琮的生平事略，还对《辽史》等有关文献起了不小的校正和补充作用。解答了历史上某些存疑问题，是研究《辽史》很有价值的宝贵文物。

耶律琮是辽景宗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虽然宦途生涯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了位极人臣、声名显赫的人物。和碑铭对照，才知道《辽史》卷八十六列传十六对他的记载未免太简略、太不够了。耶律琮又名合住（有的历史文献上称曷木），汉名琮、字伯玉，出身于皇族。他的祖父匀睹袞（《辽史》称云独昆，又名迭刺），是辽太祖阿保机的同母胞弟。在创建辽国的过程中，曾帮助他的哥哥出谋划策，制定典章、南征北战、攻城掠地，立过不少功勋，后来升为东丹国左宰相。《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第六记载：匀睹袞“性敏给，太祖曰：‘迭刺之智，卒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言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刺聪敏可使。’遣逐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以上是匀睹袞的功劳，但他也有过罪过，“与兄刺葛谋反，刺葛遁，迭刺与安端降，太祖杖而释之。神册三年欲南奔，事觉，亲戚请免于上，又赦之。”从上边的记载中，看出耶律琮的祖父在对辽国的建立上既立有殊功，也犯有大罪，因为他是辽太祖的胞弟才两次获得赦免。耶律琮的父亲耶律允“与辽嗣圣皇帝为从昆弟”，一生没有做过官，并且死得较早，他死时耶律琮还是个孩子。

耶律琮生于公元九百二十七年，辽太祖天显四年，死于公元九百七十九年，辽景宗保宁十一年，在他少年时代，由于父母早丧，因而家道中落，但他少有大志，不苟言笑，不近时俗，时时想着报兴家业，光宗耀祖。为了爬上官阶，他发愤读书达到夜不遑昧的地步。在他十五岁时，辽太宗耶律德光南犯中原，他被擢为先军监师。本来可以从此进身官场了，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辽太宗以后的穆宗和世宗二帝时，耶律琮都没有被录用，整天过着琴棋歌酒的游乐生活。到了辽景宗耶律贤嗣位之后，他很受赏识，从此，青云直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保宁二年便授予他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右羽林军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一年以后，又升为右龙虎军大将军，成为保卫皇宫的擢列之帅。保宁五年（公元973年）又委持使郡符，授推忠奉国功臣、昭武军节度，利巴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傅、兼涿州刺史、西南招安巡检使、漆水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不久，又加封为左卫上将军。到保宁八年以后他致仕时，他的官衔是推忠奉国功臣、镇国军节度、华商等州观察的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使持节华州诸军事，行毕州刺史、上柱国、漆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处三公之首，为帝王之师”了。

前后仅八年时间，耶律琮平步青云竟达到如此显赫的地位并不完全是机遇。当然，他出身皇族，接近上层的条件比平民优越的多，但仅此一端是不能飞黄腾达到他这个地步的。他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是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就是他早有成家之志，为了做官在文才武略上下过很大功夫，获得很深造诣，给后来的发迹创造了条件。他虽然是契丹贵族上层，但在政

治态度上，比较开明，他一贯主张和平交往，这里通过两点事实说明：

第一、他努力吸收中原汉族的文化，汉族的生产技术和生活方式。这对促进契丹族社会发展上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任期间，多是西南边务，经常和中原汉族接触，汉族的悠久灿烂的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不能不引起这位胸怀经略的契丹重臣的重视，把这些文化和科学技术引进国内加以利用和推广，对提高生产和巩固辽政权，对推动契丹社会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从碑铭和他的葬仪上都看得出他是吸收汉族文化的倡导者。

第二、他主张和边政策，特别在他就任涿州史刺时，曾多次提出南北和议的主张，碑铭上说他：“仁政俱行，宽猛兼济，戢彼干戈，用兴民利”。《契丹国志》记载：“辽边臣贻宋雄州守孙全兴书请和，全兴以闻于宋太祖，许之”。《太平治迹统类》收录了耶律琮给孙全兴书的全文。在这部书中又记载有：“合住智而有文，畅晓戎政，镇范阳时，尝领数骑径诣雄州北门，辞气慷慨，左右壮之，自是边境数年无事，识者以谓：‘合住一言，贤于数十万兵。’”

上述事实足以说明耶律琮的政治思想是开明的他一贯主张和平交往，提倡安边政策。而这些又正好符合各族劳动人民的愿望。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适应了辽景宗巩固政权的需要，因而受到耶律贤的重用，一再擢升他的官爵。

耶律琮在他的后期，可能有些失意，虽然官位很高，但在任时间很短壮年刚过便致仕归田了。使他有些心灰意冷，于是笃信起佛教来。想求“无为之理，大崇有相之

因”，终日参禅不辍，遐游岭外。衣食也有些节制，到保宁十一年他五十一岁时便死去了。埋葬他的这个地方，是他当时的庄园马孟山庄。

以上是对这位墓主人耶律琮的简单介绍。下面将《辽耶律琮神道碑铭文》和《与知雄州孙全兴书》附后，供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研究、参考。

辽耶律琮神道碑文铭文

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动臣镇国军节度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赠兼政事令使持节华州诸军事行华州刺史上柱国漆水郡开国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耶律公□□〔铭〕并序。

燕台左街资恩寺传大教阿闍梨传教大师赐紫敬贤书

华州衙内马步军都虞侯郭青撰。故太师令会授赐人户一百八十三户。

详夫人生于天地之间，禀气授生谓之命也。故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取祸，是故贤人君子知天命之不义，故自砺其身，思没世而可传，孝终厥德，安人济众，生有殊功，勒鼎铭钟，死而冥目，乃君子之福。为古往今来先达后进，金门玉阙，授紫施朱，禄食万钱，位极一品，善恶不恒，患难终始长恨恨耶。不能致于斯道也。独有我推忠奉国佐运功臣，镇国军节度，华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赠兼政事令、使持节华州诸军事、

行华州刺史、上柱国、漆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
食实封三百户耶律公性叶乾坤，气分岳渎，行为恭
肃，渐至神明，爱始及终，躬行不怠，依忠贞而卫
社稷，上赞

圣君，推仁化以徠运人，下安黎庶，辉焕觞崇，
功勒鼎□，□□驰颂声，词无可愧生死如一，行不见
老，貽厥孙谋以燕翼子。公讳琮，字伯玉，姓耶律
氏，世为漆水郡人也。与国同宗，且□□□□
〔耶〕，〔相〕□□□，□□不群，体□□□，言
词稳约，待人敦厚，恒厌轻佻，进退有常，□推师
表烈祖讳匀赍袞，乃大圣皇帝之同母弟也，谋智深
博，达于理〔行〕，咸推奇德，何所〔踵〕焉，肇
启国章，殆兴文轨，高□□□，赏罚□□，丕图
〔所〕猥之业，守之以道德仁义，播之以礼乐诗书，
聚畜蒸民，〔圣〕□□事，夙夜匪懈，戮力勤王。
复乃秣马砺兵，躬擐甲冑，蒙犯霜露，跋履山川，
而恭陪大圣皇帝，待有道而征无道，改霸图而□图，
富有天下，大崇宗嗣，乃公烈祖之勋也。厥后大圣
皇帝封建兄弟，赏异众臣，九锡恩深，百辟奉荣，
特殊冠冕，宠以元良，拜为东丹国左宰相，分城夺
邑，非郑比叔之品流，米履白珪，真鲁周「之伦也。
烈考讳允，与嗣圣皇帝为从昆弟，□□□彩，人望
迁延，可谓汉水金钟，不是寻常之器，秦川玉玺诚
为命世之符，□以富而好礼，贵而不骄，文武弛张，
两途俱美，分茅烈士，东郊未□□于伯禽，木落

花雕，西日俄沉于回也。公承祖考之□，故恭甫行之，复恐陨坠。公幼孤独，立亦受艰辛，教趋庭而垂短发，无父何恃，思啗指而旋回轅，有母谁从，多难排忧，唯天是托，家臣仆□各无同」〔念〕□□，奴婢货财尽属他人之手。公于是年虽童幼，□□戏〔及〕之间，长有成家之意，愚蒙侪辈罔得而知，动作有规，闇疑神助，未览典籍，与道无违。公因静日泣而自励，知祖考之德，不可怠而辱□，祖考之家世，不可久而隳之，三事不终，殆为不孝。□□故发愤忘食，夜不遑寐，乃师古以立身，讨六经而修德，敦书阅礼，晋郗殿轨范可亲，毁衽易纓，鲁昭公童心是悲，卑词下己，见贤思齐，绳晓」□□，鉴而有立，又錙铢戏狎流俗莫亲，俨然有不可弃之志。公以心藏巨岳，量纳四溟，弱而持霓，众返归辅，招携逆散，家道赫然。公之尚幼，能行斯道以全先人之基业也如此，想□贾王孙之徒，周子郑靖之□，□□喻众暂时多言偶中，尚存传记，此公成家之□□也。咸谓明月才生，便有六合之色，大鹏未化，俄藏万里之心者也。公方龄十有五祀，适遇嗣圣皇帝按兵观衅问罪中原，□□有鉴无私，恩及有德，擢公为先军监师，莫不雄□武□殿情深，建旄麾旌，奔车摩垒，料敌强弱，进退合宜，先人有夺人之心，无阵不破，出国有取国之计，遇敌皆擒。公之少勇也，又能如□□□也。皇帝饮马汴河，屯兵梁苑，嗣晋伏罪，犬立□□时，

乃发仓廩，开府库，搜宝器，取珍玩，子女玉帛、
齿革羽毛难得之货雾聚云屯，稀代之宝山高岳积人
竞食取以实私家，□□□时，略无所取，公之少俭
又若此乎。吴祐说蕙苾之嫌，□□匡谏贾谊受河南
之举，岂解从军。逮至天授、天顺二帝之朝，优游
自得，不拘官爵，恒乐以琴棋歌酒，玩之以八索九
丘，雪落西园，□□□□之赋，花开南馆，闲裁
以宋玉之诗，处宗子中贵矣！□□之弟，富又富
焉，富贵在身，曾无荒怠，泊然澹薄，乃□代之乐
天也。自天赞皇帝嗣位二年秋七月，以公鳌柱材
高，龙宫种贵，起家□□□□崇禄大夫，检校太
保，右羽林军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及
其年，复迁右龙虎军大将军，以为擢列之帅，羽卫
乎皇宫。保宁癸酉夏六月，皇帝以公任内既送往事
生，偶居无猜，处外可继□□□□利国家，复下纶
綍，重加宠赐，委持使□□郡符，授推忠奉国功
臣、昭武军节度、利巴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
检校太傅、兼涿州刺史、西南招安巡检使、契丹奚
渤海汉儿兵马都□□漆水郡开国伯食邑七百户，旋
加左卫上将军，俸赏□□。公之莅涿郡也，仁政俱
行，宽猛兼济，戢彼干戈，用兴民利。况涿郡也，
地迫敌封，境连疆场，盗贼公行，天疠时降，内奸
外宄出入难虞，雀角□□，□□猜衅，由是民心不
一，诈伪万端，导行遁逃，聚为□□，豺狼满野，
地蛇盈郊，唾毒穿乡，隳残井邑，边人畏惧，斥侯

皈，王僕〔郑〕〔重〕□其以善□樨□□□□亲领
门生故吏遍游岭外，点检牧□以资亲付儿男□至自
□□，公长怏怏耳，恨恨耶，未德闻燕台上人教法，
因感神道□善□□□□田庄南院之别馆，开启灌顶
道场，□□菩提心戒，公寻度□□合坛铃杵并道场
舍要法具，并愿捨施燕台传教上人，公发弘愿未
遂。行，□□□□西日易殒，命定短长，□年□□
□□三日而终；公享年五十有一，莫不星落天上市
罢寰中，人之云亡，邦国弥碎，花飞叶落莺啼寂寞
之声，雷□□沉龙从六方之云，郊原失色□□□□
倾柱石，适有郑国夫人□凤凰之□□，哀琴瑟以韵
□，□礼奉终，于义适中，以令公在病，夫人之
〔视〕疾也，亲奉汤药，朝不暇食，体唯温良，夜
不解衣，终始两年，其心若□□□□〔也〕，是大
圣皇帝之侄女也，皇帝以祥蛇虺，视若殊□，幼长
皇宫，以为已女，乘龙下嫁于诸侯，班制欲□于王
后。夫人之父，乃有国之后也，世为大契丹国皇亲，
由齐鲁与秦晋之□也，□□□□，尚公主为驸马都
尉，后赐以极品，封建□□，以袭先人之□，用彰
□□之荣。夫人之姊，寔助天顺皇帝内治，六宫化
冷，百姓德标，彤管□播□□，乃〔妻〕〔姊〕
〔后〕妃之伦也。夫人之宗世联襟房，以贵姓宫□
亲友，□□□□氏之〔化〕也。夫人之出也，拔连
天眷，□□□柔顺侍躬维□得，有如花之□藏匿□
之心，爰日闺门专承姆教，奉采苹之祀婉婉所□，

咏□□□□以配□子，于戏，行善不验，不获值老，
□□□厥□□□□，未亡之苦，□既溢矣，毒将畴
依，莫不□重□□恩□天地断□，且截籍□志可守
乎，生同处而死同归，本大礼矣。夫人于是亲与长
男华州马步军都指挥使昌言、次男华州衙内马步军
都指挥使昌时、季男阿难奴及幼女少妇，并门生故
吏部曲人员，以□□□事语询于众，卜其兆宅，安
厝玄宫，以□马埋□旧是污俗之礼，枫棺柏槨宜遵
无陋之仪，□予□□□□，哀号俯伏承命，夫人便
与二三孝子门生故吏部曲人员，亲往□□□□马孟
山□□□峰岭□，老松古柏偃亚麟〔麇〕，异草奇
花醴蘊茱萸，潺湲清涧疑行田洗，□之川黛烟岚，
实□□寻真之地，人心忻乐，生死何别，又何「须
访牛眠于陶侣，□□□□加以叠障，□阳关□□□
唯斩□□□交通，真诸侯朝王之象，是三公所营之
墟，苟称人心，谁云不可，保宁十一春□二月丙
寅，夫人爱命植夫驳驰于役庸赁百工大营葬事，人
蒙思惠，□□□□日宽趋□，□不满期，封城俄就，
其圻也东西五仞，南北七寻，大小方园于礼无陋，
埋车涂盖免夫君子之讥，闭隧悬棺方称诸侯之礼，
冬十月庚申，举之棺槨衣衾，备之以旌旗弓剑，神□
□□无不具陈，以礼奉□□□□□，皇帝使宗子来
会葬，赠赠哈襪以表后亲之恩，牛羊犬鸡不废表纪
之数，赠兼政事令。人叹美终，莫不白马盈郊，素
车满野，六亲执紼，哀声雷动于九天，百鸟旋空泪

清□□□草，风云惨惨，路振皇皇，歌薤露以难传，
唱虞殡而调切。嗟呼！玄宫永闭，蒿里长扃，余□
来□，飞尘旋墜，松繁竹茂依稀万鬼之邻，石垒泉
深掩千年之骨，神冤荡漾，功世隆高，生有可鞠，
□□□□，欲遣将来，君子望田文以丘陇，臣仆有
殊读孝父之碑铭，子将无愧责也。抽丝染翰才之八
字之能，受请见招不获一言之让，因敢直书其事，
乃为铭曰：乾坤覆载，日月垂光，四时运转，万物
□□，□□□□，有衰有昌，人行善恶，或福或
殃，有君子兮，独取其富，不取其殃。有贤人兮，
自去其衰，而守其昌。公兮精华，器乃非常，德叶
天地，动无不详。幼孤恃立，祖考宁亡，终夜三
省，慎为□□，□□□□，不敢怠荒，家事理□，
盛年堂皇，肇亲旒展，以显忠良。卒持符节，宁谥
边方，功世赫赫，颂声煌煌，南国听而慕义，举玉
帛而来」□，是遇今〔古〕，莫之□□，何期□□
天上，俄□□□，鳌□俄而□□□，凤□□而鸟欲
□□尘□□骨，咏□百鸟，□□□□传人世，亡□
贞魂归夜乡，□□□□，地久天长，销磨巨岳兮，
□□□□，变化沧海兮，海陆出田□，唯我〔就〕
□之□德，保宁拾壹年玖月叁拾日建」丹靛国夫人
肖氏、郑国夫人肖氏，长男镇国军节度马步军都指
挥使昌言，次男镇国军节度衙内马步军都指挥使昌
时，季男阿难奴，孙男和尚奴，长女德师，次女韩
六，季女韩迷妃」长男新妇肖氏，次男新妇肖氏故

东京留守□都□□□□□」资恩寺通寂大师赐紫惠
璘，归空大师赐□□□□」随使左都押衙李贞，随
使右都押衙李光，随使□□□□」故魏王府契丹都
提举使田亚思，随使契丹都提□□□□马孟山庄主
首李琼美，凌河庄主首李琼营□□□□

（说明：由于原碑的字迹有的脱落和传抄上的讹误，文中有的字句失真。碑铭原无句逗，后人所加的标点也可能点错，请明家指正！）

与知雄州孙全兴书

琮滥受君恩，猥当边任。臣无交于境外，言则非宜，事在~~并州已言雄州交州真地~~同，曷尝不世载欢盟，时通货币。往者晋氏后主，政出多门，惑彼强臣，忘我大义，干戈以之日用，生灵于是罹灾。今兹两朝，本无纤隙，若或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旧好，长为与国，不亦休哉。琮以甚微，敢干斯义，远布通悟，洞垂鉴详！

耶律琮

保宁六年

喀喇沁旗鼠疫的流行与防治

马 贵 祥

喀喇沁旗东部是黄砂土质的丘陵地带。适于黄鼠的蕃衍，所以，这个地区黄鼠特别多。过去每到夏季酷热天气，老鼠就从洞里爬出来晒太阳时（老乡叫“老鼠拔橛”），像高粱茬似的，坐在火车上就能看得见。老鼠好发生一种疾病，叫“鼠疫”。“鼠疫”的传播媒介是跳蚤，这种跳蚤，一旦叮了人体，人就得鼠疫。鼠疫这种病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得病急，死亡快，病死率高，因此，国家规定它是甲级传染病。

解放初期，人民群众刚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生活水平还不够高，卫生条件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间，在我旗楼子店区的望甘池村发生二例腺鼠疫。九区（平庄区）的美丽河村发生八例腺鼠疫，由于治疗不及时，全部死亡了。当时人们还不认识鼠疫的危害性，没有引起注意。到一九四八年春，在我旗东部六、七、八、九四个区二十四个村（屯）先后发生了鼠疫。疫情来势凶猛，得病的人很多，死亡的也很多。开始死的有人抬，有人埋，还能占口材，后来越来越多竟到没人抬，没人埋，只好套大车往外拉。有的户死绝了。疫区到处是一片“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惨景象。

那时我东北人民政府和热河省人民政府设在煤窑五

家，冀热辽军区司令部驻在望甘池，正在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由于鼠疫，这些工作受到影响，全部投入到灭鼠防疫斗争中去了。而国民党特务分子、土匪、反革命分子，散布谣言，说什么“鼠疫是八路军带来的，”“不怕五鬼闹中华，就怕孝子，（指八路军防疫人员）来到家”等等，热河省副主席杨雨民同志亲自抓防疫工作。杨主席向喀喇沁旗、建西县联合政府要人搞防疫，旗联合政府决定派教育科长翟明轩同志抓防疫工作，没有卫生人员，就从各区政府抽调干部，还不足，翟明轩同志就从教育上抽二十多人，组成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开始既没技术人员，又没有设备器材和药品，只用来苏儿进行消毒。有一点磺胺之类的药品，还不许乱用。只是发动群众扑鼠，搞预防，在疫区设立了隔离所，把病人送到隔离所，进行隔离不许家人探望，由民兵送水送饭。隔离所周围挖上防鼠沟，里面放进水或石灰，老鼠掉进去，由民兵负责灭掉深埋。我旗第一个隔离所设在五家村的老君庙里，派刘德明同志为所长。防疫指挥部设在五家村老成家，杨雨民付主席为总指挥，翟轩明、李纯英同志（五家村党支部书记）为付总指挥。村长王子忠，柴子瑞负责供应隔离所生活，王云贵同志带领县支队和民兵负责疫区封锁。当时，一家发生了鼠疫，就挖一个大隔离圈，搞武装封锁。在村头贴上省政府布告，不准疫区的人强行通过，防止鼠疫蔓延。防疫人员每天用来苏水消毒若干次，尽管这样，我旗东部四个区，二十四个自然村（屯）发生鼠疫人数一千四百八十四名，死亡一千四百一十六名，死亡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死绝了二十六户（其中望甘池村十五户、南七家六户、小黄金地二户、后窑三户）。到十一月份，天气冷了，疫情才逐渐

平息下来，这时，防疫人员搞冬训、进行整顿。

到一九四九年，旗联合政府，为了加强防疫工作，把防疫队从五家迁到平庄，同时，向省里打了报告，要求派医疗队支援，上级很重视，派来了东北防疫队、热河省防疫队，同时，苏联红十字半月协会五月下旬派赫赫洛娃带队也前来帮助防疫。在上级和苏联防疫队的指导下，把防疫人员统一编队、统一指挥，成立了：扑鼠队、消毒队、注射队、卫生队、宣传队、化验室和后勤组。组织纪律上要求很严格，工作很紧张，每队都有一台汽车，早晨统一出发，晚上统一回来。防疫人员虽然辛苦，而工作认真，设备增加了，防疫队都有防毒服、防毒袜、口罩、手套，出去防疫必须穿带好，回来脱掉消毒。也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通过标语、讲演、漫画、宣传材料，演剧各种会议等形式，宣传鼠疫的危害和防鼠意义及方法。防疫条件好多了，医生、护士、药品都有了，病人进了隔离所，由苏联大夫和本国医生进行检查治疗。在业余时间，中国防疫人员向苏联防疫人员学习俄语和防疫技术，苏联防疫队也学华语，每天早晨学习一小时，

扑鼠队和区村干部全力以赴，发动群众扑鼠。当时，主要是依靠夹子打、锹挖、水灌。把扑到的老鼠收上来送到化验室，进行剖验。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免疫力，注射队进行预防注射，除东部四个区全部进行预防注射外，西部的四个区（牛营子、公爷府、王爷府、小牛群）也进行了预防注射，特别是人口集中地方，（如学校）集中注射。由一九四九年防疫措施及时、得力，疫情才被控制住，苏联防疫队撤走前，未发生疫情。因工作需要，苏联防疫队撤走了，中苏防疫人员感情很深，走时互相拥抱，杨雨

民付主席也来送行。苏联防疫队撤后，地方防疫队并未放松，继续防治。六区小东沟村发生二例，死亡二例、八区的山咀子村发生四例、死亡二例，高粮杆子甸村发生二十六例，死亡二十五例。对这些疫区仍然进行隔离封锁，积极治疗，直到疫情停止才解除封锁。

建国以后，进一步加强了防疫工作，旗防疫队改成喀喇沁旗鼠疫防治站。虽未发生过人间鼠疫，但在鼠间仍有发生，从鼠体内验出鼠疫菌，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间曾从四十一匹沟鼠、五匹黄鼠、二匹麝鼠、四匹砂土鼠体内验出鼠疫菌。因此，我旗东部防鼠工作从未放松，年年春季防疫人员进入疫区，冬天黄鼠入蛰，防疫人员冬训，春天开始组织发动群众扑鼠，消毒灭蚤，预防注射，检蚤、化验等工作。后来党中央提出除害务尽号召，开展灭鼠拔源活动虽然拔源没有彻底，但年年扑鼠，使鼠的密度大大下降，到一九七三年，旗委下决心，在乃林公社成立灭鼠拔源指挥部，由旗委主要领导亲自蹲下来，坐阵指挥，充分发挥卫生部门的参谋作用，调动各方面力量，一鼓作气，达到了灭鼠拔源标准，经中共辽宁省委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验收合格，中共昭乌达盟委在乃林召开灭鼠拔源现场会议，一九八二年内蒙古地办室又组织验收，也达到了标准，发了合格证。摘掉了疫区帽子。但防鼠工作不能放松。必须确保不再发生鼠疫，保障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喀喇沁旗鼠疫流行史统计表

流行年代	区别	村屯别	发生月日	终息月日	发生人数	死亡人数	病型	死绝户
1947	9	前美丽河	10	10	8	8	腺鼠疫	
1947	6	望甘池	10	10	2	2	同上	
1948	8	蒙古营子	9	9	9	8	同上	
1948	8	潘胡地	8	10	5	5	同上	
1948	8	昌胜远	8	10	18	17	同上	
1948	8	南七家	7	10	123	120	同上	6
1948	8	大三家	8	11	88	82	同上	
1948	8	上六家	9	10	13	12	同上	
1948	9	什大份	10	10	13	13	同上	
1948	6	后窑	7	9	68	64	同上	3
1948	6	小黄金地	8	9	69	63		2
1948	6	小哈尔脑	10	11	31	29		
1948	6	东马架子	8	11	11	10		
1948	6	二十顷地	7	10	11	11		
1948	6	望甘池	6	10	437	430		15
1948	6	上房	6	8	48	39		
1948	6	下洼子	7	8	23	18		
1948	6	五家	6	8	300	290		
1948	6	二道营子	9	10	37	34		
1948	6	四道营子	9	10	21	21		
1948	7	小什大份			55	53		
1948	7	忙牛营子	7	10	69	63		

续表

流行年代	区别	村屯别	发生月日	终息月日	发生人数	死亡人数	病型	死绝户
1948	7	沙巴台	8	10	14	13		
1948	8	毛家窝铺	8	8	3	3		
1948	8	中三家	8	10	14	14		
1948	8	苓上	8	8	4	4		
1949	6	小东沟	7	7	2	2		
1949	8	山咀子	8	8	4	2		
1949	8	高粱杆子甸	8	11	26	25		
合计		30			1529	1455		26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喀喇沁旗东部灭鼠拨源统计表

年 度	参加 灭鼠 的数 医 务 人 员	专业 灭鼠 队	民 办 灭 鼠 队	发 动 群 众 数	投 药 洞 数		灭 鼠 数		其 它	化 验 室 数	药 房 灭 鼠 数	预 防 接 种 人 数
					合 计	家 里	野 外	合 计				
1971	64	20	605	33,041	64,441	26,085	38,356	14,923	9,260	5,663	408,300	29,062
1972	89	50	560	18,353	95,007	41,844	53,163	4,861	2,287	2,574		
1973	95	82	531	16,251	45,210	14,089	31,131	5,815	4,760	1,055	140	255
1974	85	60	529	24,186				61,021	56,643	4,378		
1975	40	60	529	27,511				8,759	5,362	3,397		
1976	30	50	540	20,050				8,662	6,038	2,624		
1977	20	59	449	40,048				33,673	30,418	3,255		
1978		35	472	37,059				59,075	47,141	11,934		

喀喇沁旗克山病的危害与防治

马 贵 祥

喀喇沁旗西部是山区，从东往西，海拔递增，到大店北沟为1200公尺。广大人民群众居住在沟沟岔岔里，当地群众说：“九沟十八岔，岔岔有人家”。这是事实。这里的气候寒冷，气温变化很大，严冬季节，冻得人不敢出屋，夏季早晚有时还得穿棉衣，每年无霜期仅100天左右。

在这高寒山区，流行着一种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地方病——克山病。克山病在这方圆百余里地方，持续了将近百余年。尤其是旺业甸镇和美林乡，是重病区。这两个乡一百五十三个自然屯，屯屯都发生过克山病。

当时，群众还不知道叫克山病，只知道发病之后，心难受，一吐黄水就死，当地群众管这种病叫“传人”“快当病”“吐黄水病”等。这种病发病急、死亡快，病死率高。每年冬腊月 and 正二月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当地群众说，头场雪，三九天，杀年猪，过小年是死人季节，群众最怕。根据调查，历史上有过四次大的流行。即：1905年冬至1906年春；1920年冬至1921年春；1927年冬至1928年春；1939年冬至1940年春。使旺业甸和美林方圆九十里的人民，处于悲惨凄凉的境况之中，人死得报庙排队，驾灵成行，哭丧哀嚎声，婴儿恋母夜啼声，笼罩着这个山区的上空，弄得人心惶惶，纷纷外逃。然而，旧社会，历代封建

王朝和反动的统治阶级，只顾盘剥这里的民脂民膏，榨取这里劳动人民的血汗，对人民的疾苦根本不闻不问。劳动人民处于求医无门服药无钱，贫病交加，生命无保障的水深火热之中，不知有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不知有多少户死绝了根。仅小美林沟村，在1905年就死亡五十余人；东局子村在1920年冬死亡三十多人，死绝四户；1921年十个自然屯统计，就死了一百余人；1933年死了三十多人；1944年死了四十余人；1949年死了五十余人；1957年死了十六人；1962年死亡六人。大店、罗圈铺两个屯，1941年冬至1942年春死亡最多一百一十多人；死绝五户；1943年冬至1944年春死亡三十多人，死绝二户；1952年冬小美林沟村的天花地沟屯，全屯十三户，四十五口人，死亡十八人，大部份是青壮年妇女，灾后全屯只剩下一名妇女。由于疾病流行，使这个地区人口逐年下降，旺业甸镇的罗圈铺村，1962年有八百零五人，1963年只有七百七十口人，1964年则为七百五十九口人。该村的三道沟门屯，一百零三户，二百九十口人，从1962年到1964年10月，共出生二十一人，而死亡却有六十一人。因而出现了病人多，健康人少；死的多，生的少；欠债的多，富裕的少；单身汉多，妇女少；没文化的多，有文化的少等五多五少的落后局面。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1961年以后，首先在克山病区建立了卫生组织，配备了医务人员。旺业甸医院二十三名、美林卫生院十五人。然后从鼠疫防治站抽出医务人员，深入病区，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防治。旗委为了进一步加强防克工作，每年到发病季节，各级党委都成立“防治克山病指挥部”。由付旗长级的干部作阵指挥。从全旗各级卫生组织抽调医务人员，每个村、每个屯都驻

上医务人员进行治疗。为了培养永不走的防克医务人员，从1961年开始，逐年培训防克员，一共培训一百三十一名，其中1961年十九名、1962年二十四名、1963年三十四名、1964年五十四名，给这些防克员配备了诊包、药品和器械，给有克山病预兆的人及时打针送药，医务人员管这叫“露头打一针”起到控制克山病急发的作用。

由于克山病病因不清，就大搞综合性预防，提出把住“三关”即头场雪，三九天，杀年猪过大年，做到三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三防（即防烟、防寒、防潮）为重点“两管五改”（即管水、管粪、改井、改厕、改圈、改灶、改烟筒、改环境）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解放初期，群众贫病交加，生活非常困难，国家拿出大批钱改造马架房，重点是老革命根据地和克山病重病区的旺业甸、美林沟和四十家子三个公社，原有住马架房的七百二十二户，二千零五十八间房，从1961年至1966年拨款十二万四千一百四十元，其中民政拨款九万三千六百五十元，卫生拨款三万零四百九十元。已解决四百八十五户，一千四百五十五间房子。后经调查，不仅旺业甸、美林、四十家子有马架房，其他公社也有，于是1972年又把没改建的马架房全部改建完了。在改建马架房上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结合的办法解决的。（详见附表）当时在病区提出实现五化：烟筒上房化（有一千九百六十间房子烟囱上了房）；顶棚化：（吊顶棚二千六百四十二间）；窗户玻璃化；不喝生水，实现暖瓶化，夜间不出去小便，防止寒冷刺激，达到地盆化。过去克山病区卫生落后，人无厕所，牲畜无圈，鸡鸭无窝，有的人畜共居。开展综合性预防工作以来，修了小口深坑防寒厕所二千二百一十四个，猪鸭畜圈一千

零一十二个，打汲水井十二眼，深水井一眼，並修了井房，群众为了感念共产党的好处，在井房门框上贴上对联：“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打井人”，横幅四个字，“饮水思源”。为了改变克山病区不卫生习惯，国家在三道沟门和小美林沟修了两个浴池，让群众定期洗澡。为了增加病区人民的营养，在重病区每天早晨供应豆浆。党和政府对病区人民关心倍至，对没被子和没衣服为群众，给解决防寒棉布和棉花。仅旺业甸一个公社拨防寒棉布二千市尺，棉花一千市斤。还发放了救济款三十七万八千四百零五元，解决了克山病区群众防寒问题。使病区人民吃得饱、穿得暖，现在克山病区人民都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各级党政都很关心克山病区人民的身体健康，除了旗、公社派大批医务人员外，盟里每年都有大批医务人员深入病区，帮助防克，特别是盟防疫站，在小美林沟常年蹲点，1963年冬至1964年春，内蒙医学院还来二名教授（舍英教授、谢教授）带队进行防克。我旗划归辽宁省后，辽宁省地方病研究所和中国医科大学，每年都有教授、讲师（冯教授、付教授）带队进行防克，送医送药上门，控制了克山病流行。同时，内蒙卫生厅长、地方病防治办公室主任，辽宁省地办主任、盟市、旗领导经常深入病区检查指导工作。

为了进一步澄清病区，除急发季节外，其余时间在省（内蒙）、盟站大力支援配合下，组织医务人员分别于1963年、1965年、1971年对地方病，特别是克山病进行了普查。经过几次普查，确定克山病区的：王爷府、四十家子、大牛群、小牛群、永丰太、南台子、头道营子，马鞍山、羊场、龙山、公爷府的部份地区实属安山病区。美林、旺

业甸是重病区。我旗有十二个乡（镇）是克山病区，有病人六千四百二十五名。仅据1962年冬至1978年春，十六个年头统计，克山病急性发作一千三百八十四名，死亡143名（详见附表）

随着社会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对克山病的防治不断出现新疗法。除坚持使用葡萄糖加维生素C以外，从1968年以后，开展了卤砷疗法，1979年以后，又推广了以亚硒酸钠为中心的综合性防治工作，使克山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从1979年到现在，喀喇沁旗保持连续六年无急发、无死亡，病区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喀喇沁旗克山病历年发病统计表

年 度	发病数	死亡数	死亡率占%
1962年冬至1963年春	136	36	25.6
1963年冬至1964年春	137	45	32.9
1964年冬至1965年春	172	31	18.
1965年冬至1966年春	105	7	6.6
1966年冬至1967年春	96	4	4.15
1967年冬至1968年春	75	2	2.8
1968年冬至1969年春	85	3	3.52
1969年冬至1970年春	74	1	1.35
1970年冬至1971年春	170	5	3
1971年冬至1972年春	165	3	2
1972年冬至1973年春	55	1	1.8
1973年冬至1974年春	18		
1974年冬至1975年春	40		
1975年冬至1976年春	12	3	2.5
1976年冬至1977年春	31	1	3
1977年冬至1978年春	13	1	0.8
合 计	1,384	143	

喀喇沁旗克山病统计表

社	别	克山病人数
美	林	1,622
旺	业甸	2,502
王	谷府	541
四	十家子	132
锦	山	63
龙	山	34
大	牛群	81
小	牛群	92
南	台子	1,115
永	丰	5
头	道营子	206
羊	场	32
合	计	6,425

喀喇沁旗克山病区改造马架房数

项 目	原有数		解 决 数		
	户数	房间数	户数	房间数	拨款数
美 林	182	191	153	459	42,090元
旺业甸	444	1,276	367	1,101	84,900元
四十家子	96	288	96	208	17,650元
头道营子	18	54	18	48	3,000元
小牛群	10	30	10	30	1,500元
	750	1,939	644	1,926	149,140元

我的父亲——吴尧忱

吴 国 辅

吴尧忱是喀喇沁旗王谷府镇喇嘛地村杨树林人。

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出生于一个蒙族平民家庭，乳名叫双柱，（蒙名豪斯巴特尔）卒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享年八十四岁。

吴尧忱幼年在崇正学堂读书，由于学习成绩好，受到喀喇沁王爷赏识，被贡桑诺尔布保送到北京陆军测绘学堂高等专门地形科学习三年毕业。清朝恩赐“武举”衔；任北京陆军测绘局审查官；民国年间任北京蒙藏学院学监；伪满时期任治安部兴安课课长；兴安西警备军部部副，兴安西警备军骑兵三团团团长（上校衔）；伪蒙疆军人子弟学校校长；解放后任昭盟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职。

吴尧忱在世时叙述一生的主要经历如下：

光绪三十年（1904年）贡桑诺尔布选派双柱去北京陆军测绘学堂学习。临去北京前，贡王对进京学习的学生做了嘱托，大意是说：“你们是我旗第一批进京求学的人，一定要为蒙古人争气”“蒙古人历来能征惯战，唯独缺少有文化的人，光有武力无有文备，蒙古人的事业是难以长久的”。贡王的这一番话，的确在当时给吴尧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在回忆往事时说：“贡王的几句话，的确成了我奋发学习的动力”。吴的数学基础很低，经过一番努

力，也能跟上了班，由于专心刻苦，终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毕业后，留任北京。以后被派往新疆、甘肃两省边境测绘地图，在这个测绘队里任“司录”（相当于班长）。完成任务后，又到内蒙河套地带绘制八大网渠，接着到长城外绘制各盟、旗分界区，历时三年。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学习毕业后，清朝皇室为了收买、拉拢蒙古民族有智之人，破格恩赐吴尧忱“举人”头衔。宣统元年（1909年）吴完成测绘任务后，多次要求到军队里任职。这一年正好宣统继位，调整宫廷机构，就把吴尧忱安排在皇宫禁卫队，担任战术教官。任职三年。

中华民国五年（1916年）由北京蒙藏学校院长吴恩和的帮助，担任该校学监（相当于现在的教导主任）他在学校任职期间，结识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中很多人思想敏锐，易于接受新生事物，观察分析社会面貌比较深刻。特别是当时一些进步学生，思想活跃，富于斗争精神。过去一直周旋在迂腐的官僚阶层饱受官场倾压的吴尧忱，面对这一崭新环境真是耳目一新。他与学生们一同参加讲演会，同他们一起讨论国家与世界大事，增添了新的信心和勇气。吴尧忱深深喜爱这些青年学生，相信他们不久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当时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北京政府财政十分空虚，有时竟断绝了办学经费，使学校无法继续上课。为了办学，吴尧忱就到内蒙各旗募款坚持办学。他当时对学生说：你们是国家民族的希望，有我在就不能让你们荒废学业”。今天看来吴尧忱的这句话的确说对了。如国家和内蒙党委、政府的领导人，乌兰夫、哈丰

阿、吉雅泰、奎璧、特木尔巴根、乌勒吉敖斯尔等人。都是当时在蒙藏学校学习的那批学生。

民国八年（1919年）震动全国的“五四”爱国青年运动爆发了，蒙藏学校的学生也同北京其它学校的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遭到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吴尧忱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沿庄收容被打伤的学生，想办法给他们治疗。还动员全校教工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军阀当局为了进一步破坏学生运动，又使出不拨办学经费的老办法，企图饿散学生。吴尧忱只得再次到内蒙各旗募捐，继续支持办学。后因军阀特务的加紧迫害，他难以在北京存身，被迫返乡务农了。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了我东三省。在新加坡的爱国华侨陈家庚自献军费，组织抗日武装，委托热河省督军汤玉麟招兵买马，汤玉麟的干儿子乌古廷即在锡伯河一带招兵，组织抗日自卫军，并邀请吴尧忱到部队任职，吴当时想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欣然同意参加了这个队伍。乌古廷自任司令，任吴尧忱为司令部部副，没等这支部伍组织齐备，日军就占领了赤峰，乌古廷不敢与日军较量，就带队伍退到集宁一带，一边积蓄力量，一边观察形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后，因热河紧连东三省，乌古廷感到孤军难以与日军抗衡，甚至自己也有被吃掉的危险。因而退至西部地区，在蒙奸李守信的诱惑下，投降了日本，以后接受日本侵略军的命令，把队伍带到林西驻防，继续扩充军队，名为兴安军。当时吴尧忱担任旅部部副，骑兵三团团团长，满洲国治安部兴安课课长等职务。

吴尧忱在林西时，当初去苏联学习的“特木尔巴根”（是我旗大牛群乡小庙子人，是吴尧忱大女婿）按着党的指示潜伏回国隐瞒历史打入敌人内部任伪满通辽教育科长，后因共产党嫌疑被宪兵队逮捕入狱，虽经拷问，没有得到什么口供。因特木尔巴根是吴尧忱的女婿，引起日本宪兵队对吴的怀疑，就假意派吴尧忱到通辽征兵，借此审查其行动。吴尧忱将计就计装作不知，尽管如此，日本方面并没有解除对他的怀疑，始终暗中监视他。以后，在去兴安南省办事的一个偶然机会，遇到巴司令名叫巴特玛拉布丹（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中将）就把营救特木尔巴根的事托付他，经巴司令出面担保，特木尔巴根终于得救出狱。又被派到王爷庙（现乌兰浩特市）蒙民裕生会以该会职员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至解放。

特木尔巴根出狱后，吴尧忱就借年迈耳聋为由辞职还乡。可是日本人对他不放心，不时派人到吴尧忱家，美其名曰探望，实则仍在监视。为了摆脱监视，吴只得离家去绥远，找到了当初在蒙藏学校攻读的乌勒吉敖斯尔（当时他在伪蒙疆军第八师任师长）在他的介绍下，在蒙古军人子弟学校当校长，直至解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尧忱离开呼市，到张家口找到了乌兰夫。由乌兰夫主席介绍到卓索图盟纵队做军需工作。吴担任后勤工作时除设法筹备粮秣，保障部队的供应外，还负责保护随军家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吴尧忱投身革命队伍里亲自领受共产党的教育，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亲眼看到队伍每到一处，首先发动群众。共产党依靠群众，爱护人民，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共产党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爱护人民，优

待俘虏的政策，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自己坎坷的经历中深深体验到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会有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兴旺发达。自己一生为民族事业奋斗，终于找到了归宿。

吴尧忱一九五一年退职回家后，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虽年迈也积极参加劳动。並带头出售余粮，一九五三年卖统购粮二千五百斤、五四年三千斤、五五年四千斤粮食。积极参加农村政政活动，协助当地干部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耐心地宣传时事政策，颇得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从一九五六年被选为昭盟、喀喇沁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昭盟政协委员会常委。

注：本文作者吴国辅系吴尧忱之次子。

整理：阎桂芳

郭拔贡

王书平

郭拔贡名叫郭春早，1800年（嘉庆五年）生于本旗牛营子镇老土城子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据调查了解，祖籍是河北省玉田县郭家桥的，清乾隆年间，河北遭了荒旱，父亲带着他母亲由原籍来到现在的牛营子镇老土城子。落脚以后，只靠父亲的劳动来维持生活。1800年（嘉庆五年）郭拔贡出生以后，生活仍很困难。在郭拔贡十来岁的时候，他家养了几头猪，郭拔贡就整天放猪。每天都要路过一个私塾馆，教书的是一位山东老学究，文化程度很高，很受学生和学东的尊重。拔贡小时候家贫上不起学。但他很喜欢读书，看到人家的孩子上学很眼馋。因此，他每当路过这个书馆的时候，总在这个书馆外停留一会儿，不是在窗外听，就是和学生们学识字，他还经常乘学生上下学的机会要学生的书本看。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记住的东西忘不了。这样，他这种好接近书馆，喜爱读书的良好行动，就被这位老师发现了。经过了解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出息的孩子。因此，这位老师就主动地找他父亲谈，动员孩子（拔贡）上学。家里生活困难，束修等项一概不用家里负担，全由老师供给。从此，拔贡就得到读书的机会了。起名叫郭春早。他上学不久，父亲就因病去世了。母亲仍克服着种种困难支持他念书。据说郭拔贡上学以后，写作俱

佳，成绩出众，不久郭拔贡文才出众的名声，响遍乡里。当时有陈营子村潘家窝铺，潘××主动托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郭拔贡为妻。由这以后，郭拔贡的一切费用多是由岳父家承担。

郭春早二十三岁结婚。十二年的苦读，老师认为他的文才等各方面都具备了考取功名的条件。他本人也有进京赴考的愿望。但他当时的家庭经济条件还很差，又是岳父家里的大力帮助，郭春早二十五岁那年，公元1825年（道光五年）到北京去赶考，取得了“拔贡”功名。

拔贡，在科举制度中是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清制，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中叶改为十二年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学，作为拔贡。再经过朝考合格后，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

郭春早考中拔贡后岳父家就越发以大量的金钱帮助他发家致富，郭春早中了拔贡以后，也决心不再追求高官厚禄，而安心于田园，他虽中了拔贡，但生活上依然俭朴度日，布衣粗食与群众无异。他出门入户，不坐车，不骑马，只是骑着一头小毛驴；他爱看医书，还学会了给小孩防治天花的一套医术，不论远近贫富家，只要来请他他都去。因此，在当时人民群众都很称赞他。后来在岳父的大力帮助下，再由于他治家有方，很快就有了许多积蓄。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家里的土地就达到了四十来顷。五十多岁的时候，又在四十家子乡哈气沟门（现在的四十家子团结地）置买了一大部分土地。由于土地越来越多，许多劳苦群众都到那里给他耨青扛活，人家越聚越多，所以这个营子后来就叫拔贡地。当然随着他的日子越过越好，财越

发越大，雇工，放债等剥削行为也就越来越多了。拔贡老年时代，不但有一百多顷土地，而且还在土城子、赤峰等处开了当铺、烧锅、粮行、店行、布店等八九家商号（见附表）。虽然成了富翁，但老拔贡的生活依然很朴素，与群众的关系也很密切。有这样一个“笑话”拔贡六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到水泉沟门去看地，有一个老太婆到他地里以拣庄稼为名，扛了两个谷子，想扛着走又扛不起来。这时正赶上老拔贡到她跟前，帮她扛到肩上，並说：“你快走吧，这是老拔贡的地，以后可别再来了，让老拔贡看见可不让你拿走了”。这笑话到现在还在流传着。

郭拔贡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男孩子按叔兄弟排行是老四，因此，人们管他叫老四先生。（名子不知道）女孩子是土城子大队西双庙老张家的婆家（现在西双庙张德顺的老太太）。光绪九年锡伯河发大水，把老土城子郭拔贡的这处宅院冲坏了，他又在水泉沟门修了一处新宅院（就是现在设师范学校这个院。）修好后，由老土城子搬到新修的宅院里。从此，管新修的这处宅子叫新土城子。拔贡发财以后，还作过一些慈善事业。据说在同治、光绪年间（歉年）还舍过两次粥饭，当时受过他救济的贫困人家都很感激他。老拔贡是长寿，据他本族在着的老人说，拔贡八十六岁去世。

老郭四先生，为人也很忠厚，在他前半生日子没大发展，但也没衰落，他只有七个男孩，没有女孩。因当时他的财势很大，人们都顺序管他们叫先生，排行老几就叫几先生。因此，除知道三、五先生的名字外，（三先生叫郭锡九、五先生叫郭虎臣）其他五人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郭拔贡这七个孙子当中，最杰出的是郭锡九和郭虎臣

郭锡九性格豪爽，行为磊落，很受人敬佩。如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乌珠梅沁王殿臣被土匪绑去，三先生曾亲自带领自家护院的五十多名乡勇（全枪马武装）到老河川把土匪打散，把王殿臣救回。这件事在当时震动很大，人们都很颂扬他五先生郭虎臣是一个外交人员，当时和老喀喇沁王关系很密切，並经常到北京和一些皇亲贵族打交道。另外，赤峰杨子宾、支棟两个大资本家，也和三、五先生交情很深，並经常来往。

由于三、五先生很杰出，因此，郭家第三代的日子，又在郭拔贡奠定的基础上太大地发展了一步。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十年这个阶段是发展的顶点。郭家的土地达到三百多项，仅在陈营子、炒米房等处，就设立四个大伙房，打一千二百多石粮，在赤峰、锦山、土城子、大碾子、乌丹等地开过六个烧锅，另外，还开过几处杂货铺。对新土城子这处宅院又进行扩建，从北京请来的设计师按左、右、中修了三个主院各院都盖了高大的厅房，在这三个主院的前后左右又盖了三百多间瓦房，占地八十亩。烧锅门市部的甬路，两旁栽上杨柳树，形成绿荫道。柜房门前花墙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草，檐挂着各种鸟笼，顾客一进门，真是花香鸟语，景色宜人。护院的乡勇队有五十多人，（全枪马）有事出动，真象县府一样，威严得很。

民国十二、三年以后，拔贡这七个孙子相继死去，特别是三、五先生去世以后，郭家的大势已去，日子就逐渐衰落下去。这时掌家大权落在二先生的大儿子郭明三的手里。郭明三好享受，讲阔气。首先以大量的钱财在北京买来一辆汽车。出门办事，近道坐小车子，远道坐汽车（这是赤峰地区第一辆车）他整天抽大烟，有大、小女人陪伴，

任意挥霍浪费，过着奢侈腐化生活，这样，郭家的事业从此江河日下很快衰落下去。到最后，除郭拔贡的两个孙子留下后人外，其他都乏嗣绝后。

土城子郭拔贡在各地的商号

行 业	商号名称	营 业 地 址	资本方式
当 铺	恒 兴 富	三道街西屯路北	合 资
烧 锅	泰 晋 豫	三道街西屯路南 (三班)	独 资
粮 行	泰 升 豫	六道街西屯路北 (磨 油坊) 与泰晋豫烧锅 联号	独 资
店 行	万成老店	三道街西屯路北	合 资
	南泰恒店	三道街西屯路南	独 资
	北泰恒老店	三道街西屯路北	独 资
布 店	小万成兴布店	三道街西屯路北	独 资
烧 锅	大万成兴布店 泰 萃 豫	公爷府街东头	独 资
烧 锅		四十家子拔贡地	独 资

通 兴 当

郑 瑞 峰

通兴当是旧公爷府街开设最早最大的一个当铺兼烧锅的商号，据说建于清朝乾隆初年。但由于股金和财东的变动，商号名称也有过变更。初期叫“利源当”中期叫过“利兴号”，到光绪七年（1881年）从街东迁移到西又改为“通兴当”。

通兴当座落在公爷府街西，前临街道，后靠北山，四周修有夯土围墙高达丈余，环墙又种植榆树，参差错落枝繁叶茂，大有遮云蔽日之势。整个商号院落占地三十余亩，有瓦房二百余间，共分东、中、西三个院落。东院为商业活动区，临街设有当铺帐房和售酒门市。院内有三进四合院，其中有掌柜的（相当于现代经理）的住所和店员宿舍，还有小厨房和货物库房等；中院前有车辆出入的大门，中间建有高大而宽阔的制酒厂，工作宿舍、厨房、仓库、粮仓等；西院东侧建有牛棚、马圈、草屋子、敞棚，布局齐全而宽敞。西侧是一块大菜园子种植着各种蔬菜，供商号人员食用。

光绪七年，通兴当整顿资本共为一万吊钱，它除经营当铺，开设烧锅制酒之外，还置买一些土地年产粮食一千多石，（约一百万斤）。

一、当铺：也称“押店”是专办理典当业务的场所。

在旧社会穷人没有钱化，拿衣服或什物作抵押。就其性质来说，是向老百姓进行剥削的机构之一。

清代当铺倍受统治阶级的重视，据史料记载：雍正六年(1728)开设，由当时政府发给“当帖”（俗范“龙票”即营业执照）即可得到官府的保护，因此各地的典当业发展很快。通兴当就是在这后期开办起来的。各典当业都勾结官府，维护当铺的利益。因此老百姓与当铺去官府打官司，有理也打不赢。当地有一句俗语：“穷不离当铺”老百姓要经常将仅有的一些衣物送进当铺抵押，换得少许金钱，或向亲友借物抵押名叫“借当”。

通兴当的当铺在临街设有帐房，屋内迎面墙上挂着一块三尺见方的木牌，上写一个大“当”字，金字黑地，以示在此办理典当业务。抵押的衣物送上柜台之后，由司柜（即检质员）定价，一般都低于实际价格的四成到五成。然后由司帐（即开票员）写好当票，记上底帐，打包之后由收物人朗声高唱，收货入库。当期一般为二十四个月，月利率期达三分。到期无力赎回者称为“死当”也叫死号。当物则由当铺转手卖给估衣商或古玩商。开当铺的名义是救济人，给穷人解决困难，实际是剥削人和倾害人。当铺还有一整套的骗人手法，除惯用压低当物的价格之外，他们还故意在当票上，将本来完好的衣物写成“破烂”或注上“坏”的字样，这样在当物存放期间如有损坏他概不负责。即使到官府去打官司，吃亏的还是典当者。每到年节临近时，当铺还雇用一批人四出收购当票，使当品成为“死当”之物。以便转卖从中取得更多的利润。通兴当就利用这个当铺剥削和压榨百姓从中取利而发展起来的。

二、开设烧锅：通兴当的迁址，据说和开烧锅有关，发现街西的水质好，出酒率高，而酒味浓郁，因此而西迁。迁地之后在通兴当的中院建有砖瓦结构高大而宽敞的制酒净房七间，有工人二十余名。自制麴子，每天制酒、下料用高粮两石，（折1,500斤）日产白酒七百五十斤。

通兴当为扩大白酒的销售量，除进行批发之外，还专设售酒门市进行推销。采取现钱购买，用高粮兑换（大高粮每斗换白酒九斤半，小高粮换白酒七斤半）赊酒挂帐秋后还粮等方式，贱收贵卖盘剥取利。

三、经营土地：通兴当从道光年就开始经营土地，在公爷府街东六华里的小府河南，河北买公爷的两处伙房有平地1,700亩，又在公爷府街南三华里的锡伯河南岸买平地800亩，俗称烧锅地。通兴当共有土地三千多亩年产一千多石粮，通兴当还拴有三路钉的头号大铁车十余辆，有大犍牛四十余头，每到秋冬盘粮季节大牛车列成长队，每辆车都在前车横榜下挂三个筒状大铁铃，车走起来，从远处就会听到叮铃当啷的车铃声响个不停，人们就知道通兴当的盘粮车又来了。

通兴当为了解决粮米加工和制酒用料的粉碎，光绪二十三年在前河套修水碾一轮，引锡伯河水冲轮旋转，利用水利加工，大大的减省了人力畜力，也是旧公爷府街的第一座水利工程。

通兴当通过多种经营形式盘剥取利，商号生意十分活跃，当时为旧公爷府街最大的商号，街面的钱行，地方的粮价、物价都由他来操纵。生产兴废、行市起落等一切经济都以通兴当为中心。因此，通兴当的资本越扩越大，盈利越来越多，财东分红也相应增加。但到民国年间，由

于军阀混战和土匪的骚扰，通兴当的生意也相对受到影响。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以后，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因而使生产萎缩不前，农村经济日益衰退。广大农民在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过春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大河无水小河乾，通兴当的经济也随之衰落，到伪满时期，其商业仅能维持人员开支。商号财东共为三人：康秉衡、卢子春、陈立志多数都是山西省榆次县人，解放后解散回原籍了，二百多年的通兴当从此彻底倒闭。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第一辑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113	倒4	涂阳	塗阳
114	11	□	不缺字，不空位，也无此符号。删去。
114	15	游历名山	遊历名山
114	17	游至龙泉	遊至龙泉
115	11	烟减灰飞	烟灭灰飞
115	15	岁月浸曩久	岁月浸久
115	16	以永其传 丐綴文愚赏於 年	以永其传 丐予綴文愚尝於 曩年
115	倒5	克古神清	貌古神清
115	末	屏缘后释	屏缘从释
116	1	不遣法律	不违法律
116	4	剪剔荒芜	剪剔荒芜
116	6	光耀五色	光翠五色
116	12	辛巳五月	辛巳五月
116	13.14.18	□	不缺字。也无此符号，但空位。应删去。
116	14	道亨道定	道定道亨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第二辑

作者 =

页数 = 1 5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